

# 壹屋

2020.8



- “逆全球化”能成为现实吗？ □刘 超——
- ● 奈何百年流感在 □刘金祥
- ● 回首师门感易生 □彭晓玲——
- ● 思君雄才良凄楚 □叶 隽
- ● 以爱之名 泅渡深河 □周朝晖
- ● 独立苍茫意难平 □王澄霞

# 欢迎订阅 2020 年《书屋》杂志



《书屋》杂志以“读书、品书、荐书”为宗旨，主要发表与思想文化、读书藏书相关的随笔和散文，在中国知识界长期享有美誉度和影响力。2019年，《书屋》有上百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青年文摘》、《读者》等主流文摘类刊物所转载。

2020年，《书屋》将一如既往地推介出版物中的精品力作，发表有创见、有性情的学术随笔，传承中外优秀文化，弘扬理性、正气和良知，力求使《书屋》成为广大读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您可以通过邮局订阅《书屋》杂志，邮发代号：**42-150**。亦可直接向编辑部订阅，每期**10元**，全年**120元**。另《书屋》杂志有“《书屋》文丛”、“《书屋》合订本”、“十周年文献光盘”等产品，欢迎读者选购。

本刊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邮箱：1245297948@qq.com

咨询电话：0731-85791300 联系人：崔连珍

我们将通过《书屋》杂志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好文，推荐好书。微信小店订购杂志和书籍，还有更多优惠。敬请关注！



搜索微信号：shuwuzazhi



今存之最早之西藏地理志为清代允礼所撰《(乾隆)西藏志》。

允礼(爱新觉罗·胤礼,1697—1738)为清康熙帝第十七子,雍正帝的异母弟。一度热播之电视剧《甄嬛传》中之十七阿哥就是借用了他的名字。允礼九岁后即常随康熙帝出塞外。雍正元年(1723)封为果郡王,管理藩院事。雍正六年(1728)进硕果亲王。先后管工部事、总理户部三库、管户部等。雍正十一年(1734)奉命赴泰宁(今四川甘孜道孚县)送达赖喇嘛回西藏,顺路巡视各省驻防及绿营兵。十月六日于北京启程,至次年四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圆明园复命。撰有《西藏日记》详记此行。后办理苗疆事务。雍正帝评价其「实心报国,操守清廉」,临终时命其辅政。乾隆即位后,总理宗人府事务、管刑部等。撰有《自得园文钞》、《静远斋诗集》、《春和堂诗集》及《奉使纪行诗集》等。

该书卷二有「乾隆二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统志》」语,故当撰写于该年,而题为《(乾隆)西藏志》。全书四卷。卷一为「事迹」,叙述西藏自唐代与内地交往及后来归化的历史概况,次述疆围、山川、寺庙、天时(气候)、物产、岁节、纪年、风俗、衣冠、饮食、婚嫁、夫妻、生育、丧葬、医药、占卜、礼仪、宴会、市肆、房舍及刑法;卷二为封爵、边防、徵调、赋役、朝贡、外番、唐碑、台站(自四川打箭炉至西藏江达共设八十四处台站,十三处安汛,驻扎官兵以保证中央政府与西藏之塘汛的畅通)及附录;卷三为「程途」,分别记载了四条进出西藏、五条自西藏出防各地,以及六条藏区内(含青海)之间的交通路程(部分路程有多条分路),均详载其起始地、途经地、相隔里程及柴草补给情况等。卷四为「藏程纪略」,为康熙辛丑(1691)知泾阳县事焦应旂所撰,当为附入。

该志书反复强调自隋唐以降西藏与内地的历史互动沿革,以及内地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影响,如「纪年」称西藏「不识天干,以地支纪年,月,纪日则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皆唐公主流传者」;「寺庙」称「大召(昭寺)……有唐公主暨吐蕃赞普并白布国王女塑像祀之。……系唐公主威圣神灵显赫,人民敬畏之」;甚至称「小召(昭寺)……乃唐公主所建。……殿内之佛像名曰「珠多吉」,云系觉释伽摩尼之弟,甫八岁成佛」;又云塑像内即唐公主肉身。俗传如此」。最有趣的是「事迹」部分述及:「相传云:昔唐三藏取经曾履此地。今大召(昭寺)之前廊尚绘有师徒四众之像,云猪八戒招亲之高老庄亦即今之采里。其真其诞,俗传如斯。」绘制于西藏最神圣寺庙之该壁画的故事题材显然出自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但未被相关研究者所知晓;所谓「俗传如斯」,表明为时已久并脍炙人口,显示出早在明末清初,内地的汉文通俗小说都曾经对西藏宗教文化产生了影响,更遑论其他。

(万方文)

## 书屋絮语

“余少孤失学。民国初元,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授课之暇,阅读每以报章杂志为先导。犹忆北京大学招生广告,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余即觅其书读之,至形梦寐间。登一楼,满室皆章氏书,并有未刊本。及余任教北京大学,果得章氏未刊文近二十篇,斯梦之验,则已逾二十年矣。”这是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序中的一段话,梦想成真,别有发现,实乃同学之人奇遇。钱氏作为儒家之代表,其根本在于对传统文化经典的温情,特别在当时旧学已扫、新学当立之际,涉及社会之根、立身之本等重大问题时,他瞻前顾后,痛惜不已:“梁任公、胡适之皆盛推章氏,然于‘六经皆史’一语,均不得正解。其他章氏独识孤诣,皆少阐述。近代国人涉猎旧籍,胥不以轻心掉之,即此足以为证。尤其是崇洋蔑古,蔚为风气,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狂论妄议,层出不穷。余就所讥评,一一按其实情,殆无一是。”重新检视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学衡派诸子会通中、西,珍重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伦理,甚至在滚滚而去的大潮中,不惜以命相搏,以文相抗,不离不弃,善始善终。钱穆终其一生亦如此,探源溯流,阐幽发微,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并替中国文化找到了世界的位置。

当代儒者李泽厚先生九十岁了,“相看两不厌,惟有落基山”,日子朴素,精神纯净,言语一如以往雅致,不落俗套。同是哲学家的邓晓芒先生,世事通透,文辞

尊严。作家韩少功偏于思想追索与语言的拷问,以独行者的角度来光照过往与现实,睿智而精准,成就精神版图。湘人的讲究,可窥一斑。至于那年,李泽厚拒绝金庸先生六千美元的馈赠,以为淡薄,去年曾引起轩然大波。不知者,以为李不识抬举,故作姿态,自鸣清高,而在湘人看来,性格使然,理所当然。

作为编辑,近二十年来,面对逝去的作者,心凉神伤。前些年,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百年老人刘绪贻教授为之写纪念文章,过几年,刘老逝世;今年上半年,南开大学张晓唯教授走了。因组稿的关系,都登门拜访过任、张二位教授,他们写的文章好读,用字遣句相当见功力。我手头有一本张晓唯教授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是2004年8月7日赠送的,现在封面斑驳泛黄,虽说“书比人寿”,但人去楼空,总有遗憾。我抄下这段话以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一次知识分子运动。一批知识精英传播新知,评判旧学,启蒙思智,重塑典范,影响一代青年至深至巨,近代中国的价值系统、政治文化和学术理路自此为之一变……”新文化运动的诸多侧面、“五四”文化人的余脉都在后来者身上伸延,亦旧亦新、亦中亦西的那代人的思想依然在天空中回响。直至今日,我们仍对他们保持敬意,不断沿着他们的道路去思索,并寻找各自的答案。

(邵水游)

书屋 月刊 二〇二〇年第八期(总第二七四期)  
 主管□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编辑·出版□ 书屋杂志社 出版日期□ 8月6日  
 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 邮编 410007  
 网络电子版全球代理:龙源国际网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电话□ (0731) 85486812 85791300  
 投稿邮箱□ 1245297948@qq.com  
 主编□ 黄步高  
 执行主编□ 胡长明 电话□ (0731)85486761  
 副主编□ 刘文华 电话□ (0731)85486761  
 编辑□ 罗青山 编务□ 崔连珍  
 封面题字□ 杨福音 封面设计□ 王平  
 发行主管□ 周逵 电话□ (0731)85486811  
 国内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址: <http://bk.11185.cn>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 42—150 国外发行代号□ M6403  
 刊号□ ISSN 1007-0222 □ CN43—1243/G2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定价□ 10.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8号



搜索微信号  
shuwuzazhi



篆刻  
杨友吉

## 目录

- |    |               |                 |      |
|----|---------------|-----------------|------|
| 44 | 域外传真          | 日本「多文化共生」的理念与实践 | 陈学金  |
| 42 | 域外传真          | 一道清新而丰富的午后沙拉    | 平瑶   |
| 38 | 《名利场》         | 杨绛点烦本《实例点评》     | 郑延国  |
| 35 | 「坐忘斋」         | 「美」姚湘著          | 姜异新译 |
| 31 | 怀念我的父亲        | 姚克与             |      |
| 29 | 语言学家王力早期的一篇佚文 |                 | 刘飞   |
| 26 | 那些摆地摊的教授们     |                 | 范军   |
| 26 | 流年碎影          | 思君雄才良凄楚         | 叶隽   |
| 23 | 宝牯佬           |                 | 刘跃清  |
| 18 | 陶澍寄梦「野士」左宗棠   |                 | 徐志频  |
| 13 | 湖湘人物          | 回首师门感易生         | 彭晓玲  |
| 10 | 奈何百年流感在       |                 | 刘金祥  |
| 9  | 学界新论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冯天瑜  |
| 4  | 书屋讲坛          | 「逆全球化」能成为现实吗?   | 刘超   |
| 1  | 书屋絮语          |                 | 邵水游  |

## 欢迎订阅 2020 年《书屋》杂志

**sina 文化生活**

声色视界 城市先锋

网址: [cul.sina.com.cn](http://cul.sina.com.cn)

电话: 010-82628888-5359



友情合作

《书屋》以“读书、品书、荐书”为主要内容,旨在向读者介绍国内外出版物中的精品力作,推动全民阅读和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栏目有“书屋品茗”、“书林折枝”、“灯下随笔”等,刊发的文章视角新颖、叙述生动,颇受读者喜爱。

已出版的《书屋》尚有少量存货,为方便读者购买,现将品种和价格列下表:

1999 年全年合订本	36 元 / 本
2002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03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04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05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06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07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08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09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10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11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0 元,全年 60 元
2012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6 元,全年 72 元
2013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6 元,全年 72 元
2014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36 元,全年 72 元
2015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48 元,全年 96 元
2016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48 元,全年 96 元
2017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56 元,全年 112 元
2018 年上、下半年合订本	每本 63 元,全年 126 元

《书屋》(1995 - 2004)10 年文献光盘 36 元 / 套

本刊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 (0731)85791300 85486812

思考者的精神领地

封三	当代篆刻名家——魏杰(作品选载)
封二	本刊启事
94	思史佚篇——从「一战」到「五四」——朱中原
90	蜀江水碧蜀山青——蒋蓝
89	前言后语——《数字身份》序言——姚前
85	廷杖小议——曹瑞涛
81	诗讖与文讖——甘建华
78	什么样的「知识」改变命运?——魏冠宇
75	儿童文学就应当是人的文学——王宏任
73	「一棵开花的树」——战玉冰
71	醴醴多古情——朱航满
70	灯下随笔——对湖湘文化精神的解析——廖小刚
66	湘版好书——独立苍茫意难平——王澄霞
63	魏延的悲剧——赵映林
59	说王维《观猎》——黄天骥
58	置身于喧嚣与孤独之中——苏翔
55	阅读,为善留下空间——蒋书丽
52	美津子的彷徨——陈司琪
46	书林折枝——以爱之名 泅渡深河——周朝晖

## “逆全球化”能成为现实吗？

——高等教育的视角

◎ 刘 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海外华人纷纷归国；与此同时，对中国留学生的录取则大幅收紧，许多国家高校的国际学生招生数缩减，这无疑造成了种种疑惑。这个世界将向何处去？高等教育将伊于胡底？在此情势下，有人认为国际格局重新洗牌，世界已开始或即将开始“逆全球化”，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及其国际化进程亦将发生大逆转。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言，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自古以来，疫病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推手。人类当下正在经历的这次流疫亦复如此。毫无疑问，疫情或已改变了原有的世界，人类社会在许多方面很可能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高等教育是一项国家事业，同时也已然是一种国际事业、全人类的事业，知识及教育的国家化、国际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教育“国家化”成为普遍趋势，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事业。克拉克·科尔认为，在美国，“巨型大学不仅是社会利益的接收者，而且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它本身就是美国高生产率的成分之一”。正如布鲁贝克所言：“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

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二战以后，多元巨型大学渐成常态。大学职能和角色多样化使其结构与功能日趋繁杂，需要尽可能平衡学术与行政、大学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大学的决策，往往不是大学所能主导的，不是社会所能主导的，甚至也往往不是主管部门所能完全把控的，它受制于各方博弈所形成的复杂合力。

从历史上看，大学创建以来就几乎始终是国际性机构。古代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曾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前往学习、研究，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印度本国。欧洲中世纪大学更是如此。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法国的巴黎大学等，都有着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大批学生和学者，近代史上的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以及二战以来的美国哈佛大学，莫不如此。那些名校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名校，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为世界贡献全球性知识和思想，而首先是因为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前来学习、工作、交游和参访。正是人员的国际流动和交往，促进了其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提升了其世界声誉和贡献度。可以说，世界名校的这种国际性和开放精神，即便在各国和世界局势最困难、最艰苦、最动乱的条件，也没有完全改变过。

全面抗战时期，曾留学牛津大学的知名学者罗忠恕，在与西方学者密切合作的过程中指

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灿烂古代文明必须珍视、传承。东、西方对于自己创造的古代文化必须彼此加强交流。”1939年，他赴日内瓦参加国际问题研究社时指出：“在现在的世界，科学已将地球缩小，使世界任何处所皆已成比邻，以一个浑圆的地球，任何一处，皆为其他处之东，亦为另一处之西，故可谓东即西，西即东，东、西是处处相遇的。”诚所谓“东西一体，风月同天”。1939年11月，在东、西方都战云密布的时候，牛津大学诸多学者推动成立了“英中文化交流合作委员会”；12月，剑桥大学也紧随着成立了“英中学术合作委员会”，李约瑟博士任书记。剑桥方面致函中国：“为促进人类之进步计，东、西学者及科学家似有密切联络之必要，使各民族之知识与传统之精神有适当之联络。”中国的燕京、齐鲁等五所教会名校联合致函牛津、剑桥，强调：“虽在战争中，亦应尽最大之努力，谋密切之合作。……如能交换教授，对两国皆有利益。”后来，该目标得以部分实现。1947年，罗忠恕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时，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表示：“世界是一个整体，需要人民之间的合作；每一个人都应有目的，只有社会机构才是为人人服务的手段。个人与民族应互相尊重，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华，为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

在战火纷飞之际，这些东、西方名校学者的精诚合作与不懈努力，结出了硕果，至今令人感佩，这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国际性的高度彰显。而今人类文明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岔路口，先贤的努力和智慧尤为今人提供丰富的启示。

大学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学术研究，是知识传承、贡献与创新。大学科研工作意在传承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知识”，知识“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或既定的……不论多么困难，它总是开放的，时刻接受挑战与改变”。创新无终点，求知无止境，知

识是没有国界的。外部的强力手段可以干预知识生产和传播，但并不足以改变知识本身的存在和内在发展与固有逻辑。而现代社会中，公权部门对知识的过度干预和国际管控，无疑将制约知识创新与传播。就此而言，为保障知识创新和科技教育水平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了保持国家的实力和创新力，相关各国也不得不遵从知识创新、学术发展的这一固有特性。为此，继续保持开放，与其他国家交流共进，是发达国家的不二之选。而中国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一员，作为拥有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是西方国家教育开放、学术交流过程中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存在。

默顿在其名作《科学的规范结构》中对科学的特性做出经典论述。他认为，科学精神有客观性和创造性两大标准，科学共同体应具有四大特征：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而科学“比其他的大多数社会体制更接近于普遍主义的理想”。因而，现代学术被认为是最具普遍性、最具公正性的国际化特质、最具国际主义精神的事业之一。十九世纪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曾智慧地预言：“认识无止境，科学亦无止境。科学将成为全世界的科学。”日后的学术进展确实印证了这一预言。一般而言，现代科学已成为一个无国界的知识体系。

这一时期学术和学术专业（职业）的发展，同样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征。“学术专业”迟至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然而一旦出现，它对研究的强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世界性而非地方性特征”。而当学术发展到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形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成为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起，“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

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华莱士（Walter L. Wallace）指出：“不论科学曾经是什么，科学就是关于人类世界经验命题的一般化与真假检验的一个方式。”科学在本质上具有普遍主义取向和普遍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显然是超越民族—国家之边界的。自然科学就如此，知识在本质上仍具有超越民族边界的普遍化（世界性）追求，世界主义、普遍主义是其本能的诉求。

阿尔君·阿帕杜莱（Appadurai）表示，“文化同质性与文化异质性之间的张力”，是“当今全球性互动的中心问题”。许多学者明确反对单极化、同质化和一元普遍主义。罗兰·罗伯森提出了“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方案，通过“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双向推动来解决问题，前者实现“全球本土化”，后者实现“本土全球化”，如此则避免了多种不良倾向，消除了将全球化（普遍性）与本土化（特殊性）作为文化两极而产生的对立，使它们作为一种“互相贯穿的”原则而存在。因此，各国的社会科学也就是一种“地方全球化”知识，其所寻求的地方性、本土性，应该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本土性，即全球“本土化”。本土化与全球化构成对立统一的张力，二者相生相克。

当然，现实的全球化事实上依旧是不平等的，当今的全球化依然是西方主导的进程。不仅仅在知识生产和话语表述中，即便是在知识分类、评价、传播、奖励等诸多环节中，西方也明显体现出其西方霸权主义（西方中心论）倾向。这当然是历史所逐步形塑的。

美国科学史家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在其经典论文《西方科学的传播》中提出：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一个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构成的小圈子提供了近代科学的最初家园，并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征服了全世界。及至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

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可以理解，上述地区的重知识群落的工作，在整体上形塑了近代西方知识体系，而它们也成为近代世界学术体系的母体和主流范式。按照本—戴维的研究，德、法、英、美四国长期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学术体系，是现代学术的中心（Centers of Learning），其他地方不过是外围（peripheral）。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萌生于十九世纪，但真正的社会科学向世界扩展，并在国际体系中形成明确的知识权力结构始于二十世纪。1945年前后，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的制度化在世界范围内完成，至此西方主要国家知识体系中基本确立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学科分类模式。

整个十九世纪，西方几乎征服了全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在全球的扩散。这一扩散最终形成了今天既成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伴随着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形成及其制度化，特别是西方大学教育模式二十世纪向全球的推广，社会科学所隐含的知识—权力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世界体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知识体系并不完全是中立的，它的背后隐含着权力。而学校正是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机构。正是通过学科在大学中设立院系和教席，促成相关图书的分类等制度化，西方的知识体系才得以以一种貌似科学化、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建构的过程中。

沃勒斯坦在1996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中认为，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沿着三条中线而分开，其中之一就是西方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对非西方（人类学和东方学）。显然，按照这种力图最大限度地彰显世界性的学



科分界，东方仍是作为西方的对立物而存在，仍是西方世界之外的难以类归的存在，这无疑暗含着西方“中心”对非西方世界的歧视。对应于沃勒斯坦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西方和非西方轴线”，二十世纪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史上也出现了一些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这些“核心区国家”正是那些社会学制度化形成和确立的先进国家，即所谓“西方”，它们创造了今天全球通用的社会科学主要概念、范畴、命题、理论和范式；而“边缘区国家”则对应于“非西方”，这些国家和地区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自然，国际化是多向度的互动行为。它一方面意味着大量非中心国家的人才流向中心国家学习和交流，也意味着中心国家的知识、技术、制度向非中心国家渗透。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国家的文化成果完成扩张，而非中心国家分享了先进国家的文化成果，同时也无形中被前者所文化殖民和精神统摄。有时候，它“越是学习他人，就越是依赖他人，难以摆脱边缘的地位，背离了最初的目标”。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一方的存在构成了另一方得以存在的前提。在世界学术体系中也是如此，若“东方”(非西方)不存在，“西方”的概念就毫无意义；若无“非中心国家”，也就不存在“中心国家”。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化，正是依赖于西方与非西方、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的密切互动。国际化是西方国家“中心地位”得以实现、维护和巩固的前提。没有国际化和人员-文化的国际交流，中心国家不可能实现其价值和技术的推广，不可能更好地维护和强化其中心地位。钱穆指出：“唯人类文化世界，乃为千百年之根本之大计。”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常需“去腐生新”。为达此目的，则需创新文化源头，同时吸收外来优良之文化。相关各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文化活力，为了增进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巩固自身的学术中心地位、维护自身文化霸权，也不可能完全阻止文

化的交流合作。因此，哪怕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国家都不可能主动终止国际化，它所希望做、能够做的，大概仅仅在于调整国际化的方向、步骤和策略。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和共同的事业。学术无国界，近代以来的学术更是超越国界的、国际性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大事业，它不仅仅为个别人的利益服务，也应该为全人类全世界的利益而服务。高等教育的非功利属性和科学的相对超越性(普遍性)，是不以任何人、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能够而且必须跨越国家边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再生产。即便在国家间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学术文化交流也没有停止过。具体到美国的大学，也是在二战中由于大量延揽了欧洲(包括德、意等国)杰出人才而凭借战争红利迅速发家的。由此，在世界的大动荡中，国际学术中心完成了从欧洲到北美的洲际大转移，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从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类的历史一旦进入全球历史，就已不可逆转。全球化因此向纵深推进。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以深远的洞察力揭示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通过生产、生活和交往，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而今，世界已成“地球村”；人类社会已不仅仅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而且实实在在地融合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人，也许是“大地上的异乡者”，但“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大地相联系。没有人能长久地逍遥于桃花源，没有人能自外于社会而遗世独立。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的相互融合、交错缠绕已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将从发达地区扩张至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并对全球各国都产生深刻影响。显

然,知识、教育的国际化与资本的国际化是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的。与知识经济相伴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必然借助国际平台,吸收新知识、传播新知识、应用新知识和创造新知识。因此,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是大势所趋。

高等教育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学术事业尤其如此。因此,它是不可能被完全孤立的。要在西方与包括中国及其他国家之间实行彻底的人为切割或隔离,显然并不现实,这完全违背了高等教育和学术事业的本质属性。同理,此种意图注定不可能得逞。因此,在当今及稍后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的快速国际化步伐可能会有所收缩,方向会有所调整甚至发生局部的逆转,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大的格局亦不可能逆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许会将操纵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作为政治伎俩,但是这些国家本身的教育发展和学术事业仍有其自身需求。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教育学术交流合作虽然将受到某些影响,但也不可能因此终结跨国交流。当今的一些乱象,亦只是特殊形势下的阶段性的停摆、收缩或回退,不可能长久如此。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早已时时、处处经历着“流动的现代性”,知识、技术、产品和人员等方方面面的高密度流动早已成为常态。高等教育早就不以国界自我设限。此外,人类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态势。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动的全球性,从经济基础的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交往的全球性,以及科技、教育、文化活动的全球性,而这又内在地要求人员流动的全球性。这一大的趋势,在可预期的将来是不可能根本逆转的。对此,我们理应有充分的信心。

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今后,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应对得当,完全可以更好地为世界的繁荣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 同舟共进 2020年第7期目录

### 专题策划

#### · 创新前行：广东企业故事 ·

良好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伊 默
深圳与顺德：粤商精神“风云际会”	金心异
腾讯的过去和未来	陈季冰
大疆创新之路	骆轶琪
百年王老吉：时尚凉茶王	彭 颖
<b>走近大家</b>	
我与叶永烈	吴东峰
彼之师，己之友——冯雪峰与鲁迅	张守涛
鲁迅与母亲：两代人的隔膜与融通	成 健
<b>岭南往事</b>	
玉洁珠明岭以南——记岭南女学者沈玉清	王美怡
郑观应在广州	陈晓平
彭湃后人与中国济难会的一段缘	陈宝荣
<b>人生百味</b>	
浊酒一杯天过午——汪曾祺与朱德熙	徐 强

周采芹：最早的华裔邦女郎与最霸气的“贾母”	王 鹤
唐瑛：风华绝代，优雅一生	李 舒
<b>往事历历</b>	
迷失“满洲”	王 龙
——日本女作家牛岛春子的二战反思之路	
皖南事变前后的蒋介石	林辉锋
张宗吕的另一面	克 念
<b>文化广角</b>	
故人日远：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金兰之交	聂作平
莫起天涯万里心——苏辙在岭南	韩带文
<b>饮食文化</b>	
风雅“茶圣”陆羽	林 硕
中国人为什么爱吃蟹	维 舟
<b>舟边絮语</b>	
民国教育的贫富差距	张 嶽
清末如何管理公司	王国华

### 邮发代号：46-56 月刊

可直接汇款到杂志社发行部或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  
 定价：10.00元，全年120元（港澳地区300元）  
 地址：广州市华强路7号广东省民主大楼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编：510623 订阅电话：020-38306908  
 邮箱：tongzhougongjin@126.com

(以实际出刊目录为准)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冯天瑜

“生态”不仅是指人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包含“天人”和“人文”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综汇而成的“文化生态”的历史演绎，正是笔者病中续撰《中华文化生态论》中所探究的范围。2019年底至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人类遭遇一场空前规模的生态危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重挑战。这场几无一国幸免的疫情带来的灾难之一，是沉重打击各国经济：短期内工厂停摆、航班歇业、车辆归库，曾经如火如荼的物质生产及交换活动萎缩。经济下行使各国政府企业家、劳工以及广大工薪阶层，无不忧心如焚。但是，也另有景象——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发明并广为使用的各类发动机冒烟骤减，天地忽然明净了许多。

以笔者所在的武汉为例，平日站立珞珈山顶、东湖之滨，可以看见的从武汉钢铁公司方向飘散过来的滚滚烟尘，在封城期间已然消弭，抬头仰观，三镇碧空如洗，久违了的蓝天白云回归视野；低头看，宽阔的街道竟有松鼠、黄鼠狼大摇大摆地漫步……

又从电视新闻获悉，曾经游船如织、漂满秽物的意大利“水都”威尼斯运河变得清澈见底，水母、章鱼频现，鸥鸟在河中及岸边嬉戏，

甚至出现鳄鱼光顾的罕见场景；罗马诸广场长出青草，海狸鼠、乌龟、野鸭踱步街头。欧洲航天局发布的卫星照片显示，西欧多国的生态面貌明显好转。以烟尘弥漫著称的印度旁遮普邦，人们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北边二三百公里之外的雪峰，污浊的河水也变得明净。更多国家的气象卫星传回的数据显示，全球的二氧化碳浓度下降，其他污染指标下降，地球的上空变得“干净”了。

上述情景报告了一个信息：当人类减轻对环境的压迫（这次是不得已而为之），地球立即展示出夺人心魄的美丽。这无意间反证一个事实——

人类在过往的若干世代，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三四百年间，对生态环境破坏何其深广：化石燃料的焚烧，使碳排放量远超大气层的承受能力；化肥、农药喷洒，增加了产量，却使作物和土壤毒化达到难以挽回的程度；原子能可以发电，可以用于医疗，却曾经夷平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子反应堆事故，致祸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至今余痛未息；而多国拥有数万枚核武器，足可千百次摧毁全球，成为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工智能延伸了手足、耳目乃至大

脑,机器人可以从事繁难、精密的劳作(包括战胜国际象棋、围棋世界冠军),但又可能取代人、反控人,使人类边缘化;转基因技术促成农畜品的高效生产,也有人担心会危及人类健康和生育能力;至于修改基因、创造新物种的生物工程,更可能潜伏着肇祸整个有机界的危局……

大疫迫使我们暂时放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稍事喘息的地球,立即对人类做出良性回应。这是疫情对我们的一次重大启蒙:善待环境,环境必还以善报;反之,人类必遭自然铁腕的回敬。这种回敬的力度,将因人对自然压迫的加剧而继续增强,如若不能减缓这种超负荷的

压迫,有机生命体的唯一家园——地球,终将抛弃肆无忌惮的人类。

保护生态环境、维系生态平衡,是人类的第一要务。以当下言之,复工、复产,是列国的迫切需要,但全面恢复经济活动以后的人类,不应再度摧残生态环境,更不该加剧人际间、国家间的恶斗。而我们已经看到、听到,这种重回以往劣行的可能性,时下正严重存在。借用捷克反法西斯战士尤利斯·伏契克的遗言:“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善待人类的家园,善待人类自身,皈依先哲张载的名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这应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进路。

## 奈何百年流感在

◎ 刘金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猖狂肆虐,这不由得让人回想起1918年全球性大流感的暴发蔓延,那场恣肆嚣张的大流感至少造成五千万人死亡。美国医学研究者杰米里·布朗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假如把1918年的流感病毒(N1H1)放在当今美国,至少也会有两百多万人被病魔吞噬。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经全球医学界执着努力和不懈奋斗,但流感依然是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是人类最强劲的对手和最具杀伤力的天敌。可以说,一部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流感相抗争并不断取得败绩的历史,流感迄今正在并将继续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和

殊死考验。有鉴于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杰里米·布朗博士,利用其对1918年大流感衍生发作、防控治疗以及疫后处理的研究成果,依据其敏锐的职业观察和丰富的从业经验,通过与世界顶尖流行病专家、病毒研究人员、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以及医疗物资管理者等群体进行对话交流,历时三年撰写了《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为人们深刻认知和有效防范流感提供了一个重要文本和有效工具。

作为一种无法预测的疾病,流感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潜伏性、变异性、传染性等显著特点,

其暴发不遵循任何规律和任何逻辑，人类无法对其做出精准研判和有效防控。于是，在常见疾病和“致命瘟疫”的双重面具下，流感显得神秘诡异、高深莫测，以至于各国政府卫生机构、社会公众乃至国际流行病顶级专家都在焦躁紧张与后知后觉的两极间摇摆，难以摆脱被动挨“侵”、屡屡受挫的尴尬处境。即使如此，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从未放弃探寻流感病理机制和索解其活动规律的努力，国内外一代又一代流行病专家坚毅执着地寻求破解流感病毒的“秘籍”。杰里米·布朗博士多年来对流感进行了充分细致的文献研究，立足于欧美医学界的既有成果，结合自己行医的感受体会，运用多年临床实践经验，以通俗的语言表述和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写就了《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这部专著。在这部厚重的学术著作中，布朗博士围绕流感治疗、病毒的前世今生、1918年流感病毒、流感预报和寻找流感疫苗等内容，针对与大流感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详尽梳理和独到阐述，系统回顾了人类对抗大流感的百年历程，深刻反思了人类遭遇大流感的痛苦经历，系统总结了人类与大流感斗争的经验教训，初步勾勒出一条治愈大流感的未来路线图。作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流感的一部颇有分量的专著，本书主要在人类对病毒的认知、应对流感的方式和为下次大流感做准备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度思考和深入抉发，对我国医学界、医疗界和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黑格尔说过，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未吸取过任何教训。人类在一次次大流感中吃尽了苦头，却在思想认识层面没有明显长进，像此书开篇所精辟指出的那样：“人们的身体处于危险之中，而大脑仍停留在舒适区。”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流感是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威胁人类生命的疫病，是对人的生命构成致命危害的传染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次病毒性大流

感的危害程度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自从文明出现在这个星球上至今，流感就一直与人类如影随形，作为地球上的十大致命疾病之一，流感始终困扰着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自十六世纪以来，在以往四百多年时间里，留下确切文字记载的大流感至少已经发生了三十多次，其中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的六次大流感现在提及仍然让人心有余悸。肇始于美国的1918年大流感给人留下了一段心惊胆战的黑色记忆，它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还要残酷还要悲惨，成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浩劫，共造成五千万人丧生，超过五亿人感染；1957年，H2N2型流感夺去了全球两百多万人的生命；1968年大规模禽流感再次于亚洲爆发，死亡率虽然较低，但给人们造成了巨大惊恐；1975年和2009年先后暴发于美国和墨西哥的猪流感，分别导致约三十万和五十万人口死于疫情；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又遭遇了SARS、MERS、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病毒引发的流行性疾病，使人类生命安全不断遭受重创。2019年美国境内再度发生病毒流感大传播，这次疫情导致一千九百多万人感染，约有十八万人住院，至少一万人死亡。本书和媒体披露的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提醒和告诫我们，只有加深对病毒大流感的了解和掌握，提升人们对病毒大流感隐蔽性、突发性和危害性的认识，切实增强对病毒大流感的危机意识和预防观念，努力消除麻痹心理和轻视情绪，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才能有效地控制和抑制病毒性大流感，才能将其危害降到最低程度。正如书中所强调：“当人们小心谨慎时，它（流感）就悄然离去，让病人自愈，当人们放松警惕时，它又肆意蔓延、不断进化。”

布朗博士在《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中认为：“当下人类依旧没有解决流感的完美方案，我们应对流感的技术手段存在各式各样的缺陷

以及诸多限制。”流感是一种非线性的混乱的不可知的疫病，尤其是一旦某种禽类病毒传染给一个人，那么这种病毒不是与原有的人类病毒重新组合，就是直接突变产生一种新型的、在人际间相互传播的病毒，于是一场新的大流行性流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尽管现代医学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并显示出种种优越性，但在治疗病毒性流感方面仍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医疗技术的进步使人类陶醉于虚假的安全感，然而，季节性流感的反复出现以及大流感的威胁暴露了技术进步的虚假”。与1918年大流感对世界的消极影响迥然不同，当下人类已经发明并拥有了抗病毒药物、防治疫苗、诊断测试仪器和先进监测技术，其中许多科技手段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与一些国际性权威机构携手合作研发的，但是流感超强的狡诈性、欺骗性、不可预测性和严重危害性，不仅给现代医学制造了众多麻烦和严峻挑战，而且给人类带来了万般惊慌和极度恐惧。例如，人们不知道为何1918年的流感病毒偏爱年轻人，或者为何它对人类中的某些人而言只是一种轻微的疾病，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致命的疾病。假如不掌握流感病毒的这些基本特征，人类是无法为防控工作充分准备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2017年公布的《流感大流行计划》中写道：“大流行性流感不是理论上的威胁，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反复发生的威胁。”“即便如此，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大流行性疾病会何时暴发，也不知道它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如其所言，一场大流感甚至比一次大规模生物恐怖袭击给人类造成的伤亡还要惨重，而且较之其他疾病更有可能频繁地发作，这表明病毒性大流感是一种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在危害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医学是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艺术，也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艺术。在书中，作者从当今国际防治传染病的最前沿出发，对流感的预防、病毒的控制、疫苗的研发等关键问题做了原则阐述和宏观展望，指出：“1918年那场流感大流行之后的百年间，我们对流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它的遗传密码，它是如何变异的，它是如何使我们生病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有效的方法去战胜它。”认为“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以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为代表的医学革命尚未完成”，强调“经验和教训，也许是人类唯一拥有的可以与流感抗争的免疫力。”

病毒性大流感的传播不受国界和地域的限制，病毒大流感的防治是一项牵涉各方的系统工程。在病毒性大流感面前，每个人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真诚希望每个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能够阅读一下《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这部融合了医学史、病毒学、诊断治疗学、经济学以及流行病学、卫生保健政策、疾病预防原理等方面知识的著述，能够研读一遍这本讲述医学故事、普及科学思想、传递人文精神的著作，在今后面对病毒性疾病侵犯时，多一些理性和沉稳，少一些恐惧和不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书中反复提及和多次引证的泛滥于一战、铭刻于史册的1918年病毒性大流感，与当前正在全球肆虐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极为相似，我们不希望历史惊人相似的一幕重新上演，我们期待拥有丰富经验（比如1918年大流感时，各国政府要求居民佩戴口罩、居家隔离、错时开工、对违反者实行罚款监禁等）和惨痛教训的当下人类，以历史为参照镜鉴，以科技为制胜法宝，通过携手合作尽快摆脱“疫”魔的缠绕与摧残。

## 回首师门感易生

◎ 彭晓玲

—

同治十二年(1873)乡试,欧阳中鹄成功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他第一时间去拜访了同乡好友谭继洵,谭其时任户部员外郎。谭继洵热情接待了他,留他住在浏阳会馆。此次会试未中,欧阳中鹄只得再去参加优拔贡廷试,倒取了一等,得任内阁中书,正式进入仕途。大小也是京官,几个浏阳籍京官好好聚了一次,欧阳中鹄也就安心地开始了京城生活。这年七月起,谭继洵聘他在谭家家馆教读其子嗣襄、嗣同。时欧阳中鹄二十五岁,嗣同方十岁。

欧阳中鹄学术上很推崇王夫之,王夫之号“姜斋”,他取“瓣香姜斋”之意,自号瓣姜,以示对王夫之的崇敬。也因此,在给谭嗣同兄弟教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时,不忘传授王夫之的学术思想。虽然王夫之的学说深奥难懂,但他的讲授深入浅出,谭嗣同一听就懂,对此产生了兴趣,并终身推崇这位伟大的学者。

光绪二年(1876)春,京师流行白喉,谭嗣同的二姐谭嗣淑患白喉病,听说谭家人不好好照顾嗣淑,母亲徐五缘很着急,带着长子谭嗣贻前去探病。不想此病非常可怕,母子都感染了白喉病,连带谭嗣同也染上了。如晴天霹雳,五天之中,母亲、长兄及二姐相继被病魔夺去

生命,不到十二岁的嗣同也昏死过去。当时,谭家在这次白喉流行病中死了六人,甚是凄惨,人心惶惶,家人竟没有人敢去为徐夫人母子三人操办收殓之事。欧阳中鹄悲伤之余,毅然带人前往浏阳会馆,亲手将殡殓之事办理妥当,将几人的灵柩暂厝于寺庙。

那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嗣同自一月下旬发病,直至四月中旬尚不能起床,但除了欧阳中鹄,几乎没有人真切地痛惜这个病中的孩子。谭继洵在寄回浏阳的家信中写道:“嗣同于万死之中幸获一生,现尚辗转床间未能起立,仅食稀粥、蒸饼,喉间似有物阻,必因溃烂尚未生肉复原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阳中鹄都是嗣同的安慰和依靠,一往情深地关怀着他的成长。嗣同将老师当作自己的父亲,在老师那里得到了家庭所得不到的温暖,借以度过艰难的岁月。欧阳、谭之间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情谊。嗣同不光对老师的“片纸单词珍若拱璧”,每次回浏阳,都要到欧阳中鹄家去看望老师,往来很密,乃至欧阳家上上下下都认识。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谭嗣同正在浏阳修族谱,在欧阳中鹄未能回浏之前,主动替老师监修他父母的坟墓,在山上一住就好几天。

光绪三年(1877)八月,谭继洵升任甘肃巩秦阶道,冬天便请假携家眷返浏,以安葬头年

去世的徐夫人。欧阳中鹄随谭家一同回浏阳。不想第二年,父亲欧阳向曦去世,欧阳中鹄乃居家守制。之后,欧阳中鹄先后入杨昌浚、瞿鸿禨幕府,在杨府负责教读杨氏子女;在瞿府时,瞿当时正在浙江学政任上,主要协助他整顿“诂经精舍”,曾代瞿撰《申订诂经精舍规约》、《书申订诂经精舍规约后》,体现了他主张继承阮元“专免实学”、“非以弋功名”的办学宗旨。至光绪十三年(1887),欧阳中鹄再次入京充会典馆协修,此时好友刘人熙亦为会典馆纂修,两人在京师得以朝夕与共,诗酒唱和。欧阳中鹄本不善作诗,正是在刘人熙、张百熙的带动下,诗兴大发,诗作连连,五言古诗《效陶》二十首、《咏怀》数十首等,都是作于此年,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帝大婚,欧阳中鹄临时充大婚典撰文,及上徽号典礼撰文。至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欧阳中鹄充武殿试填榜官。这一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眼见当时朝廷种种妥协,欧阳中鹄非常失望愤慨。虽正值战中,急需任人之际,欧阳中鹄仍以父亲的坟墓被水所浸伤,坚决请假回籍修墓,受到很多人非议。欧阳中鹄很是受伤,说阁臣陆润庠等也请假南归,而独指责他,实在不公。好在王芝祥给予他理解,在《致王铁珊舍人芝祥》信中,欧阳中鹄辩解道:“此次乞假,出于义无可逃,唯求此心之安。论者不察所以然,多以去非其时,疑为规避。”

欧阳中鹄经天津坐海轮至武汉,曾专门拜访了谭继洵、陈宝箴,坦陈自己对战局的想法。欧阳中鹄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主张趁未大败时言和,还可多些言和的条件。更难得的是,他在这些友人面前极力阐述了朝廷急需变法,认为非废除当时之科举制度,改习西法不行!在浏阳士人团体中,他最早提出变法主张。至十一月十五日,欧阳中鹄离开武汉,而谭嗣同与唐才常却在同一天双双从浏阳到达武汉,计划去考“两湖书院”,师生由此错过了见面。

晚清浏阳士人之学,以程朱之学为根本,而近学王夫之(船山)。当然各人又有所不同。刘人熙与欧阳中鹄,同样是宗师船山,刘人熙主要取《周易内外传》、《张子正蒙注》,而欧阳中鹄则最重《俟解》、《四书训义》。王夫之“器变道亦变”的思想,也成为欧阳中鹄当时主张变法的依据。当此社会处于急剧变化时期,包括欧阳中鹄在内的很多学人一改乾嘉朴学作风,而致力于通经以致用,从而找到了《公羊春秋》,以为找到了治世之良药。后来王闿运学生廖平以及深受廖平影响的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则走得更远,以托孔子改制,倡导维新变法。

甲午战争创痛巨深,欧阳中鹄痛定思痛,不光看到天下之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更认识到西方经济军事的强盛和政治法度的优长。于是,欧阳中鹄明确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各国的政法、科技、工商业,直至语言文字。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朝野上下,必尽更新,礼所谓可与民变革者,皆变革之;其不可变革者,如正纲纪,一道德,愈从而敦厚之;积中不败,然后鞭笞四夷,是以有酌取西法之论。”他还断言:“果变一切法,十年之间,必足自立。”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震惊,对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次打击极为沉重。浏阳士人中应该是谭嗣同最早得到消息,因为他此时正在湖北抚署帮助其父处理政务,很多公文、函牍他都最先读到。谭嗣同极为愤慨,心如死灰,几乎想出家为僧。欧阳中鹄由于僻居浏阳,到四月中旬始得闻此消息,竟愤恨欲死,坐卧不宁。他在《复陈曼秋》信中宣称:“四月二十后,闻和议已定,每私居啜泣,愤欲自裁……”他在《复蔚庐》信中痛陈:“和议已成,于四月十四日换约,闻之愤恨欲死。”他在《复护湖广制台谭敬甫中丞》信中悲叹:“中鹄本无宦情,自闻和议,愤恨欲死,此心更如槁木死灰。”欧阳中鹄于这年写给友人的信函中,无不长篇累牍地分析当时形势,可见其愤恨归愤



恨,而其心则无时不为国为民忧虑。

此时,谭嗣同深受刺激,他决心抛弃科举八股、考据辞章等旧学去寻求新学。但“新学”究竟是什么?一时还显得比较模糊。是年十二月上旬,欧阳中鹄从浏阳致函其时正在武昌的谭嗣同,提出形势如此,个人何以自处?给谭嗣同以极大的震动。谭嗣同辗转反侧,深刻反省并思考国家命运和前途,由此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变法,以改变“养民卫民教民一切根本大法”的局面。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夏,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基本形成。五月二十三日,欧阳中鹄再次致函谭嗣同痛论时局;谭嗣同、唐才常等认真拜读先生手书,一字一泪,不由泪洒衣襟。

## 二

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时代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为何无法使国家强大起来,无法对抗日本呢?在谭嗣同看来,洋务运动不过是细枝末节,他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讲求变法必先从读书人开始,要改变读书人始必先改革科举,使人人能各自精通一门,各自力争在实学上有所作为。为此,他认为最急需下手的事情,就在振兴实学,就在开算学馆培养数学人才。

与谭嗣同有相同想法的,还有其好友唐才常、刘善涵。当时唐才常和刘善涵就读于两湖书院,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并反复商议如何引导人们参与维新变法,如何兴办算学馆。于是,由唐才常上书浏阳士绅之首谭继洵,请其利用自身影响去说服湖南巡抚,酌拨浏阳南台书院膏火之半,以设立浏阳格致书院,并亲自带头捐廉予以倡导。但谭继洵却认为还是遵循一贯的规矩好,没有必要去为天下先。此路不通,他们转而竭力说服老师欧阳中鹄。欧阳中鹄在浏阳颇有名望,而且倡导变法,他倘能率众办学,应能事半功倍。

谭嗣同在闰五月初九接到欧阳中鹄的信后,写了一封洋洋万余言的回信,在信中全面阐述了对时事的看法与痛苦忧虑,极言变法之必要,内容涉及开议院、办工矿企业、办学校、改科举等许多方面。此文成了谭嗣同在甲午以后愤然而起的一篇变法宣言,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超出了其师欧阳中鹄,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还特别阐述了开办实学的思想和倡立算学馆的计划。五月十日,唐才常亦致信欧阳中鹄谓:“一乡一邑,如能设法稍开风气,或培植一二人才,为将来驱驰之用,即于事不为无补,而可启一省之先声……”

欧阳中鹄认真读过谭、唐关于举办格致书院的来信,心潮澎湃,但又有所顾虑,担心浏阳儒生们依然醉心于科举,会来阻挠新学。正在欧阳中鹄犹豫之际,而当时政局对变法也有利,清政府在五月十三日下发保举精于天文、地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者的上谕。湖南又以陈宝箴任巡抚,亦有心变法图强,且当时湖南学政江标也支持新学。这些条件均促使欧阳中鹄下定设立算学馆的决心。于是,欧阳中鹄认真考虑成立算学社一事,且为之行动起来。

湖南学政江标于七月按临浏阳,各乡秀才集中在县城参加岁考。谭嗣同会同唐才常、刘善涵、涂儒嵩、罗召甘等人十多名秀才,联名向其递交了由刘善涵起草的《上江标学院禀》,申请将南台书院永远改为算学馆,并会同公正明白的绅耆,细定章程,妥为办理。江标对倡立算学馆之事极为赞赏,批文道:“浏阳城乡五书院,旧皆专课时文,近拟将南台书院永远改为算学馆,与四书院文课相辅而行。”并札示浏阳知县唐步瀛立案。当此时,大多数以反对洋务、标榜正統的秀才一片哗声,对浏阳设立算学馆一事大不以为然,诋之为妖异,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并且相互告诫抵制算学馆的余毒。后来,随着《兴算学议》、《书兴算学议后》的出版,士子们了解到变法的原因及目的后,纷

纷表示理解或支持。

谭嗣同北游访学后,与老师欧阳中鹄在思想上开始出现分歧,师生关系已有所疏远。据欧阳中鹄所说:“及(谭)次年入京赴行,宗旨遂变。尝以书来,言誓发宏愿救四万万人,其语多释理最高明处,知己为异学所引。丁酉(1897)冬归,与语间不相洽,视弟文字不甚措意。”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中旬,欧阳中鹄进入陈宝箴巡抚幕府,参与省中新政,师生再度共事。鉴于原先陈氏幕僚罗正钧、黄修原等人与维新派关系不佳,维新人士对欧阳中鹄进入陈氏抚幕,极表赞同,并大力促成之。欧阳中鹄进入抚幕后,自然而然成为陈氏父子联系维新人士,特别是谭、唐的中介人。

当省内外守旧派的压力滚滚而来时,陈宝箴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摇摆于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转变始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矛盾最初产生于谭嗣同和陈三立之间。三月三日,谭嗣同在《湘报》刊登康有为第五次上光绪皇帝书,并撰写按语加以赞美,引起陈三立的强烈不满,陈认为“嗣同等钻营康名士,自侪于门人之列”。欧阳中鹄也表示不快,认为谭嗣同并非康有为门人,为什么要自称门生?谭嗣同对陈三立也早有不满,认为他平日诋毁梁启超、诋毁唐才常,及力阻不许聘康有为来湖南。他转而指责陈三立对康有为自揣学问不如人,而又不胜其忌妒之私,于是诽谤他取笑他。

正因为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的攻击,又遭到陈三立、欧阳中鹄等维新人士的不理解,谭嗣同、唐才常变得更为激昂。谭嗣同在致欧阳中鹄书中写道:“才常横人也,志在辅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虬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

至三月八日,谭嗣同、唐才常在《湘报》刊

登了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一文,顿时引起震动,陈宝箴、黄遵宪认为过于惊世骇俗。在黄遵宪看来,日本有渐进、顿进二党,现在即便求顿进,也难以快速取得效果,不如采用渐进法,报纸上刊登的文章不要太激烈。陈宝箴反应更为强烈,指责其“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并“命瓣姜师致书报馆以责之”。陈宝箴公开出面干预《湘报》言论,这还是第一次。接信后,唐才常与谭嗣同非常愤慨,立刻回信为之辩护,该信以《复欧阳节吾舍人论报书》为题刊登于三月十一日的《湘报》上。

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以“为乃翁五十祝寿”为由,于二月中旬离湘赴沪,本拟诸事完毕后仍然返湘,故并未辞去总教习一职。梁走后,守旧派蜂起攻击,扬言已在学堂读书札记中,发现粤人教习的激进批语,涉及批评君权及反满族意识,称之为“悖乱实据”,要求撤换学堂教习。维新人士认为此举证明陈宝箴对他们已有疑心,其心中的惶惑与愤慨可想而知。唐才常甚至认为,王先谦、叶德辉攻击学堂事出有因,欧阳中鹄因为谭嗣同及他赞美康有为而老大不高兴,就在陈宝箴面前说了坏话;早就听说陈宝箴想让王先谦代替熊希龄,以叶德辉担任总教习,看来陈宝箴已经和他们握手言欢了。

陈宝箴未必有以王、叶主掌学堂的计划,然而确有撤换粤人教习的打算,但因遭到黄遵宪、熊希龄的反对,一时难以实施。整顿学堂暂时未果。闰三月二日,时务学堂添聘教习,在增加唐才常、欧榘甲二人的同时,又增聘陈氏友人周大烈为教习,算是双方的一个妥协。从当年闰三月起,陈宝箴迫于守旧派压力,开始采取措施限制维新派,他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是整顿学堂。闰三月中下旬,陈宝箴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读书札记。到四月下旬,在陈宝箴的授意下,时务学堂决定改定课程,振兴实学,并正式宣布:“现在时务学堂学生于经学已通大义,拟将课程改为特科六门,由教习择各学生

性之相近者分门教授,以备经济特科之选。”由此,改变了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拟定的教学方针和课程。

经此事件,维新阵营的内部关系趋于紧张,气氛大为恶化。闰三月二十日,又发生了出时文题事件,在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是日,岳麓、求忠、城南三书院官课考试,由欧阳中鹄出题。时文本来是维新派极力反对、强烈要求废除的,欧阳中鹄自己早在甲午年间即主张废除,早几天陈宝箴在南学会演讲,也认为时文之弊病极大,宜废除。且事先皮锡瑞等一再要求不出时文题,而改出时务题,欧阳中鹄也勉强答应。临到考试时,发现出的仍是八股时文题,维新人士顿时哗然。皮锡瑞写道:“此等题出自何人?令守旧者鼓舞欢欣,维新者扼腕太息!如此办法,必无振起之望。”此时,维新人士对欧阳中鹄极为不满,视其为维新变法的阻碍。唐才常也说:“乃师办事本无决见,好听小话。浏阳开化,并非其功,到此专听污吏赖子佩之言,荧惑上听。”

事实上,陈宝箴、欧阳中鹄在对谭、唐等维新派采取行政措施的同时,也开始采取措施“厘正学术”,以便与维新派的“平等民权”学说划清界限,在思想上保持距离。而对于诸生试卷,欧阳中鹄进行了大量的批阅,特别在某些言论过激的试卷上,其批语多至千余字。何来保既是校经书院学生,又是《湘报》主要撰述者,他属于与谭嗣同、唐才常一类的维新激进派。其关于《墨子·尚同》篇的策论,明显主张民权思想,故遭到欧阳中鹄的批驳,且将其名次置后。至此,浏阳变法以来,欧、谭师生之间所潜伏的深刻思想差别终于凸现出来。

谭嗣同于闰三月十八日为组建团练事返回浏阳,逗留将近半个月。不料在此期间,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而调阅札记及出时文题时他都不在长沙。四月五日,谭嗣同由浏阳回到长沙后,即和唐才常一起与欧阳中鹄通过书

信进行交涉,据理力争,力图为学堂等事“雪清此谤”。谭氏在信中说明出时文题一事为何引起“群然愤怒”,谓维新人士对欧阳中鹄“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耳”,并要求与欧阳中鹄作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认为“凡事总以直说为好,若愈隐则愈误”,希望从源头讲明学术宗旨,“不然,则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

出时文题还有一个原因是阅卷较易,但欧阳中鹄的解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应当是湘省官方遏制维新激进派的措施之一,如同调阅时务学堂札记一样。随之,谭嗣同、唐才常在《湘报》馆主笔地位被黄膺、戴德诚代替,《湘报》不再刊登激进言论。为此,失去陈宝箴的支持,谭、唐等维新派在湖南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曾经引人注目的南学会讲学也难以维持下去了。四月十三日,南学会发表《申订章程》,宣布讲学暂时休会。“天时渐热,人多气郁,难以宣讲,本学会议暂停止,俟有阴雨凉爽时,或所讲新理及所闻时事须集会友讲听时,当择期预行刊报布告”。

与此同时,陈宝箴密折保荐经济特科等人才六十人,其中以欧阳中鹄为首,在保送他为经济特科的考语中,称赞其“学术正大,持论平通,不为偏激”。而欧阳中鹄以为既为陈宝箴幕僚,陈氏如此推举保荐,自己还是避嫌为妙,故极力推辞。不过,当时因欧阳与维新激进派有隔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诸人在京辅佐光绪帝变法,诸人也不会吸引欧阳中鹄进京。

维新派在湖南备受压抑的情况,至四月下旬出现转机。四日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举荐著名维新人士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光绪立即采纳其建议,发布上谕,准备召见康有为,并令黄遵宪、谭嗣同赴部引见。处于困境之中的谭嗣同得此消息后感叹:“此行真出人意料,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临行前数日,谭嗣同写了封信给

欧阳中鹄,准备约唐才常一起去欧阳中鹄寓所作竟日之谈,专门讲明学问宗旨,并就此辞行。五月九日,谭嗣同赴欧阳中鹄处辞行,同时向其说明维新派关于救亡图存的计划。次日,欧阳中鹄致信谭氏,劝其勿锋芒太露,韬光养晦,暂时退隐,“平其心,养其气,敛其才,藏其智,以俟积厚流光,异日出而倡其学”。但他的劝谕未起半点作用,此时师生在思想政见方面已存有很深的隔阂,最后一次谈话不欢而散,欧阳中鹄唯有连连叹息。

在此,欧阳中鹄还强调指出双方学术的原则区别在于:“吾儒是礼,是文家兼质家;汝学是墨,是释,是耶,是纯乎质家。然流弊太多,不能自立。”此种分析很客观到位,欧阳中鹄是较纯粹儒者,奉行中庸之道,虽主张变法维新,但只准备以渐进的方式来实行。而谭嗣同由于其家庭生长环境的原因,形成其躁急偏执的个性。欧阳中鹄在与他相处的二十余年中,一直努力化解其戾气,可惜失败了。再加以自丙申北游,谭嗣同接触西方先进科技知识以及基督教、佛教,思想为之大变,主张激烈的变化方式,特别是力推民权平等的思想。这些是欧阳中鹄断断乎不能接受的,师生分道扬镳也就成为必然。直至谭嗣同喋血菜市口,欧阳中鹄还是认

为“临刑谈笑自若,可谓壮,惜乎未闻道也”。

### 三

戊戌变法失败后,随着陈宝箴被革职交卸,湖南守旧士绅势力极大,叶德辉诸人在维新运动中及运动后大出风头,大力攻击维新人士。欧阳中鹄是谭嗣同最著名的老师,又是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参与者,在当时那种风声鹤唳的形势下,受到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

谭嗣同被杀后,其灵柩由胞侄谭传赞与谭嗣同两个忠实仆人于九月十八日运达长沙。九月下旬,谭嗣同灵柩运抵浏阳,安置在城外茅坪。谭嗣同是被朝廷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杀害的,在当时看来极不光彩,故谭家不准备举行悼唁仪式。欧阳中鹄念师生之情,禁不住老泪纵横,遂由长沙返浏,忍痛亲自主持丧葬事宜。他遵从谭嗣同先前信佛的意愿,特地延请僧人诵经超度,做了七天道场,还烧了纸钱等。欧阳中鹄当时亦大受谭嗣同一事牵连,而他仍能出面为谭嗣同经办后事,其气节也令人钦佩,也非一般人可做到,真正尽了师生情谊……

## 陶澍寄梦“野士”左宗棠

◎ 徐志频

陶澍与左宗棠这对年龄相差三十三岁的朋友,从“忘年交”到结为儿女亲家,殷勤寄望,相互成全,过程完全是一部写实版的传奇。

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从胡林翼口中第一次听说左宗棠其人,对他作了间接了解,有了些许零碎印象。如果没有后来的见面,陶澍

不会轻易肯定左宗棠。

陶澍约见左宗棠，一则出于胡林翼的举荐，二则被左宗棠过人的文才打动了。

举人左宗棠与两江总督陶澍第一次见面，时间是1837年，地点在湖南醴陵邑侯治馆舍。

陶澍返乡之行，本为专门请假回安化小淹给父母扫墓顺带探亲。官轿途经醴陵，醴陵县令临时安排高规格接待。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受县令委托，写下一副欢迎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短短二十六字，既点出了陶澍受道光皇帝两次接见的殊荣，又将其先祖陶侃督八州军事的光辉事迹合情合境嵌入，现实与历史交融，文字超凡脱俗。陶遂引左为知音，结为忘年交。左宗棠自述相识经过：“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

青年左宗棠虽然外见盛气，内藏傲骨，但到底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乡下小举人，这次被陶澍虚怀若谷的心怀与礼贤下士的风度感动得一塌糊涂。他回去后跟妻子说：“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用湖南土话说，陶总督功劳大得下不得地，名气大得吓死个人，他如果不是祖坟开了坼，哪里有机会结识这么牛的朋友！

这次邀约见面，为左宗棠在官场内做了个活广告。一年后，两人约定在南京总督府见面，结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开始被两江总督陶澍有计划、有节奏地纳入到他经营出来的庞大人关系网。

陶澍在人生最后一刻做奋力一拉。他为什么如此赏识左宗棠？

乾隆四十四年(1779)1月17日，陶澍在湖南安化县小淹乡陶家溪出生。

陶澍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晋朝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的陶侃，陶侃的曾孙即广为人知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后唐同光元年(923)，为躲避战乱，陶侃后裔陶升，从江西吉州迁来湖南安化小淹乡。元末兵乱，陶升后裔只剩陶舜卿一支，陶氏第十二世祖陶志凤迁到石螃溪定居下来，到陶澍已历十六世。

与多数士子受母亲影响而成长起来不同，父亲陶必铨影响陶澍一生至深。陶必铨生在农家，却是个私塾先生，一辈子除了教书，没干过别的行当。虽然蜷居在偏远安化深山老林，最远也没走出过湖南，但陶老先生志气不小，从他给陶澍的取名便可反映出来：“盖其有以泽苍生也。”寄望儿子恩惠泽被天下百姓，自己当然更希望如此。

陶必铨发奋读书，方法有点特别：同时摆开几桌书，一本一本全翻开，将内容贯通起来，对江吟诵，先背下再作批语，观点“多前人所未发”。有本事同时打开几十本书一口气看下去的陶必铨，桌上摆的都是些什么内容的书籍呢？经学。经学即先秦各家学说要义，汉代独尊儒术后，经学特指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宋、明两朝，流行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清军铁骑入关，将沉醉于“修炼心性”的读书人惊醒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亿万华夏子民，怎么会亡于只有十五万军队，而且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满族人手？处山高皇帝远的大山中的陶必铨痛苦中寻找原因，结论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教中国士人“空谈理心，不理实政”，才导致明朝亡国。

清朝初年，顾炎武以思想家的眼界一针见血地指出：“舍经学无理学。”

亡国之耻，理学之痛，让陶必铨读起经学。

大清帝国统治者很快发现，汉族读书人如果攻读经学，势必干预国家政治、经济。为了管住士人的思想，朝廷将理学立为国学。体制内的读书人按着朝廷设计，纷纷进了圈套。

陶必铨居地偏远,乃民间教书匠,朝廷风气力不能及。他继续读着经学,说着大话,怀着理想,没有人管。

陶必铨沉醉在经学海洋,对实学“杂书”有着狂热的兴趣。他将经学所追求的经国济世的抱负,寄托到自己与儿子身上。怀着这一梦想,陶澍七岁那年,陶必铨带着他跋山涉水来到岳麓书院。一家之主,本就家徒四壁,陶必铨舍下父母、老婆,带儿子背井离乡求学,困难可想而知。生计成为头等问题。岳麓书院当时规定,学生读书需自己带米,书院每月补贴十钱银子作蔬菜费。这点补贴,养不活父子俩。但岳麓书院还有奖学金制度,每月由巡抚或学政来主持一次月考,考到前三名就能拿到奖学金。对陶必铨来说,奖学金就是求学金。为了能在岳麓书院这座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殿里待下去,他不分严寒酷暑,每天坚持读到深夜,因此总能拿到奖学金。

课余,陶必铨就与学友在岳麓山中找块地方,坐下来对酒纵谈,指点天下。小陶澍在边上听,似懂非懂。坚持不到一年,因经济窘迫,家庭难以维持,陶必铨被迫带陶澍回乡。陶必铨已经心满意足,毕竟带儿子去见了回大世面,感受了千年学府的气氛。

回到安化小淹陶家溪,陶必铨操起老本行,教私塾。办私塾有两种:在自家设馆,叫私塾;上门去教,叫坐馆。陶必铨人品好,又是岳麓书院的高才生,有钱人家都抢着请他。他每次坐馆,都对东家要求,带上儿子陶澍。

乾隆五十五年(1790),陶必铨应邀到安化县城(今梅城镇)主持修复南宝塔,陶澍跟随父亲,到安化学宫读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陶必铨到益阳曾润攀家中设馆教书,陶澍仍跟随在侧旁听,前后四年。陶澍因此跟随父亲,读到许多杂书,包括算学、测量学等技术书籍。这些书籍,为他精通经济打下基础。

十八岁那年,陶澍参加童试,以院试第二

的成绩考取秀才。这年,陶必铨在离家三里远的一个叫“水月庵”的破棚子边住了下来,专心教儿子读书。他不再设馆,也不准儿子设馆,更不让儿子干农活。父子俩对着江中巨大的“印心石”,伴随资江涛声,勤诵苦读。

嘉庆五年(1800),二十一岁的陶澍与父亲一同到长沙参加乡试。陶澍一举考取第30名举人,陶必铨却落榜了。第二年,陶澍第一次离家赴京,参加会试,这次名落孙山。他遵从父亲嘱咐,留京温习功课,准备再试。嘉庆七年,二十三岁的陶澍一举考中全国第二名,考官申报陶澍为一甲榜眼。

殿试由嘉庆皇帝亲自主持。不巧,陶澍在“策”内遗漏了一个字,读来不大顺口。关键时刻,怎能出错?陶澍被抛进二甲第十五名。虽然在全国排到第十八名,但依然是很不错的成绩。陶澍由此成为安化县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

早年跟着父亲四处求学,生活颠沛流离,陶澍对与自己颠沛经历相似的左宗棠,本能地感到亲近。陶澍在与左宗棠聊天中发现,他在岳麓书院艰难的求学经历,与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苦撑的求学过程心路接近,且两人课堂之外,都偏爱“杂书”:陶澍读“算学、测量学”,左宗棠读“农学、舆地学”。陶澍凭经验与阅历已经看出,左宗棠的底子与资质都属于一流,只要给到他平台与机会,一旦事权到手,他可以创下什么样的高度。因为,陶澍凭“算学、测量学”已经在本朝开创出后来者的高度。

作为清朝中期最醒目的经济改革家,陶澍一生事功显赫,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改漕运为海运。其二,改纲盐为票盐。其三,改银钱为制钱。

漕运是朝廷利用河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说简单了,南粮北运。

秦、汉以前,北方是中国粮食主产区,政治中心就在河南、陕西,不存在南粮北运。唐、宋

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人口膨胀,帝国首都却在北方,粮食逐渐不能自给。南粮北运,成为朝廷的重点工程。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粮食,最少达三百万石,多则过四百万石。北京城内,上至皇帝、皇室,下至王公贵族、各部官员、八旗兵丁,数十万人,生存的口粮全赖漕运。一旦漕运断航,意味着满朝文武,如不愿坐等饿死,只能临时迁都。漕运历经数代王朝,发展一千余年,已经形成成熟的运输体系,利益链条盘根错节。漕运的基本方式是“官督官办、国有国营”。为保证效率与公平,朝廷专设漕运总督、河运总督,权力与地方督、抚平行,三方相互配合。

朝廷设此制度本意,是为了让官员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不料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地方要员办事相互推诿,出了问题互相扯皮,主事官员背后贪腐,办事吏员趁机“浮收”,整个系统腐败深入骨髓,到道光五年(1825),已经难以继。陶澍勇敢担起道光皇帝指定的“国家一号工程”,他跳出帝国体制的僵化与局限,首倡海运,借助民间商人在东南沿海的沙船来运送漕粮。陶澍通过自己长袖善舞的政治运筹,改漕运为海运,大获成功。海运成功的原因,在于完全抛开河运旧有的官僚体系,另辟蹊径,借助一种新型简约的官僚体系,将新生的商人力量组织起来,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完成了朝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纲盐改票盐,与漕运改海运思路一样,将国有国营的纲盐改为自由市场竞争的票盐。陶澍左手推票盐,按市场规律出牌,右手破垄断、废特权、追缴欠课、抄没家产。盐政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一跃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

改银钱为制钱,则是朝廷的币制大改革。清朝所行的货币制度沿袭明朝,银两、制钱并用,实行“银钱复本位”货币制度。银块称量计

值,以两、钱、分、毫为单位;制钱则由政府铸造,每枚一文,规定每银一两抵钱千文。陶澍改革的方案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全部按照制钱的式样,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经费比铸铜钱节省十倍。

但这次改革却功败垂成。为什么改革一进入深水区,才啃到硬骨头,朝廷却紧急叫停?道光皇帝给出的理由是:“大变成法”。真实的原因是,陶澍市场化改革既冲击到帝国集权制度,又冲击到农耕宗法文化,已让道光皇帝无法容忍。改革冲击制度,原因是陶澍根据商业规律,推行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金融领域。市场的契约、平等、自由,对皇权已作无声瓦解。

对文化的冲击,基于海运拓宽了国人的视野,撼动了农耕文化的保守、内向。面对浩瀚陌生且生机勃勃的海洋,全新的主权意识、海疆意识、军事战略意识萌生,传统文化面临淬水重生。全球化到来,面对平等、民主、自由潮流,大清帝国本能退缩。

陶澍改革前,清朝有“康乾盛世”;陶澍改革之后,清朝有“同光中兴”,他所在的嘉庆一朝,恰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拐点。“同光中兴”依赖的两大得力干将左宗棠、曾国藩,皆为陶澍晚年用心提携,精心引导上来。

陶澍由此成为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人物:他主持的改革被叫停,标志在全球化到来的前夜,大清帝国不愿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已经难以自救。站在帝国体制的角度,陶澍已经清晰看见,要振兴衰落的清王朝,关键在得人才,有一批真正通实学、敢办事、能办事的大臣。草野书生左宗棠正是陶澍认可的振兴衰世大才。他决心培养这个天资与勤奋都不俗的青年,让他来担当起挽救清朝的重任,完成自己未竟的使命。

道光十七年(1837)首次见面结交,陶澍事

实上已初步定好提携计划。

第二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后,应约从北京绕道到南京,在两江总督府拜见陶澍。陶澍开头故意冷落,以激将法进一步考察左的人品,直至认定他是一个不但可以托付后事,而且可以将国事担当的正人君子,才确定破格提携。陶澍的方法,将独子陶杕托孤,约为儿女亲家。陶氏清楚,自己去世之后,左宗棠有耐心安居小淹,看完他家藏的上万册图书,其后临事再出山,必是全国一等一的大才。

陶、左公开结为儿女亲家,伦理、辈分、地位均不对等,令全国士林哗然。曾国藩当时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责怪说,陶相老迈昏花,为了求人才竟然不顾年龄辈分,乱了伦理纲常。当然,曾国藩态度后来很快有所转变,因为他本人也与大自己二十六岁的贺长龄结成了儿女亲家,只是贺长龄庶出的小女儿许配给他的嫡长子曾纪泽,让曾家多数人感到疙疙瘩瘩。

此例可以见出陶氏破格赏识与提携左在中国官场产生的轰动效应。

道光二十六年(1846),贺长龄的大弟贺熙龄将三女儿也许配给了左宗棠的嫡长子左孝威。根据贺家的姻亲血缘排辈,左宗棠跟曾国藩也属于亲家。这是题外话,顺及。

陶澍晚年的工作重心之一,在奋其余力,以耿骨忠臣的心志,苦心孤诣为朝廷培养后备人才。为此,他对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不遗余力进行提携,布下一盘很大的棋。

陶澍偏爱左宗棠,托孤于他,表示陶澍对通过科考入仕的体制内官员,已经心灰意冷。

陶澍这种观念,直接缘于道光皇帝长年累月对他抱怨,称朝廷内大臣平时总想自保,不愿像陶大臣一样公忠体国,为寡人分忧。听得多了,陶澍警醒。改革实践让他看清,循规蹈矩的科举人才,擅长词工,短于治事,缺乏担当。陶澍同时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人才失求诸野。

民间独立士人,是挽救清王朝最后可依托的人才。他决心以自己的名望,通过联姻的方式,为左宗棠打开名气,敲开入仕的门。

近代历史学家萧一山也看出了这点,他总结说:清朝“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嚆引尔”。

陶澍凭借士人的担当,终生为朝廷尽心卖力,付出了牺牲家庭的代价。他一生先后娶了七个老婆,生有八个儿子、九个女儿。但因他公务繁忙,常年奔走在官场事务最为繁杂、利益争夺最为严酷的风口,无暇顾及,在经年的举家迁徙与长途奔命中孩子相继死去,只留下七岁的小儿子陶杕。

陶澍抛弃家庭与个人幸福,为挽救衰世呕心沥血,在循吏大行其道的清朝官场,同样是个异数。陶澍舍家报国这种强大的心志与毅力,很大程度上缘于湖南这片土地的人才,历史积累两千年,这时才第一次真正得到开发。从春秋战国起,湖南一直处于自由野性、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进士屈指可数,官员寥寥无几。

自隋朝设科举制度以来,到明朝茶陵才出个李东阳,高居宰相,这是湖南本土产生的第一个高官。陶澍作为清朝产自湖南本土的第一位高官,对圣贤学说、孔孟之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诚”,这种“诚”达到近乎迷信执着的程度。他处处以圣贤标准来要求自己,规范言行,追求具备圣人的才德,治国实践中施行王道,以期立德、立功、立言,即“内圣外王”,“三立”不朽。陶澍带头如此,左宗棠紧随其后。两人同以乡下贫寒士子出身,能够相继迅速发迹,在权位匹配后大刀阔斧改革,得益于早年栖居乡下,凭勤奋苦学,以儒学修养出了君子人格。

在陶澍、林则徐二公祠,左宗棠题写过一副对联,传递出的正是这种君子人格的“诚”: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就私情而论，因为陶澍的提携，民间士子左宗棠在大清帝国庞大的关系网与纵深的历史感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通过陶澍的指点，左宗棠出山前积蓄了足够的知识储备与人脉

资源。陶澍因为结交左宗棠，不但事业理想找到了寄托者，而且他的独子陶杲也被左宗棠成功教大成人，学问、事业皆有所成，在身后留下十多个子女。按传统的香火观念，陶家今天数百后人，虽由左宗棠长女左孝瑜所传，但陶家血脉不断，主要还是得力于左宗棠的经营与栽培。这对年龄相差三十三岁的“忘年交”，因为湖南醴陵的一面之缘，实现了延古继今的相互成全。

## 宝牯佬

◎ 刘跃清

宝牯佬是民间对邵阳人的称呼，意指邵阳人像牛一样耿直、憨厚、刚烈。我一直认为宝牯佬的“牯”，是牛牯的“牯”，即性烈雄健的公牛。儿时牧牛，常见两条公牛“顶架”红了眼，牛尾紧夹，牛身如弓，气喘如吼，地动山摇，旷日持久，很多时候只能用长竹竿绑上草把点燃伸过去熏，它们才可能休兵罢战。宝牯佬做人做事的“牛脾气”上来了就是这样子。“呷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宝牯佬的脾性是最典型的湖南人性格。

邵阳古称邵州，南宋宋理宗登基前在那儿“遥领”防御使，“上位”后，以自己的年号命名该龙兴之地，即“宝庆”。宝庆府在明清时期是大府，辖武冈州和邵阳、新化、城步、新宁四县，俗称“五邑”，地域与今天的邵阳市区、武冈市、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新宁、新化及城步苗族自治县一致。新化于1977年10月划归涟源（娄底），此前分别于1947年、1949年将邵

阳、新化的部分乡镇组建隆回、新邵两县，因此这几县的风土人文相交相融，难分彼此。

宝庆位于湘中偏西南，资江上游，越岭逶迤东南，雪峰山耸峙西北，资江由西南向东北流贯全境。山地和丘陵约占区域面积三分之二，基本是“七分山地两分田”。群山环绕，丘陵起伏，盆地星罗棋布，荒凉偏僻，土地瘠薄，民生艰难。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曾流放这一地区，我们今天仍然能从《离骚》、《国殇》、《卜居》、《渔父》等篇章中感受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之泣血感慨。宝庆属于梅山文化区域，据传湘中西部地区有三十六峒梅山（仅隆回境内就有十六峒）。“峒”是宋代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基层行政单位，比现在的村稍大。民间对三峒特征做了生动概括的描述：“上峒梅山挽弩相杈（山地打猎），中峒梅山放牛赶鸭（丘陵耕牧），下峒梅山打鱼摸虾（水乡渔业）。”宋元时期，峒兵（乡兵）吃苦耐劳，能走能打，战

斗力强,是朝廷镇压南方农民起义军所依仗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儿时腊月里常见乡间“庆梅山”,巫师持桃木剑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发“峒兵”去捉拿妖魔鬼怪,应该就是源于此。这些无不在述说这片土地的古老、神秘与苍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险峻的自然环境与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锤炼出宝庆人神情专注、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脚踏实地、表里如一、重诺守信、坚韧坚忍的顽强性格。古史志常如此形容宝牯佬:“尚武、好斗、重义、轻死、易于激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崇尚勇武、喜欢打斗、重情重义、把生死看得轻、容易被激怒等,旧时山民争吵,常将“砍头不过风吹帽”、“砍落脑壳不过碗大的疤”挂在嘴上。湘军鼎兴时期,其兵源主要来自宝庆“五邑”,称之为“宝勇”。我老家隆回乡村至今流传形容某人突然暴富,是说“你打开南京了?”称赞谁穿得光鲜漂亮就是打扮得像个“南京客”。这是说湘军在曾国荃率领下攻下南京后,论功行赏加上军纪败坏放任官兵烧杀抢掠,让很多宝牯佬满载而归,发了大财。在乱世中博取“血酬”的宝勇衣锦还乡后,渐渐悟出骤得的富贵只有通过读书、通过文化积累才能保持长久,于是宝牯佬们开始重视子弟教育,兴办学堂,开化民智,此举恰好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储备了大量人才。当年旅日同盟会成员中湘籍最多,这其中又有一半以上是新化的。在日本跳海自杀的近代著名革命家、《猛回头》、《警世钟》作者陈天华即新化人。武昌首义人员大部分是宝牯佬。这时清廷又想起了被罢免赋闲在家的宝牯佬中的大佬、湘军后期著名人物两江总督魏光焘,启用其为湖广总督。让宝牯佬去镇压宝牯佬,这对清廷来说不失为一着妙棋。魏光焘称年老体弱,未赴任。历史总是如此充满戏剧性,宝牯佬以其义勇倔强的秉性,既是清王朝的“回光返照”的捍卫者,又是最终的“掘墓人”。

湖湘大地直到晚唐,仍被以儒家文化为

核心的中原视为蛮夷之地,湘中腹地邵州更是蛮荒之所。北宋大儒、理学鼻祖周敦颐(湖南道县人)于宋治平四年(1067)以永州通判来邵摄事,于资水河畔辟池种莲,写下传世名篇《爱莲说》,亦开邵州教化之先河。至清代有车万育作《声律启蒙》,为家喻户晓之蒙学读物;晚清、近现代更是英才辈出,涌现出魏源、魏光焘、刘坤一、蔡锷、谭人凤、匡互生、张家钰、周学霆、曾炳熙、邹汉勋、袁国平、蒋廷黻、廖耀湘、贺绿汀、李寿轩、袁也烈、陈早春等彪炳青史的杰出人物,书写“无湘不成军”、“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的铁血辉煌。

“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宝牯佬多有“根深蒂固”的政、军情结,亲友相聚多津津乐道于政界、军界有多少湖南人之类的话题。谁家如果有位当大官的亲戚总要拐弯抹角地提一提,眉头扬起,腰杆都会粗三分,皆缘由湖南曾经风起云涌。晚清全国十八省,十省督、抚是湖南人,太平天国运动后“两江总督非湘人不可”,前有湘籍“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后有宝庆人刘坤一、魏光焘先后担任两江总督,恢复生产,繁荣经济,兴办教育,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扑下身子做了一些实事好事。新中国成立,湖南政、军两界更是大员如云,气势如虹。

宝牯佬骨子里以做大事、当大官、出大名、说亮话为荣。学而优则仕,从政从军,立功与立言,首选功名,退而求其次才舞文弄墨,著书立学。“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魏源(今隆回金潭人)著《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宏论振聋发聩,名垂青史;邹汉勋(今隆回罗洪人)校刊《船山遗书》,编纂《宝庆府志》(被学界誉为天下名志),著有《五均论》、《六国春秋》、《广韵表》等,创造性提出至今沿用的绘制地图基本原则,乃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其孙邹代钧于1896年在武昌创办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舆地学会,创立中国第一

家地图出版社——亚新地学社，主持编撰出版《大清全典图》，主编《中外舆地全图》，曾担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地理系主任）。蒋廷黻以一部《中国近代史》奠定其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为了从南开大学挖走名教授蒋廷黻，竟然在蒋家客厅“赖”了一个晚上，称蒋不答应去清华，他就不走。当然，蒋、罗关系密切，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两人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一起义务担任中国使团秘书。

宝牯佬中会做生意的惟唯有邵东人。沈从文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湘西当时很多店铺是宝庆人开的。先生提及的宝庆人即邵东人。邵东人做生意从小处着手，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别人不经意的行当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只要微薄利润，就像牛一样手胼足胝、实打实地去

做，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不打肿脸来充胖子，一切从零做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里都蓄满汗水！邵东约一百三十万人口，就有八十万在外做生意，其足迹遍布全中国、全世界，尤其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更是风生水起，落地花开。

宝牯佬性情横蛮、暴烈、忠义、有血性，另一面就是呆板、一根筋、钻牛角尖，头撞南墙也不回，见到棺材也不落泪。敢打敢闯，流淌在血液里九条牛都拉不动的蛮和犟，有时候是性格的悲剧。冥冥之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滚滚资江东逝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今天的宝牯佬还是像牛一样默默地开拓耕耘，当然脚步更加理性、睿智、从容，但骨子里那份热血贲张，只要认准了的事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倔强与韧劲从未曾改变。

## 欢迎订阅2020年《作家文摘》合订本

### 2020年第7期要目



全年订价180元

#### 【纪实】

初心一叶：党史中的人与事  
陈独秀与刘海粟  
保释钱学森  
双清别墅的客人  
1942年蒋介石为何去印度过年？

#### 【人物】

苏叔阳：丹心犹在  
“银嗓子”姚莉

#### 【文史】

曹操为何不称帝  
大咖们的为父之道  
拿破仑怎么看中国

#### 【忆文】

茅盾与《文艺报》  
兰姑姑的戏票  
爷爷季羨林  
母亲陶琴薰的闺蜜们

邮发代号：82-321 拨打11185或至全国各地邮政营业厅均可办理订阅  
咨询电话：010-6500004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以实际出刊目录为准）

## 思君雄才良凄楚

——作为艺术史家的留德学人滕固

◎ 叶 隼

滕固(1901—1941)先生英年早逝,有些像德国天才薄命的意味。确实,仔细盘点先生遗作,我们要承认,滕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过早凋零的艺术精英,值得后世追怀。钱锺书眼高于顶,是出名的才子型人物,然与滕固却颇为投契,相互之间有诗词酬唱。滕固赠诗给钱称:“十九人中君最少,二三子外我谁亲。”以表达对小自己十岁的钱氏之格外欣赏。而初闻滕固死讯,钱锺书即作诗悼念,《哀若渠》四首哀婉动人,使人潸然欲泪。后《又将入滇悼念若渠》一诗云:“学仙未是归丁令,思旧先教痛子期。沉魄浮魂应此恋,坠心危涕许谁知。”1938年在昆明,钱锺书留英归国任教于西南联大;此时,滕固则在主持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二人一见如故。1939年,滕固邀钱锺书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撰写讲稿,钱锺书写了《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

当然,追溯滕固的友人圈子,最需要提及的,自然还是留德时代的精英交谊。朱偁撰文《吊若渠》,反映出当时留德学人的状态:“余游莱茵归来,与若渠同寓于柏林西郊,风晨日夕,相与唱和,无间风雨。”不仅如此,他还记录下了滕固留德时代的赠诗,让人很是感慨:“我来柏林城,君涉莱茵浦。相送虾龙驿,挥手良凄楚。归来篋衍中,满贮新纪叙。旖旎若李温,悲凉似老杜……”这是滕固赠给朱偁的诗,遥想先生当年,在异邦萧条的风土之中,能得见同

乡同道,相互酬唱,引为知己,真是乐也何如。而事隔多年之后,朱偁先生作长诗《秋夜述怀寄昆明姚教授从吾滕校长若渠冯教授至白沙蒋馆长慰堂北碚梁教授宗岱三十三韵》则给我们理解那代留德学人的交谊状况和精神风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诗史”记录,所谓“声名传海内,寥廓各殊方”,当年曾经意气风发,而今国难当头之际,却仍不禁要“忆昔西游日,文星聚上庠”,于是在朱氏的浓墨重彩之下,昔日留德的各位人物陆续登场:

姚公拾遗闻,荟蕞涉重洋。  
作史准班马,结交尽贤良。  
滕君瑚琏器,遁迹翰墨场。  
偶然赋鸚鸟,郁郁焕文章。  
冯公江海客,澹泊岂佯狂。  
论诗追义山,作赋拟班扬。  
蒋公柱下吏,秘册富珍藏。  
东西罗史乘,图籍列琳琅。  
有客远方来,言是南海梁。  
冥搜真与美,秀句满遐荒。  
徐公久不见,家世出潇湘。  
脱略公卿思,跌宕文苑旁。  
余随诸子后,风雨必相将。  
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这里的七位人物,都是日后在中国现代文化场域大展身手,各自留下了辉煌业绩的名人。即姚从吾、蒋复璁、滕固、梁宗岱、冯至、朱偁、徐梵澄。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或有在十年者,却都是留德一代的佼佼者,是当年聚集在德意志国土上的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姚从吾治蒙元史,是相当有成就的一代学人,亦曾获德国学者的充分肯定;而作为诗人的冯至,则代表了德诗在华的有力存在;梁宗岱兼通法、德,对欧洲南北文化有相当深刻之体认;至于徐梵澄,以其对梵学、西学的不凡造诣,而被誉为沟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一代通人;蒋复璁专治图书馆学,对中国图书馆等文化事业之开辟颇有贡献;滕固则不但曾是狮吼社的重要代表作家,日后更成为一代艺术史家;朱偁就更了不起,他所治为经济学,但其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洵嘉,著述与文化保护事业都相当突出。

朱偁曾记录下和滕固的交谊过程:“余初识若渠,乃在1930年暮春,时余将远游莱茵,若渠则方亡命至柏林,送余于虾龙驿车站,客中送客,倍觉情深。后余归柏林,相交益厚,时常相过从者,有海宁蒋慰堂、襄城姚从吾、长沙李石岑、河北冯君培、长沙徐梵澄以及南海梁宗岱、山东刘衍淮等,皆一时知名之士。每逢星期假日,辄聚会于柏林西郊森林湖畔余之寓庐,上下古今、纵横六合,无所不谈。真有‘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之感。而席间挥斥八极、才气纵横者,尤以若渠为最。后余以1932年夏归国,若渠亦不久东渡。其在欧游踪极广,尝西游巴黎,南访罗马,所至探求古迹,结交名士,尤以所学为艺术史,故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之名城——如翡冷翠(Florence)、威尼斯(Venice)、梵罗娜(Verona)、米兰(Milan)——尤三致意焉。”文言诗的德国叙事,或许是个值得探究的话题。早在二十世纪初期(约在1909年),马君武即作诗《特里尔纪游》:“文化传初纪,遗碑尚纪功。比邻新酒绿,残堞古砖红。曲折莫差水,荒颓罗马宫。百年争战地,今暂息兵戎。”陈寅

恪在1910年则作《庚戌柏林重九作·时闻日本合并朝鲜》,将其指点江山的学子激情外溢无疑,先是说“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对朝鲜之任人宰割命运深表关切,结语则为“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到滕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柏林感怀,这一脉络绵延未绝。白话诗的崛起自然有其内在逻辑可循,但其与旧体诗的关系是否便如文学革命所倡导的“非此即彼”乃至“势不两立”,今日看来其实大可商榷,旧体诗的过度压抑,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恐怕未必就是好事。

滕固早年留日,进而转以留德,成就了自身的学养形成过程。这是符合那代留学精英人物的侨易轨迹的,即由日转德,如杨昌济、马君武、张君勱、梁希等,走的都是这样一条道路;彼时日本以德为师,留日学人身在樱花烂漫之地,向往的却是莱茵河的涛声,滕固的留德也符合这样一个大势。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名作家,滕固的作品也很有特色,其作品《壁画》、《银杏之果》、《死人之叹息》、《迷宫》、《外遇》等,值得关注。不过他的作品基本为留德之前所作,应当视作留日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当然,值得追问的自然是,为何滕固的诗情在留德之后反而化为“乌有”了。德国作为文艺之邦,究竟给滕固留下了怎样的印记?他在留日之际,生发出浓厚的文学趣味,因缘际会,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最早成员之一,其早期创作都自成风格。更有趣的在于,在有过归国经验后,他又毅然选择了去国行,在1931年留德,此后似乎迅速由文学转向学术,成为现代中国艺术史学的重要拓荒者之一。说起来,他与陈铨、冯至大致是一代人,留德时间亦差不多。作为狮吼社的核心人物,虽然生命短暂,但却才华横溢,故此滕固的文学史地位值得关注。

滕固的成就,固然有天才的一面,但也与后天的求学历程不可分割。其早年留日,后又留德,海外居留近十年,先后求读于日本京都

东洋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获艺术史博士学位。他不但是位卓有成就的中国艺术史家,还是一位艺术教育的管理者。他不但曾参加“文学研究会”、“民众剧社”等社团,而且与刘海粟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艺术研究会”,是艺术家中的佼佼者,更曾先后出任湖南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是中国艺术教育的领袖之一。他在艺术史著述方面颇有硕果,如《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等;译著则有《德国过去对于科学事业的维护》、《先史考古学方法论》等。当然,我更看重的,还是他作为艺术史家有否卓识。在滕固看来,“音乐为世界观的艺术”,而“音乐的本源在于人心,人心的活动因缘于事物,事物的根极是世界所由生的生命或实在……”这就超越了简单的艺术观的狭隘自闭,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人生和人心的范围内来讨论作为艺术的音乐了。

关于由日到德的转变,有论者认为在中国绘画史研究中,这意味着从“日本模式”到“德国模式”的转变,后者主要指理性思维模式和方法论模式。其实日本模式具有普遍性,而不仅是简单的一个过渡而已。不过,滕固的这种生命经历并不仅是个案。譬如青主(廖尚果),就也是一个可供印证的例子。而较此前科目相近的王光祈等人,则有年龄上的差距。这样一个人物,在柏林大学留学了四年,最后获得了艺术史博士学位,应该说是相当不易的。经由蔡元培先生开端的德国美学引进工作,经由杨丙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努力,已经形成了相当的理论积淀;而如王光祈、萧友梅、青主等的专业化推进,则开辟了完全不同的学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较音乐学的“拔得头筹”,绘画学方面确实值得深究。而滕固的意义,就是在这样一种比较视野中显示出来。一般而言,论绘画,则容易联想到留法学人,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都是清一色的留法出身,而且也有不同程度的旅德经验。可若论及绘画史研究,也就是艺术史研究,则留德学人

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而将滕固的遗著择出发表,既显示了宗白华作为美学家的慧眼,其实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滕氏的思想符合宗氏文化建国理想的基本思路,这回强调的是艺术的重要。艺术境界,说到底还是人的生命境界的反映,这一思想与宗白华的美学视角其实息息相通。实际上,这批艺术史精英人物的认知,是受到德国学术思想影响,并且能出而化之,有很强的消化能力的。

对于现代留德学人群体而言,这所大学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从二十世纪初的蔡元培那代人,到二十年代的宗白华、王光祈一代,再到1930年代冯至、陈铨、徐梵澄、滕固等,都曾先后立雪柏林,攻读文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史。滕固的学养相当不错,他兼及著译,且创作与研究并举,按道理来说,应是有可能得以大成的一位留德学人。可惜的是,他的政治兴趣似过于浓烈了些,所以最后竟然不能专心于本行,再加上天妒英才,竟然在如此绚丽年华夺其生命,使其终不能施展长才。否则以先生大才,当不至于仅仅停留在如此地步。

在柏林大学,宗白华直接受业于德国著名美学家和艺术史家德索(Dessoiz)、伯尔施曼(Bolschman)和哲学家里尔(Riehl),听他们讲授温克尔曼、莱辛、席勒、歌德、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和艺术哲学理论。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索教授对宗白华的影响。德索当时已在柏林大学任教二十五年,讲授美学和艺术哲学,其代表作《美学与艺术理论》亦出版了十五年。书中对美学与艺术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都做了系统、完整和丰富的阐述,尤其是有关艺术分类的理解和阐释,有对艺术的理性功能和社会功能、道德功能的把握等,都独具特色,在西方学术界影响颇大。德索主张,“如果审美只包括思维过程,那么谈审美对象就毫无意义了”;凡是研究美学的人,都应该多看艺术作品,用艺术的成就去印证美学理论。还呼吁建立一种普及艺术欣赏的理论,以丰富美学研究。这一

思想,显然对宗白华影响非常大。宗不但亲身加以实践,十分重视对艺术作品的考察和研究,并将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撰写《美学》、《艺术学》等讲稿时贯穿了这一基本思路,强调“美学就是一种欣赏。美学,一方面讲创造,一方面讲欣赏。创造和欣赏是相通的”。这种专业训练,对于宗白华来说显然是受益匪浅。而这位德索(Dessoir, Max, 1867—1947)就应当是滕固的主考官之一、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留德学人群体之间这种内在的学术、思想的关联性和德国学术的整体场域是有关系的。

滕固回国后出任过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的校长,也属于民国大学校长中留德一代谱系中的人物,虽然不过短短两年,但也有其自身的教育观值得探寻。朱

家骅说:“若渠有用世之才,也有用世之志,如果他不死,我相信他的前途一定是非常远大的。而且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极高,搜集材料作研究的本领也极大,我相信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也会很高超的。”这样一个相当全面的天才型人物,就如此凋零于时代的风雨之中,思之实在让人感慨万千。民国时代“德系知识”谱系的一批人物,似乎都与德国模式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中颇不乏一些天资卓越、深思力行、成就颇彰的人物,譬如宗白华、朱光潜、滕固、朱楔、陈铨、冯至、李长之等都是,当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们并没有造就中国历史上的“天才时代”,但重新考量,或许仍可将其称为一种“拟天才时代”,而且其或许还有进一步的世界史意义,这种文化现象是值得深思的。

## 那些摆地摊的教授们

◎ 范 军

整个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到了1944年、1945年,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更是物价腾飞,民不聊生,教授们挣扎在生活的底层。云南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昆明外来人口又压力巨大,因此米价始终居于高位。据报载,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四百零四倍,而联大教授薪金则为原薪金的十点六倍。当时所谓“公米”则有价无米,人们只好求助黑市。陈寅恪在形容昆明及后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程度时,曾有形象的诗句:“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他的目疾

难愈(后来双目完全失明),营养不良是重要原因之一。陈寅恪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是少数“部聘教授”之一,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尚且如此,一般教授生活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能够补贴家用,渡过难关,教授们纷纷无师自通学会了“摆地摊”,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其中最著名且被载入西南联大史册的“摊主”,就是鼎鼎大名的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有如下记载:“……教师生活的困窘,可以从闻一多公开挂牌治印后写的信中略窥一二:‘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

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作为名教授的闻一多“时在断炊之威胁中”，通俗地说就是全家老小“吃了上顿无下顿”，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最后，他还是靠摆地摊帮人刻印章勉强解决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而“怂恿”他摆摊设点，并亲自帮他拟定“润格”的“友人”非同小可，他们都是联大、云大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和牛教授，总共十二位，有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清华中文系浦江清教授还拟稿作一短启，也就是招揽顾客的广告，兹摘录如下：“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浣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

闻一多亲自把这则颇具风采风流的广告词携至昆明城北门街联大教员宿舍附近，贴于一间上书“三友金石书画社”匾额的屋子的墙上。广告一侧有一张大白纸，上有各式字体的图章样式和印就的润例，外加一玻璃框装饰。这里实际上应该是李公朴经营的北门书店所在地，闻一多借用了一方宝地，并请他帮忙照顾生意。闻一多因其才艺、名望，加之名流推荐，一时间影响很大，连远在重庆的梁实秋都从媒体上看到过他的刻字润例。吴晗回忆说，闻先生润例大概是“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两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没有生意，就得借贷。当然，闻一多刻印也不都是为了钱，比如他就曾刻印章一枚送给邻居华罗庚教授，边款是几行小字：“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这枚印张，华罗庚一直珍藏了很多年。

不是人人都在西洋学过艺术的，也不是个个都能刻章治印的，所以闻一多教授这种“摆

摊的成功经验”并不适合推而广之。但同在大学往往会异中有同，大凡是教授尤其是文科教授，都有不少藏书，有的书还比较值钱。老话说，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因此，摆摊或变相摆摊卖书，就成为大家不谋而合的选择。对此，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写道：

知识阶层最器重、最爱惜的资产就是藏书。由平津南下长沙，再由长沙辗转到云贵高原，一路上什么财物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舍得扔下书箱。图书资料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1941年以后，剜肉补疮，连最后的珍藏也只有忍痛割爱了。以专门研究明史著称的吴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云南大学图书馆，大哭一场。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久病不愈，经济窘迫，只能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求售；经协商后，由北大法律研究所全部收买，折价法币三千元，聊补燃眉之急。现存历史档案中，还有当年西南联大法律学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关于收购费青教授藏书”一事致梅贻琦常委函。

吴晗也好，费青也罢，虽不是摆摊售书，但又与摊贩何异？闻一多也是忍痛割爱，将从北平带来的几本心爱的线装书卖给联大图书馆，以换钱买米。著名化学家、后为中科院院士的黄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疟疾，实在是不得已，只好卖掉衣物和书籍用以买药治病，病情时好时坏，饱经折磨的黄教授这场病拖了一年才治好。为此，他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至今读来令人怆然。写到此，我不觉想到也是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喜洲，从武汉西迁而去的华中大学教授也有类似遭遇，且更为悲惨。1944年，华大中文系主任包鹭宾教授染上了疟疾，因为家大口渴，生活贫困，加之偏远的喜洲



缺医少药,他最后不治身亡,年仅四十八岁。

文人学者除了“去库存式”的卖藏书,更有像闻一多那种“再生产式”的卖知识、卖文化、卖艺术。比如冯友兰、罗常培卖书法作品,朱自清、王力卖文稿以补贴家用,还有的教授为云南土司当幕僚,做家教,撰写寿文、墓志铭等,换取酬金。师范学院萧涤非副教授则主要是“卖课”养家——四处兼职上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兼课,刚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啼饥号寒”,不得不忍心送给别人抚养。理工科教授一般动手能力强,有的还有一技之长,便“半工半教”,利用“专业”所长来帮助养家糊口。如化学系高崇熙教授擅长养花种草,他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出售。航空工程系主任王德荣教授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则“强强联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到市场售卖,据说可与派克墨水媲美,价廉物美,畅销昆明。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日子多么困苦,教授们毕竟不能也不愿把过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教学科研之外。闻一多刻字,没有生意上门他着急,为一大家子生活而急;生意太多了也着急,怕“副业”耽误了自己的“正业”。因此,比较简单、耗时较少的摆摊售卖衣物等,就成了很

多教授的共同选择。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因夫人患肺结核病,花钱买药很多,他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其全面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及生活用品,都陆续卖出去了。后来,大家已无多余的衣物可卖,正像生物学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的:“现在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当然,这种文化与科技含量不太高的活计,教授夫人们或许更擅长,也做得更有创意。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就摆过地摊。吴晗回忆说:“到了真没办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女佣去摆地摊,卖旧衣旧鞋。有一天,我问闻太太,卖了多少钱,她苦笑一声说:‘三十多件破衬衫,卖了三千多元,反正够明天一天了。’”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售卖书法作品,生意难得开张,他夫人任载坤就自己动手做麻花卖,据说销售还不错。而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也同样在联大校门旁摆地摊,先是变卖儿女们孩童时穿过的衣服,后来又自己做糕点出售,她还给自制糕点取了个名字——“定胜糕”,蕴含“抗战必定胜利”之意。华罗庚的夫人吴筱元心灵手巧,勤俭持家,精打细算过日子,稍有空闲就给商店里绣一些小手巾,以资助家用。

## 语言学家王力早期的一篇佚文

◎ 刘 飞

1925年10月8日出版的《国大周刊》第一期刊有王力先生《本校成立缘起及今后之希望》,是他对当时新创办的上海国民大学成立缘起之介绍,以及对学校当局八点希望的阐

述。就目前所见,这篇文章系王力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对恢复王力先生早期行实,认识其早期教育思想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都

颇有意义。该文未见于山东教育出版社《王力文集》与中华书局《王力全集》，兹将全文照录如下(为尽可能保留原貌，标点一仍其旧，唯原文漫漶不清处以“□”代替)：

### 本校成立缘起及今后之希望

王 力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清室善后委员会检查清官，发现江氏致金梁请覲溥仪函二，有用非常之才以应非常之变等语。初，江氏尝自称社会党首领；上海专科学校学生慕其名，迎为校长，易校名曰南方。至是，诸生闻江请覲事，皆大愤，通告天下，撤销其校长职权；并请教职员组织校务维持会，董理校事。当是时也，诸生坦然，不防江氏之肆毒。不数日，江氏出京南下，率众据校，辞退教职员十四人，开除学生十余人。当是时也，师生又坦然，不愿与江氏较得失。于是校务维持会诸先生别立国民大学，以纳南方大学离校之学生。学生中虽有不甘退让者，然诸先生诏以读书为重，勿与小人争而误韶光，则皆唯唯而从众。一德一心，而吾校之根基以立。章先生太炎，国之鸿儒也；年老不任事久矣。吾校方筹备时，请先生任发起，则欣然承诺；及成立时，举先生为校长，又欣然承诺。吾以是推知天下之士爱吾校如章先生者，实繁有徒。社会之属望弥殷，则吾校之责任愈重。受激之深如彼，责任之重如此。然则兢兢业业，毋怠毋荒。认定鹤的，戮力以赴；吾人容自己乎。

吾述成立缘起既竟，兹将余所希望于本校者，分条论之：

(一)注重人格教育也。天下学校，虽曰皆宜注重人格教育，然未有专以人格为标榜者也。吾校为争人格而起，标题何其堂皇正大！今后吾人自当相勸保存人格，以期不背宣言。而学校当局，尤当以养成学生之高尚人格为职责；管理不可不严，训迪尤宜恳挚。而身为教职

员者，更当以身作则，勿使德行有亏。此吾校最要之宗旨，应共矢勿渝者也。

(二)筹足经费也。经费为学校之要素，人莫不知。私立学校之不及国立者，即经费之关系也。吾校经费之急需筹资者，首为建筑费，次为基本金。建筑校舍，所费不貲；而当务之急，又必不可缓。筹措之法，一曰募捐，二曰借助于资本家。苟尚差一万数千元，似可由教职员与学生□资凑足。此关建设大计，非管见所能详及。

(三)严格取录新生也。迩来私立大学，风起水涌；招徕士子，来者不拒。入学考试，仅具形式，榜登竟无名落孙山者；无怪乎社会无信仰之心，教部有取缔之令也。尝谓招考新生，资格不妨稍宽，而程度则不可不严为甄别。资格可伪，而程度不可伪。故复旦大学许旧制中学毕业生投考本科；而清华国学研究院许研究国学有心得而无资格者应考，皆知资格不足为标准也。惟程度则甚有关系：若甄别不严，随意收容，他日诸生程度不齐，难以施教，其害不小也。夫甄别不严，无非欲多收学生，多得学费；而不知事有大谬不然者。盖多收低能生，即难得社会之信仰。每见乡老相与谈曰：“吾乡某儿，中文不能成短札，西文不能谙文法，竟能考入某大学；可见此校之不良，我家儿不令入也。”又尝闻学界相与谈曰：“某生毕业于某大学，其成绩之劣竟如是！”又尝闻学校当局语人曰：“某大学四年级生，仅能考入北大一年级，可笑孰甚！”据此可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学生愈滥收，社会愈厌恶，士子愈益裹足不前。本欲以是招徕学生，适足以败名誉，而学生日益少，岂非所谓作伪心而劳日拙者耶。吾校新立，慎始关微，不可不予斯三致意焉。

(四)严格考试也。余素主张废考，以谓考试不能得正确之标准；不如不试，俾学生自由研究之为愈也。虽然，不考则可，考而不严则不可。夫考试之谓何？岂非欲知学生之成绩耶，若不严格，则真成绩不可知，而升级降级皆无所据；此亦关于学校名誉者也。

(五)多聘良教授也。不善为学者,择校舍之辉煌;善为学者,择教授之博学。尝谓中学以设备为重,大学以教授为重。吾辈负笈万里,有两大希望,而校舍之巨丽不与焉。一曰,图书多;二曰,教授好,如是而已!所谓好教授者,非以其有博硕之名也;亦非以其有饱学之誉也。有博硕之名,贵乎能副其实;有饱学之誉,贵乎诲人不倦。否则虽完全博士,而多无实学,则学校无所用于偶像;虽人人饱学,而多怠于教,则彼自饱学,于学生无关。故良好教授之标准,尝以博学善诱为衡;道德次之;名誉抑亦未已。

(六)多聘专任教授也。学生之求学,所得于课堂者少,所得于自修者多。自修而有所疑,则必寻师而问焉:此专任教授之足贵也。尝见教授之职业纷繁任教多校者,除上课一小时而外,无在校之时间。授课一半,匆匆离校;诸生环而问难者如蝟,勉强酬答;身在教堂之内,心驰市尘之外,一若以诸生问难为可厌也者。此无他,职资不专之过也。清华国学院,注重自修,其讲师当常住校,以备学生之质疑,诚深知此弊者也。且教授常在校内,于校务之赞襄,诸多有益。今吾校成立伊始,物色专任人才,良非易易;然悬此为的,终有如愿之一日。倘此时不可多得,即得三数人,亦聊胜于无也。专任教授常常住校,固大佳事;即不住校,每日留校数小时,亦大有益:此应请当局注意者也。

(七)筹备大规模之图书馆也。吾人负笈万里之最大目的:一曰,图书多;二曰,教授好,前已言之矣。凡人研究一书,必须多书以为参考;而多书非一人之财力所能备也,故图书馆尚焉。现在学校当局,正致力于此事,吾人拭目以观厥成可也。

(八)许学生代表加入评议会也。学校之风潮,起于怀疑,起于隔阂。教职员与学生各自为谋,不相融合,而学校从此多事矣。故教职员与学生,不可不思所以合作之道。其道维何?即许学生代表加入评议会是也。学生加入评议会,□有建议权与表决权;至其人数,似宜占全数

三分之一,如此,则上情以达,下情以宣,两无隔阂,永无风潮:学校之福也。

以上八端,皆老生常谈,无新奇之见地;顾言之非艰,行之维艰;循是为之,不出三年,其效立见。此虽余一人之希望,谅亦当局之所赞同。倘承当局赞同,则谓为吾校今后之计划也可;否则谓为余个人之私见,略采择焉,亦无不可。八端之外,尤有最要者,师生和衷共济是也。吾师生辈风雨同舟,几经奋斗。俨然患难之相依;自当尔毋我虞,我毋尔诈,戮力一心,为学校博光荣,即为国家增幸福。尚共勉旃!

《国大周刊》为上海国民大学同人编印,系上海国民大学校刊,1925年10月8日创刊,每周四、日出刊。关于刊物旨趣,何炳松在《发刊词》中云:“我国民大学固揭署‘人格教育’旗帜者。校中同人对于‘人格教育’必皆志同道合,所谓同气相求也。则交换智识,互通消息之周刊,又乌可以已乎?同人不敏,思借周刊以为敦品励学之中介。提高人格,增进学术;小之足以立身,大之足以救国,推而广之,或且足以改善人类之状况。”与王力这篇文章同期刊出的有章太炎《国民大学宣言》、曾广勋《国民大学的真精神》等。王力其时为该校一年级学生,二十五岁。

1924年夏,王力在供职单位李氏开国学校校长李慎西和同事李春馨的资助下离开家乡广西博白,到上海求学,9月起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科一年级。上海私立南方大学的校长为社会党党魁江亢虎。1924年3月中旬,江亢虎离沪进京。在北京,他拜见了二十年未曾谋面的原京师大学堂同事金梁。金梁此时掌管宫廷事务,遂带领江亢虎参观宫殿,并游览御花园。江亢虎“以未获觐见为憾”,遂于3月19日和31日两次写信给金梁,请其代为安排,语多媚词。金梁奏请溥仪召见江亢虎,遭到溥仪身边大臣反对,以失败告终。虽然最终江亢虎没有觐见溥仪,但是江亢虎请觐的两封信

以及金梁《为江亢虎请觐奏折》却与康有为、升允、陈夔龙等人的复辟奏折放在一起。1925年7月31日下午,清室善后委员会第一组查点故宫养心殿物品,点至吕字565号时,以上秘密文件被同时发现。由此,江亢虎身陷复辟丑闻。同年8月7日、8日、10日,《申报》分三次刊发《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表复辟文件》,一并公布了江亢虎写给金梁意欲请觐溥仪的两封书信,一时舆论哗然。随即,上海私立南方大学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驱江运动”。王力晚年接受采访时曾介绍这一段往事:“我入学不久,报上披露了他晋见了被赶下台的清朝皇帝溥仪,并公布了他给皇帝写得很肉麻的恭维信,上海师生大哗。南方大学掀起驱江风潮,十四位教授和三个学生开会,否定江亢虎当我们学校的校长。”虽因为时久远,王力先生回忆的具体细节略有偏差,但驱江风潮确有其事。

先是,南方大学学生会在8月7日立即召集委员会会议,讨论应对方法。经多数表决,学生会决定给江亢虎校长拍电报,若报载属实,则请其自行辞职;如系伪造,则请立即明白答复。

8月11日下午4时,南方大学教务长殷芝龄、事务长杨卓茂借用一品香旅社召集校务会议,教授陈定谟、萧恩承、陈德恒、胡朴安、蔡鼎成、潘公展、何炳松、梅思平、李石岑、陈翼祖、戈公振、王耀三、夏麟、汪英宾、汪仲长、陆鼎揆,职员图书馆主任孙心盘、会计袁拜言、注册主任吕潮,文牍员戴汉材、附中主任张四维,学生会代表李可权、陈志莘、王力、刘节、刘荣简等参会。

会议甫一开始,李石岑即提出临时动议,提议先讨论江亢虎校长有复辟嫌疑一事。何炳松、梅思平、陈定谟、胡朴安、戈公振、王力、刘节、刘荣简等先后发言,均极愤慨,谓为学校名誉及今后事业计,应立即否认江亢虎为校长。经详细讨论后,与会人士决定用全体教职员名义发布启事,否认江亢虎为校长,并赞同学生会提议,组织校务维持会。后以记名投票方式,

选定胡朴安、李石岑、殷芝龄、杨自容、何炳松、陈定谟、陈德恒、夏麟及附中主任张四维九人为校务维持会委员,代行校长职权。散会后,又继续开校务维持会委员会议,直到十一时才结束。

8月12日早上8时,校务维持会在南方大学校内举行会议,发表正式就职布告。到会者有胡朴安、李石岑、杨自容、殷芝龄、陈德恒、陈定谟、何炳松等。随后校务维持会委员参加学生欢迎会。欢迎会后即在校长办公室讨论学校事务十余项。8月14日晚7时,校务维持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校务维持会组织经过与反对江亢虎校长原委。

8月16日晚10时,江亢虎抵达上海,随即事态发生变化。17日早8时,“江亢虎突然率校外多人蜂拥到校,自称校长,擅发布告,将教职员十四人解职,学生三人除名。并喊使校外多人驱逐学生会委员三人出校。其余学生一概扣留不许行动,交通断绝,俨然牢狱。又将教务处、事务处窗门打破,窃取重要文件。校务维持会印信、议事录等亦皆被掠去”。同时,舆论发生转向。8月18日《申报》所刊《南方大学学生自治会启事》云“本校被一二阴谋家借故把持,另组不合法之校务维持会”,《南方大学教职员启事》云“南方大学教职员共五十四人,是日会到者共二十七人,内有学生五人,新聘下学期之教员二人,职员一人。举手否认江亢虎为校长者共十六人,除学生三人,新教职员三人,外仅有适法之教职员十人。此种表决方法当然无效”,《南方大学事务长杨卓茂启事》云“所有校务维持会当然委员一席宣告脱离”,《南方大学学生会常务委员李可权启事》云“诬蔑江校长文电及宣言并请求学校当局组织校务维持会公函均盖会印,未征可权同意。除具函朱沛及维持会声明否认外,深恐暑期回家诸同学不明真相转生误会,特此声明”。上述启事从组织程序不合法这个层面否认前述校务维持会的合法地位。同日,江亢虎也在《申报》刊登声明,解

除教授殷芝龄、陈德恒、陈定谟、梅思平、李石岑、何炳松、王耀三、戈公振、陆鼎揆、胡朴安、萧恩承、潘公展，职员孙心盘、戴汉材等十四人职务，开除刘荣简、刘节、王力等三名学生。董纯才、颜虚心等两百余名学生也因羞与江亢虎等为伍而自发离校。

宣言“决不与江亢虎争夺南方大学之地盘，但始终反对复辟之江亢虎，积极援助反对复辟之南方大学学生”的南方大学教授在这种情况下，马上谋划筹办新的大学。8月19日下午四时，李石岑、何炳松、胡朴安、殷芝龄、戈公振、赵兰坪、陈定谟、周南陔、滕固等二十余人借博物院路青年协会场地开会，议决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即日起积极筹备，同时亟请社会各界热心教育的人士担任发起人。除王力前面提到的章太炎先生外，还有袁希涛、方椒伯、王云五、张君勱、郝伯阳等诸位先生也担任该校发起人。8月22日，上海国民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并登报招生，设办事处于四川路青年会。8月28日下午6时，发起人为推举校长一事，到前已提及的西藏路一品香旅社聚餐。到会者有章太炎、章伯寅、何炳松、胡朴安、李石岑、汪英宾、陈定谟、杜定友、朱勤补、朱如堂、蒋保厘、蒋绵恩、陈德恒、王耀三、赵兰坪、殷芝龄、应成

一、梅思平、吴勘初、吴玠、钟纯青、卢海珊等。入席后，首先由胡朴安报告组织国民大学之缘起，次由李石岑报告组织国民大学之经过和章程规定，再由殷芝龄报告校址及招生情形，后章太炎宣言就职。章表示，“吾人兴办大学，应持不偏不倚态度，以造成坚洁人格为主。今承诸君推为国民大学校长，吾当唯力是视，乐观厥成”。章伯寅最后发言，他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对章太炎就任校长表示竭诚欢迎。8月29日，章太炎聘请殷芝龄担任教务长，吴勘初先生为事务主任。9月16日，上海国民大学开始注册、选课，21日正式开课。学校各项工作即渐渐步入正轨。

1926年8月16日，《申报》刊出北京清华学校录取新生名单，王力与国民大学同学刘节、颜虚心一同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自此，结束了其在上海国民大学的求学生活。《本校成立缘起及今后之希望》中提及“清华国学研究院许研究国学有心得而无资格者应考”或可说明王力1925年即已关注到清华研究院，而非1926年才看到招生简章。同年8月23日，上海国民大学还以王力等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为事例，登报宣扬其办学成绩，这自然是后话了。

## 怀念我的父亲：姚克与“坐忘斋”

◎ [美]姚湘著 姜异新译

前几天，我正在写一首新诗，有一个词语始终挥之不去，隐隐感到需要换一个。我停下来查阅辞典，翻开了默立在父亲书架上已经很多年的一本旧书。书页随着我手指的翻动，散

发出父亲书斋的味道。蓦地，我感到好像与父亲相通，尽管他人已经不在，但空气中的气息如同他就在那里！

父亲去世至今已逾一年半。然而，奇异的

是,他好像从未真正离开过。或许,创造性生命的遗产比兴旺发达的实业所遗更具影响力。一方面,是诗歌、散文和音乐的力量;另一方面,通常只是可以花得完的金钱。

父亲的遗产之一是自己的和他人的著作与藏书。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的书房是他内心的圣殿,只有最有价值的灵魂,才能踏进。我对这间书房的记忆是一个孩童的记忆,时间虽然朦胧模糊,但感觉是清晰的。

书房的门总是半敞着。当父亲不在而我又有足够的勇气时,我会冒险进去猎奇一个下午。书房里含有两种诱惑:一是虽未正式宣布也被认为是禁区的神秘感;二是桌子抽屉里埋藏着珍宝的迹象,通常是用厚重的哲学书和古青铜器巧妙地遮掩着。由于年龄最小,我只好自己在那里摸索,因为,唉,哥哥姐姐们想不到要给我一张藏宝图。我那仨哥一姐,利用他们多年在书籍和文件里的侦察经验,已将父亲的藏书体系解码,几乎可以肯定孔子生产腰果;亚里士多德提供杏干;易卜生,瓜子;萧伯纳,巧克力;西塞罗,饼干。

父亲的书房是典型的学者书房——书从来都不是井井有条的,几乎看不到桌面。有时,母亲的清洁与秩序感降临,会来个彻底的大扫除,但她必须当心不能收拾得太勤,因为无论她多么仔细地将文件放到该放的地方,房间该打蜡和除尘的迹象才能将父亲带入状态。

我们这些孩子并没有被明确禁止进入书房,但是,正如一个人会本能地在图书馆低语,父亲的圣殿有一种庄严宁静的氛围,向最优秀的行为发出邀约。我们从不把玩具落在那儿。如果弄乱了什么,我们会在离开前将它们恢复原样。我们可以把书从那里取出,但前提是必须小心地再将它们整齐地放回书架上。

为了阻止贪婪的后代成功探宝,爸爸设计出一种“邪恶”的防卫方法。他习惯于在书房里脱下袜子,把它们挂到半开着的抽屉上。这是收藏有价值东西的可靠标记。然而,要达到这

个目的,就得把那烦人的袜子移开,我可以保证它确实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

父亲对自己的习惯一丝不苟,在某些方面几乎有洁癖,饶是如此,有一次他却把一块已经嚼过的口香糖放回银色的包装纸里,压平,然后把它塑造成原来的形状,重新插入右上角抽屉里那包口香糖里去。不幸的是,随后就被我哥哥约翰找到,这件事便成了家族传说。我依然记得,后来每每忆及此事,父亲脸上总是一副“恶毒”的幸灾乐祸模样,他为自己计谋的完胜,拍手抚膝,狂笑不止。

长大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母亲生了五个孩子,但却抚养了六个——父亲却是其中最不愿意成熟的那一个。他从内心里是个孩子,对人对事始终抱有孩子气的天真。在许多方面,我的父母相处得十分快乐,因为尽管母亲拥有成熟、智慧和在实践中养成的打理生活的能力,但仍同父亲一样单纯、天真。

父亲给他的书房起名为“坐忘斋”;工作时,他特别专注,以致外面的世界不复存在似的。他用毛笔书写的三个汉字刻在打磨过的木板上,挂在书房远端的墙上。我依然记得深棕色木头衬着绿油油的墨汁,使它看上去就像神龛或寺庙门上方的匾额。挨着这堵墙的是两张巨大的红木书桌,背靠背,配套放置着台灯和皮椅。一张是父亲的,一张是母亲的。除了一扇大窗户外,书房每英寸的墙壁空间都从地板到天花板排列着书柜,书柜上有可以上锁的玻璃门,尽管父亲从不费心去锁。

书桌上,有一个看上去颇精致的砚台,还有各式各样的中式毛笔。桌子的左角有一个用某种石化木材制成的大型圆笔筒。我记得那块木头是琥珀色的,带有棕色的小斑点,摸上去凹凸不平。父亲往这个圆柱体里塞了一卷卷宣纸、多余的毛笔、自来水笔、中式扇子,还有几根孔雀羽毛,以及他戏剧中的舞台道具。砚台旁有一把小巧雅致的茶壶。而后是他的烟斗、烟叶和一听香烟。在右边有一个贴着几帧肖像

的相框：我姊姊艾格尼丝(兰)，梳着两条小辫子，经常笑露皓齿；我哥哥安东尼(秦)，头发被风吹拂，看上去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罗伯特(翰)，哥哥有洁净的外表、时髦的头发和带着酒窝的微笑；母亲——头发往后梳成父亲喜欢的发髻，然而我们觉得这种发型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显老——以及两个最小的孩子，约翰(森)，一个瘦小的、有着堂·吉珂德式外貌的聪明可爱的男孩，还有我，沉着脸、皱着眉，好像不愿意摄影师把照片拍好似的；最后是我爸爸，那时他还有头发和稀疏的小胡子。

烟草、墨水、宣纸以及其他东西混合形成了书房里的一种独特的气息。它渗透进书籍的书页，弥漫于我记忆的书页中。这间书房可纪念之处太多了，在这里，许多疑问得以解答，但谜团依然存在，墙壁回荡着那些久远而尚未消逝的声音。

间或在寻找好吃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会停下来看书。男孩们如饥似渴地读关于古代战争和战略家的故事，而我的姐姐则喜欢艺术和电影方面的。父亲的珍藏品是名副其实的初版本和签名本的宝藏，他的朋友当中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和文学家。

母亲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挑战。她以她的书桌设立了奖励制度。我们中不管谁在一学期中功课优异，在下学期就能占有父亲对面她的书桌那崇高的位置。被允许进入这间密室与父亲为伴，是我们虔诚祈愿得到的一种荣誉，更不用说被那么多巨著和优待所包围。成绩单有了新的含义，有时规则会稍微有所偏向，不太聪颖的人可以通过刻苦或凭借行为、书法的评分而得到奖励。

父亲向我介绍了埃斯库罗斯、威廉·康格里夫、约瑟夫·康拉德、萧伯纳、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路易吉·皮兰德罗、亨里克·易卜生和安东·契诃夫等伟大作家，还有奥斯卡·王尔德。父亲告诉我，王尔德是悖论隽语的大师，并举例他被引用最多的那两句话：“除了诱惑

之外，我能够抵制一切。”还有，同一腔调：“摆脱诱惑的唯一途径是屈服于它。”他给我讲了王尔德当年赴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时，纽约海关人员询问他是否有东西要申报的故事。他的回答是典型的王尔德式的机智：“除了我的天才，别无一物需要申报。”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一个年轻、灵活的头脑怎能不被吸引到书架上去呢？

父亲会和我讨论古代哲学家，并津津有味地辩论希腊悲剧。他也喜欢在晚餐时讲故事。他只吃那么一点点，的确是说得太多了。你从来不知道傍晚演讲的话题：有可能是关于哈利彗星的，也有可能是中国茶文化的礼仪与奢侈。偶尔，会听到他讲小时候的故事，或者教一首古老的民谣，他想起祖父的仆人们过去在中国唱的那种民谣。我们乐在其中，不喜欢听他谈论政治和经济，对我们童年时代那温馨的小世界而言，这样的话题显得遥远而乏味。

父亲在八十七岁生日前夕去世。由于父亲直到四十二岁才结婚，在我看来，他永远是那个样儿，几乎没有变老过，因为当我对他的印象成形时，他已经老了。我庆幸父亲很长寿，使我们能够彼此深入地了解。在父女关系之外，充裕的光阴足以使我们产生一种知识上的纽带。大约在十五岁，我同父亲讨论问题时有了自己的看法。那时他的主要剧本都已完成，在向我复述这些剧本时，为了介绍剧中角色的性格，他能够重新表演一番，并吟诵其中的一小段对话。父亲不仅创作戏剧，还导演戏剧，母亲则承担起从筹资到演出的所有具体事务，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团队。

在退休后的几年里，父亲每天傍晚都盼着我从办公室回来。他渴望听我说说一天的情况，聊一聊道琼斯平均指数和利率，因为他对投资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跟上”我银行事业的步伐。但他怎么知道我宁愿谈论关于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或他的戏剧《美中之美》！

现在他走了，我真希望我能再问他上千个

问题,并且能更好地记住他告诉我的一切。当一位朋友说,我是父亲的精神传人时,我被深深打动了。那是我真正想要继承的。母亲和我每天都会想起父亲,有时在追忆里,有时是巧遇中,还有时,当我翻阅一本旧书,不得不经受着书斋散发出的气息。“坐忘斋”攫住了父亲的精髓,此间栖息着他的智慧和顽皮。

附录

#### 致我的父亲姚莘农(姚克)

死亡的丧钟敲响后又是一年,  
对我们来说,眼泪和景象远没有结束。  
八十七年的岁月,上天以为理所当然,  
并不顾及我们的需要!

醒来还是梦中,我们回想  
您的形影,您的威严,  
您神气的微笑,您热切的召唤,  
您的业绩和最甜美的故事。

生日是您最喜欢的时刻,  
我们的灵魂在歌唱,就像正午的钟声。  
今天是您的日子,我们准时庆祝……

新年的鸡鸣声声问候。

落日光环,是您的安息之所,  
光线闪耀在母亲宁静的面庞,  
她引领我们记住卓越的  
戏剧、诗歌和人类。

香,金银的燔祭。  
新与旧的纪念习俗。  
喜庆的气球和鲜花悦目,  
唯有您的坟墓永不冰冷。

母亲的爱,纯洁而永恒,不是  
拥有财富和权力就可以获得,  
绝非只为了仪式,接着被遗忘,  
而是每个日子在她心头,  
都成为爱的同心结。

[谨以此译文纪念姚克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姚湘女士逝世十周年;英文原作出自1993年1月姚湘致姚锡佩书信。作者姚湘(1956—2010),美籍华人,英文名希尔达(Hilda),著名翻译家、剧作家姚克先生与吴雯女士之幼女,曾为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副总裁。]

## 《名利场:杨绛点烦本》实例点评

◎ 郑延国

2013年春天,一百零二岁的杨绛先生着手对“杨必在钱锺书指导下翻译的《名利场》从头校对一遍”,先生“找来萨克雷原著进行校订,

文字语句,并加点烦”。2014年8月“修润完毕”。2016年10月,即先生辞世五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名利场:杨绛点烦本》。



笔者将是书与195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必译《名利场》并参阅英文原著进行了一番比读,发现杨绛先生的“点烦”或曰“修润”又可细分为删字、正字、易字、纠字、增字、修改、紧缩、调整、重复、避重、规范等十一种操作手法,现不妨举例若干一一说明之。为行文方便,杨必原译本中的译文以“必”字引出,杨绛点烦本中的译文以“绛”字引出。

### 一、删字

必:有在笑的,也有在哭的,还有在抽烟的(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绛:有笑的,有哭的,还有抽烟的

必:马车在女学堂发光的铜牌子前面一停下来(第一章)

绛:马车在女学堂发光的铜牌子前面一停下

必:她在大庭广众之前责备利蓓加(第二章)

绛:她在大庭广众责备利蓓加

必:和其他许许多多不好的勾当(第九章)

绛:和其他许多不好的勾当

点评:以上例句显示,点烦本或删去表明动作正在进行的副词“在”,或删去表结果的副词“来”,或删去表示时间、排列次序概念的“之前”,或将叠字删为单一的字。

### 二、正字

必:赶车子的速度不过一小时四哩(第一章)

绛:赶车的速度不过一小时四英里

必:萨谬尔·约翰生博士(第一章)

绛:塞谬尔·约翰生博士

点评:点烦本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某些词语的译法匡正为时下流行的译法。

### 三、易字

必:已经哼哼唧唧哭了好几回(第一章)

绛:已经呜呜咽咽哭了好几回

点评:原译本“哼哼唧唧哭”源于原著中的whimper一词,在点烦本中,被易成“呜呜咽咽”。

必:当时马车正在懒懒地沿着河边走(第二章)

绛:当时马车正在缓缓地沿着河边走

点评:原译本“懒懒地”源于lazily一词。此词一义为disliking and avoiding activity or work,即中文的懒惰、懒散;另一义为moving slowly,即中文的缓慢移动、慢吞吞。点烦本将“懒懒地”易为“缓缓地”。

必:一下子就把克里斯泼牧师结果了(第二章)

绛:一下子就把克里斯泼牧师降服了

点评:原译本“结果”源于dead一词。善于使用比喻的萨克雷说爱上了夏泼小姐的克里斯泼牧师居然被这位小姐火辣辣的眼神给being shot dead。点烦本以“降服”替代“结果”。

### 四、纠字

必:卖艺的倒也费了好些心血刻划她的面貌(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绛:卖艺的倒也费了好些心血刻画她的面貌

必:扬扬洒洒的训了一篇话(第一章)

绛:洋洋洒洒的训了一篇话

必:讲讲人家的隐私(第二章)

绛:讲讲人家的隐私

必:他心底里一向自以为一表堂堂(第三章)

绛:他心底里一向自以为仪表堂堂

必：牛津镇上最利害的拳手都打不过他（第十一章）

绛：牛津镇上最厉害的拳手都打不过他

点评：“刻划”、“扬扬洒洒”、“阴私”、“一表堂堂”、“利害”无疑都是原译本的硬伤，点烦本一一进行了纠正。

### 五、增字

必：显见得她不是个心地忠厚、胸襟宽大的人（第二章）

绛：显而易见，她不是个心地忠厚、胸襟宽大的人

必：回家打老婆女儿（第二章）

绛：回家打老婆和女儿

必：而且几乎是修院性质的慈善机关慢慢的发展成一所走读学校（第五十二章）

绛：而且几乎是修道院性质的慈善机关慢慢的发展成一所走读学校

点评：“显见得”增为“显而易见”，“老婆女儿”增为“老婆和女儿”，“修院”增为“修道院”。

### 六、修改

必：她遭难之后，被带到林荫道去（第二章）

绛：她遭难之后，有人带她到林荫道去

点评：此句原文为 *The catastrophe came, and she was brought to the Mall.* 点烦本将原译本的被动译法改成了主动译法。

必：只有对于温柔好心的爱米丽亚·赛特笠，她还有点儿好感（第二章）

绛：只有温柔好心的爱米丽亚·赛特笠，对她还有点儿好感

点评：此句原文为 *The gentle tender-hearted Amelia Sedley was the only person to whom she could attach herself in the least.* 点烦

本则将原译本的主客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

### 七、紧缩

必：等你回到家里坐下来读书做事的时候（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绛：等你回到家里坐下来读书做事时

点评：点烦本将原译本中的“做事的时候”紧缩为“做事时”。

必：还会做许多别的千奇百怪的、在他正常状态中所不能做的事（第二十三章）

绛：还会做许多千奇百怪正常状态中所不能做的事

点评：此句原文为 *performs other wonders, of which, in his own private normal condition, he is quite incapable.* 点烦本对原译本中所译的定语从句“在他正常状态中所不能做的”进行了紧缩。

必：她总是在低三下四的圈子里可怜巴巴的讨生活（第六十章）

绛：她老是低三下四可怜巴巴的讨生活

点评：此句原文为 *that low sphere in which she had been creeping hitherto.* 点烦本将原译本的“在低三下四的圈子里”紧缩成“低三下四”。

### 八、调整

必：也有人爱看男孩子们跳的一场舞（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绛：也有人爱看男孩子们的一场跳舞

必：说不定乔瑟夫·赛特笠本人就会无意之中听见这话（第三章）

绛：说不定乔瑟夫·赛特笠本人无意之中就会听见这话

点评：点烦本未添一字，也未减一字，将原译本“男孩子们跳的一场舞”调整为“男孩子们的一场跳舞”；将原译本“就会无意之中听见这

话”调整为“无意之中就会听见这话”。

### 九、重复

必：琼斯在他的俱乐部里看这本书看到这些细节，一定会骂它们琐碎（第一章）

绛：琼斯在他的俱乐部里看这本书看到这些细节，一定会骂这些细节琐碎

必：三菩嘻皮扯脸的把箱子递给车夫，车夫也嗤笑着把它装在车子上（第一章）

绛：三菩嘻皮笑脸的把箱子递给车夫，车夫也嗤笑着把这只箱子装在车子上

点评：点烦本将原译本中的“它们”改成“这些细节”，将“它”改成“这只箱子”，分别与前文的“这些细节”、“箱子”重复。

### 十、避重

必：不管在现实生活里面还是在小说里面——尤其在小说里面——可恶的坏蛋实在太多（第一章）

绛：不管在现实生活里面还是在小说里面——尤其在小说——可恶的坏蛋实在太多

必：我巴不得他回去搬嘴，巴不得叫老太婆知道我的利害（第二章）

绛：我巴不得他回去搬嘴，叫老太婆知道我的厉害

必：哪里能在这么短短的一刹那给忘掉呢（第二章）

绛：哪能在这一刹那间给忘掉呢

点评：点烦本将原译本中的重复部分，即“里面”、“巴不得”、“短短的”，一一去掉。

### 十一、规范

必：这本书的名字是“名利场”（第八章）

绛：这本书的名字是《名利场》

必：在“泰晤士报”最后一页上面（第十七章）

绛：在《泰晤士报》最后一页上面

必：老夫人写了一封信到好望角给“芬却莱广场的洗衣妇人”的作者（第四十五章）

绛：老夫人写了一封信到好望角给《芬却莱广场的洗衣妇人》的作者

点评：上述译例中，点烦本将原译本以引号作为书名号的方法规范为正式的书名号。

显而易见，杨必的《名利场》译本经过杨绛的“点烦”或曰“修润”之后，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锦上添花”，且“行文十分紧凑、干净、流畅、明快、传神，质量达到了至臻的境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语）。

杨绛先生对杨必《名利场》译本的“点烦”，表明了百岁长姊对未及不惑之年的小妹译作的特别关爱，其呕心沥血的点烦、修改和润色，无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毋庸置疑，这段佳话是对所有翻译工作者的一种鞭策和提醒：即便是被人称道的优秀译作，仍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空间。唯有像杨绛先生这样，反反复复对译文进行不厌其烦地打磨，才有可能使译作成为历史上的一流名译，熠熠生辉，经久不衰。

# 日本“多文化共生”的理念与实践

◎ 陈学金

日本并非一个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从族群构成来看，除了大和民族之外，至少还包括阿伊努人以及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定居者。只不过这些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例非常之低。但是，近二十年，以“多文化共生”为主题的论述在日本社会颇为流行，这可能有违于常人对日本的认知。2018年，我以民族教育研究者和教育人类学者的身份受邀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以了解日本社会的教育、文化多样性和多文化共生等问题。在此期间，我广泛接触和体验了日本社会的“多文化”。

与北美和西欧的“多元文化”不同，日本社会的“多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2006年3月，日本总务省将“多文化共生”定义为“不同国籍和民族背景的人们，承认相互间的文化差异，建构平等的社会关系，作为同一地方社区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日本社会的多文化共生首先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支持与帮扶上。2019年，日本政府通过并实施《阿伊努民族支援法》，该法案旨在改善阿伊努人的生活和人权状况，推进保护和传承阿伊努传统文化。事实上，除了少数民族之外，日本社会的“多文化”还包括定居的外国人、留学生、残障群体、日侨归国群体等。日本社会的多文化共生是一个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存在，下文择其要者，从学校教育中的语言支持和跨文化理解、科技与艺术创新助力残障群体、定居外国人的社会融合等几个方面介绍相关实践。

无论是在神奈川县川崎小学还是兵库县立芦屋国际中学，学校课堂上除了在讲台上的授课教师之外，还有专门的语言支援教师坐在外国学生旁边，一对一地帮助学生理解日语，这些双语支援教师由当地教育部门聘任，目的在于帮助外国新生尽快适应日语教学。以东京都新宿区教育委员会日语支持规划为例，此规划主要包括日语初期指导项目、日语学习支援项目和外籍初中生升学支援项目。日语初期指导项目分为集中指导和单独指导两类：集中指导基本上为一天三小时，共计十天，地点在教育中心或分室。单独指导在学校或幼儿园内进行，由能够使用相应母语指导日语的教师进行单独指导，一般来说，幼儿指导及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指导分别是五十小时，小学三年级以上及初中生七十小时，辅导结束后进行测验，可根据日语水平变更课时数。日语学习支援项目的对象是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周两天，在放学后向各学校指派日语教师，给学生提供一次两个小时的学习指导，最多一百四十学时。外籍初中生升学支援项目针对外籍初三三年级的学生，原则上在每周三下午六点半至八点半，每人一年约三十五次。日语支援的目的不仅在于帮助插班或转学而来的外国学生提高日语水平，而且重在帮助这些学生化解孤独感，理解社会交往中的习俗、规则和价值观念，提高社会交往技巧。新宿区教育委员会负责语言支援的主管认为，为外国学

生提供语言支援花费很高，但是他们相信这些学生未来的回馈会超过这些付出。

兵库县儿童多文化共生中心成立于2003年，其宗旨在于让所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相互尊重、和谐交往，它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教育咨询，提供学习教材和相关信息、策划和实施跨文化交流活动。接收留学生较多的日本大学，同样重视文化多样性和异文化间的交流。以早稻田大学为例，该校建立了体系完备的推进文化多样性的机构与工作机制。早稻田大学于2017年发布了“早稻田大学多样性推进宣言”，一方面以教职员为对象，努力提升教职员的性别比例均衡，另一方面以大学生为对象推进文化间的交流。针对学生的文化多样性中心又包括跨文化交流中心、残障学生支援室和性少数群体中心三个部门。日本大学中的文化多样性与支持项目，旨在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交流，消除偏见与歧视。

残障群体通常游走或隐匿在社会的边缘而被主流社会所忽视，但是日本社会非常重视运用科技与艺术创新手段帮助残障群体融入社会。从几位从事残障群体服务的创业者经历就可以看出这种特征。须藤先生出生于1963年，是一家非营利组织的法人，由于其次子出生就罹患脑瘫，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探索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方法与技术创新。2002年他发起社会工程(social project)项目，策划相关活动。2012年起成立人类设计(People Design)研究所，力图以时装和设计的力量来破除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障碍，运用新技术与新思维促进残障群体和正常人群的交流 and 交往。须藤的艺术设计为很多残障人士带来了自信，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岛影圭佑(Keisuke Shimakage)生于1991年，他创立了公司，致力于阅读能力拓展设备的研发和商业化，以便能够为失读症(阅读障碍、读写障碍)及弱视者提供支持，同时帮助人们克服在国外无法阅读当地文字等各种情况的不便。他的团队研发了智能眼镜(Oton Glass)，这

种眼镜搭载小型镜头和耳机，通过将视觉文字信息转换为语音信息，从而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支持。在智能眼镜的帮助下，阅读障碍者可以轻松阅读身边的文字从而获取信息。同样非常年轻的本多达也(Honda Tatsuya)以人的身体及感觉拓展为课题，与聋人合作，致力于新的语音感知设备的研发。发夹助听器(Ontenna)就是他的团队研发的产品，这种设备可以帮助聋人用震动和光来感知外界的声音。日本利用科技和艺术创新助力残障群体融入社会更好地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新科技的发展，如今这些产品在国际社会也受到了普遍欢迎。

常人可能很难想象：经常发生的地震灾害不仅促成了在日定居外国人自身的组织与团结，而且也极大地促成了日本人与定居外国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可以视作这种交流融合的开端，在地震中救援、互相帮助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人与定居外国人的交往。人们在与自然灾害抗争的过程中淡化了族群的分类模式，而在生存意义层面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多文化共生”一词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被互助性质的社会组织首先提出和应用的。现在，很多人都已意识到，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不论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在灾难面前都是同样的受害者。人们应该在平时建立起一种相互交流的关系，在紧急时刻就可以做到互相帮助。

神户居住外国人支援中心是一家民间非营利机构，宗旨在于促进地域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团结共生，它是由阪神大地震后成立的“兵库县居住外国人生活复兴中心”和“受灾越南人救援联络会”于1997年合并建立的，其开展的项目主要有职业、教育、医疗等相关咨询，日语学习支持，子女支持，民族文化发展，高龄者支持，推进与行政机关合作，调查研究等。在居住外国人支援中心开设的日间护理中心，有十几位外籍高龄老人在此生活，中心为他们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和帮助。这个中心可以看作日本

人与定居外国人交往融合的一个缩影。

埼玉县川口市芝园社区是一个多族群居住的混合社区,外国定居者已经超过了一半。当地人对社区中的外国人并无好感,因为一些定居者没有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而且还经常在深夜大声嚷叫。为此,当地人和外国定居者之间也爆发过尖锐的冲突。社区自治会通过吸纳外国居民担任自治会委员、与大学社团开展合作举办跨文化交流活动来推动“多文化共生的社区建设”,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天中午,社区自治会会长菲泽胜司与我们共进午餐,席间访问者问他中国饭菜是否可口,他说很好。但他又坦言:自己在这个社区居住了近三十年,这是他第一次在中餐馆用餐。在整个交往过程中,他都很少说话,对客人既保持尊重又维持一种距离感。冈崎广树生于1981年,他是一名致力于社区文化融合的社区工作者,他深知普通日本人对于移民群体的敌视和不友好态度,他说:“普通的日本人其实并没有经济条件可以经常到国外旅游,所以他们不知道被冷落的滋味。最有效的办法或许就是让他们都到外国走一走,感受一下!”

实际上,日本社会中的残障群体等称为“亚文化群体”可能更为恰当一些,而少数民族、定

居外国人、留学生群体才真正具有“异文化”的特质。因此,在此意义上,日本社会的“多文化共生”是一个“异文化”与“亚文化”相结合的混合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影响,又是日本政府处理在日外国人和移民问题的一种审慎举措。但从本质上看,日本“多文化共生”追求的仍旧是一种国家整合或一体化的状态。换言之,他们希望将社会中的各种差异性和多样性转变为一种建设的力量,这是由日本的人口结构和国情所决定的。在高度同质性、高度默契而又相对内敛的社会中,亚文化群体和异文化群体已经被日本主流社会视为一种珍贵的资源,他们希望尊重、包容这些群体,并希望他们能够回馈给社会更多的利益。由于日本社会少子与老龄化的特征,从中长期来看,日本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是长期的主题,而如何面对和接纳这些群体,是日本“多文化共生”的一项重点议题,而“多文化共生”正是日本政府应对这一议题提出的政策话语。从根本上来说,日本“多文化共生”的关键在于主体民族对外国定居者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尊重、认可与接纳,但这似乎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实际上,与少数民族、移民相关的身份与权利的争论在日本政界和民间一直都在持续之中。

## 一道清新而丰富的午后沙拉

——读《我在日本做公务员》

◎ 平 瑶

《我在日本做公务员》是作者 RORO 在神户兵库县国际交流课工作一年的点滴记录,这本书像一道清新可口的蔬果小餐,读起来感觉非

常舒服,没有浓重的渲染,也没有多余的抒情,原原本本,简简单单,素素净净。这些可爱的食材来自大海山川之外,经过某位姑娘随心的采

摘、悉心的看护、恰到好处的料理,干净地呈放在我们面前。

从日本的公务建筑非常旧却显得如新建一般崭新,可见出他们建筑质量之高、建筑物保存之好。从日本公务员的几个种类和待遇的情况,见出他们高效而略显残酷的职场氛围。书里描述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冲向电梯的人流,真真假假的加班,旷日持久的报销等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小事,勾勒出日本政府运作与职场生活的丰盈剪影。

许多体验对我们来说十分新鲜:县厅大楼的门随时向市民打开,无须登记审查;公务员们难以推脱教市民外语、接市民电话之类的额外业务,不敢不以恭敬周全的态度面对民众;职员之间的陌生和客气以及日本政府在与金钱有关的事务中常常有的捉襟见肘的局促感等,这些正与公务员的体制和经济状况有关。公务体制对职员们谈不上友好,并不能确保他们一生的安稳富足,这样的体制却保证了民众的权益,并提出各种各样对职员来说并不见得那么可爱的要求;町长常常参与市民和学生的活动,校长和学生一起做游戏……若非切身真实的体会,很难想象陈旧与高效、残酷与温柔之间如何得以达成如此和谐的共存并行。日本残酷而温柔的美学,似乎也渗透在他们的行政机制中。这本书可以极大地满足我们对其他国家公务员工作和生活的好奇心。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边远山区里的学校也有外教,有来自各个国家

的公务人员共同参与校园活动。在教育这一点上,我们的家庭煞费苦心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的邻居却由学校、政府、整个社会的参与,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同样广阔的地平线,让每一个孩子心里有梦、脚下有路。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有赖于每一个孩子健康蓬勃的成长,日本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书中尤其吸引人的是作者在点滴生活中对周围人的观察:有不惧将来,享受当下,来日本做短期工作的澳大利亚姑娘;有衣着得体、妆容精致来老年大学听讲座的老奶奶们;有工作育儿学习连轴转,却阳光快乐着的单亲妈妈;有热衷于学习中文和各种语言,热心爱玩的老爷爷等。“生命的形态那么多,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丰满”。一幅幅不同人生的素描,一个个有着截然不同背景和命运的人们,都有着强大的内心,发自内心的阳光和温柔。看到有这么多可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结结实实、漂漂亮亮地活着,感觉自己的人生和所在的世界似乎也都明亮了起来。

很喜欢作者的笔触和眼光,不溢美,不避讳,不过多渲染,理解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祝福每一个人。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日本,关于公务员,它关照得最多的是人,是心。那些来自山川湖海的故事和风,渐渐化作她的翅膀,带她飞向想要去的地方。感谢如作者这样观察着、思考着、书写着的可爱的人们,让我们看见这一切。当她们的翅膀在空中划过,我们的世界里也有了风。

## 本刊启事

一、凡向《书屋》投稿的作者,一个月内未收到采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由于编辑部人手有限,手写稿一般不退,敬请作者自留底稿。

二、《书屋》杂志拥有所刊文章的网络传播权及数字出版权,在来稿中有特殊声明,拟不向本刊授予网络传播及数字出版权者除外。

三、时下生活节奏很快,人们盼望在有限的阅读时间内有最大的收获,因此《书屋》杂志尤其欢

迎短小精悍、高质量的书评类文章。

四、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书屋》杂志社

2020年8月

## 以爱之名 泅渡深河

——远藤周作的宗教情怀与文学

◎ 周朝晖

—

我很晚才开始接触远藤周作的作品。因为接触方式很特别,在私人阅读史上可以说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随波逐流自费东渡日本开始漫长的游学生涯。初来乍到,我在埼玉县大宫市(现为大宫区)落脚,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余寒冷峭的春假里,为了积攒学费,我到住所社区一个小型摩托车安全帽工厂打工。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茶歇时段,我在车间休息室里随便翻翻当日的《读卖新闻》时,无意中看到文化版上刊出远藤周作回忆录连载《留学法兰西》(题目大约如此)。当时对我来说,远藤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作家。说陌生,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甚至名字也是到了日本才知道的;说熟悉,是每天晚上必见。九十年代初东芝推出一款文字处理机“哇普罗”(word processing machine),由知名作家轮流当代言人,其中就有远藤周作。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黄金时段NHK新闻播报之后,远藤如期而至,他瘦高个,大额头,黑框眼镜,脸色苍白,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码字如有神助,动作神态极尽夸张搞笑。而且,普通日本人似乎对他也不陌生,我记得“狐狸庵先生”这个与他有关的雅

号,也是一个姓仙波的老员工告诉我的。

不过,这个广告并没有激发我去读他的作品兴趣,只缘无暇顾及。但在工场里就不一样了,因为工作乏味单调,看报纸,尤其是带有故事性的回忆录文字,不但可以消磨时间,还能愉悦心情。顺手拿起报纸浏览,本来纯粹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歇息时间,但目光落在远藤的连载上,就停住了,因为开头的段落把我吸引住了,遥远青春时代的留学生在作家笔下趣味盎然、跃然纸上:艳阳下南欧普罗旺斯的田园风光,善良淳厚的房东夫妇,美味芳醇的葡萄美酒,恶作剧不断的寄宿生活……这些带着光彩和色泽的文字令我心驰神往,浑然忘了身边骨感的现实。彼时我刚到日本,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自费生,学习、打工没有一样省心,压力如影相随。几个月来,忙碌而艰辛的工读生活使我身心疲惫不堪,简陋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和单调的活计使我感觉麻木。远藤的文章像清风吹入深谷,重新唤起我对美好事物、美好人生的憧憬和向往,顿时眼前一片光明和温馨。

这样,在工场的休息室里连续读了两三篇后,意犹未尽,开工后我悄悄将连载《留学法兰西》的版面单独抽出,按排版折叠成小方块,放在机器旁,边机械地打孔钻眼,一边瞄一眼那美妙的文字,欣赏暗诵,乐在其中,直到有一次



被工场长巡视发现后怒呵制止,因为违反劳动安全纪律甚至差点因此丢了工作。我为了能随心所欲读远藤的文章,索性自订《读卖新闻》。每天早上天刚破晓,听到屋外送报人开启信箱投送早报时的声音立即披衣而起,沐浴漱洗后就在书案前盘腿而坐,利用出门上学前的一个小时时间,边吃简单的早餐,边兴致勃勃地诵读远藤的连载回忆录。这段晨读一直持续了近两个月,日式公寓窗外的樱树,从光溜溜的枝条,到出现花蕾,又到含苞欲放,再经过繁华如云似锦最后到残红消退枝叶青青时,连载才结束,这么用心读一个作家的文章,在我的阅读史上前所未有,后再难继。

这些文章成了进一步阅读远藤作品的垫脚石,我开始有意识涉猎远藤的作品,借助《广辞苑》之类的工具书,磕磕绊绊开始读远藤的书。远藤是大作家又非常高产,他的作品很多以廉价而又畅销的文库本出版,社区的小书店都能买到。我从自传、随笔《狐狸庵闲话》、《读了也没用的随笔》等,对他个人的生活与情趣进一步了解后,再接着读他的小说代表作,从《白人》、《沉默》、《海水与毒药》、《哀歌》到《最后的殉道者》……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读了不少远藤的书。

阅读,在我眼前打开了另一个天地,我才知道在我原先自以为熟悉的日本文学中还存在着一个被称为基督教信仰文学的领域,而远藤周作作为这个系谱上最卓越的作家,他的成长道路和文学生涯非常独特,堪称“另类”。

## 二

远藤周作与基督教有不解之缘,源自早年生活经历的深刻影响。

远藤是东京土著,1923年3月生于首都圈内一个高级白领之家。父亲远藤常久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专业出身的俊彦之才,在安田银行(今富士银行前身)当高管;母亲是上野音乐学

校学生,专攻小提琴专业: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日本也可以步入中流精英行列了。远藤周作三岁那一年,父亲调往中国大连的分行任职,举家随其迁移,远藤的童年时代是在中国东北度过的。小时的远藤周作天真活泼,喜欢画画和小动物,但是学习乏善可陈,与他那品学兼优的哥哥正好形成鲜明对比,经常受到父亲的呵斥,幼小的心灵就蒙上了挫败感和自卑感。而给予他巨大影响的是母亲。在远藤看来,母亲身上有一种近乎神性的东西,是爱的化身和使者。母亲天性善良仁慈,对当地保姆也很宽厚亲切。与父亲苛刻轻视相对,母亲对孩子极有耐心爱心,每当远藤周作因成绩不好受到父亲教训打击时,母亲总是鼓励他“不要灰心,你是大器晚成啊”。小学四年级时,远藤周作一篇作文《泥鳅》被大连日系报纸《大连新闻》采用,母亲大为赞赏,预言他长大当作家。她温柔优雅的外表下有一种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对艺术有着求道一般的执着与献身精神。大连的深冬滴水成冰,母亲披着棉袍,立在严寒中,每日雷打不动连续数小时拉琴,指尖流血不止仍不停息,令周作内心受到震动。母亲不但是远藤周作艺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文学才华的伯乐,最重要的是他宗教信仰的引路人。这要从早年一场家庭变故说起。

十岁的时候,父亲外遇,家庭气氛急转直下,1933年,父母离异。父亲再婚,母亲带哥哥和他回到日本,投奔在神户的姨妈。为了生活,母亲在当地一所女子学院任音乐教师,周作转入神户市的六甲小学校读书。神户是异国色彩浓郁的城市,作为近代日本最早的贸易商港,西方教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姨妈一家都是天主教徒。婚姻受到挫折的母亲受姨妈的影响,在参加当地教会的宗教活动中找到了心灵归宿,皈依天主教会。1934年的复活节,十二岁的远藤周作和哥哥一起皈依天主教,洗礼名保罗(Paul)。不过幼年入教,对远藤而言还谈不上触及灵魂的事件,他后来称这段经历是“母亲给

自己穿上的不合身的西装”。长大了觉得不合身,穿在身上别扭,几次想脱掉。他早年的天主教信仰,不是与上帝的契约,而是与母亲的合约,个中包含了悲天悯人的“理解之同情”或“同情之理解”。

上了中学的远藤,对学习不感兴趣,痴迷于读课外书、看电影、嬉笑搞怪恶作剧,不仅中学以接近垫底的成绩毕业,因为连续三次考不上大学,沦为回炉补习的浪人三年。其间,虽然考上上智大学德语系,但因离父母的期待差得太远,只好中途退学,再次准备高考。此前,父亲已经从大连调回东京,在世田谷经堂定居。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远藤兄弟和父亲协商让他到东京和父亲一起居住,一边准备再考。父亲开出的条件要求必须考入旧制帝国大学或大学医学部。远藤周作按照父亲的要求一一投考,结果全部落第,最后只剩一个庆应大学的选项。他估摸以自己的成绩绝对上不了条件苛刻的医学部,就偷偷报了文学专业,居然候补合格。1945年春天,进入庆应大学法国文学科学习。不久父亲得知真相,尤其是看他学了最不中用的专业,勃然大怒,驱逐出门后永远断绝父子关系。失去了依托的远藤周作只能靠自己解决生计,一边上学一边当家教,在学友利光松男家(后任日本航空总经理)寄宿,困窘不堪。在上学期期间,远藤周作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思想家吉满义彦和松并庆训,在他们的熏陶下,耽读法国天主教思想家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和里尔克的著作,并结识了作家龟井胜一郎和堀辰雄。与堀辰雄的交游,是周作人生的转机,按照他的说法,从此告别了“超低空飞行时代”,在文学的天空中展翅翱翔。

在身边一流哲学家和作家的影响下,远藤周作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作家莫里亚克、贝尔纳诺斯等作家的作品,一边勤奋写作。1947年12月,他写的第一篇评论《神与诸神》脱稿,受到著名作家神西清的激赏,并刊发在

其主持的《四季》期刊第五号中;不久《天主教作家的问题》一文也被恩师佐藤朔推荐发表在《三田文学》,其后《堀辰雄论》又分三期在《高原》连载。这几家杂志在当时都是深孚众望的文学期刊,短时间如此密集地发表文章,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实属罕见,远藤周作作为新进文学评论家的形象呼之欲出。母亲在他幼年时代的“大器晚成”、“长大当作家”的预言,成为现实。

1950年6月,远藤周作以战后第一批留学生的身份,搭乘客轮赴法国巴黎里昂大学读博,研究现代天主教文学。在里昂大学,他师从著名宗教文学研究学者巴蒂,他一边大量阅读法兰西基督教文学的经典论著和小说,一边为日本国内的刊物撰稿,留学生活充实而浪漫。不过,两年半后远藤健康出了问题,被确诊为肺结核,只能中断博士学习生活回国治病。两年半的留学生活虽然短暂,但对远藤周作的文学生涯来说却意义非凡。其一,他由此确立了从评论家向小说家转型的志向;其二,在法兰西的学习阅历和体验,他坚定了对天主教的信仰。可以说,留学法兰西,奠定了远藤后来成为日本基督教文学先驱的基础。

### 三

回国后,远藤周作任教会杂志《天主教文摘》主编,除了负责杂志的一些日常事务,业余时间为杂志撰稿,并开始尝试由评论家向小说家转型。此前,现代日本文学在战后的废墟上重新出发,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远藤周作因缘际会,以一系列创作实绩,确立了战后文学“第三代新人”代表的地位,实现了在前评论家身份上“重新出发”的华丽转身。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起点,日本现代文坛出现了新的变化,先后出现了以野间宏、椎名麟三和梅崎春生为代表的战后派作家群,以武田泰淳、安部公房、大冈升平和三岛

由纪夫为代表的第二战后派。“第三代新人作家”紧跟其后登上战后文坛，他们是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三浦朱门、小岛信夫、近藤启太郎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同属战后崛起的作家群，却被主流评论界称为“新人”，说明这一代与前两代战后派作家具有本质上区别。最大不同，是将笔墨从对战争的记忆的描述转向当下生活的场景和内心感受，回避政治国家社会重大题材，转入私小说叙事。远藤在回国后的文学转型，首先从私人写实起步。1953年7月，远藤追忆法兰西留学生活的《留法日记》和《在阿尔卑斯山艳阳下》等作品先后发表，其后结集为《法兰西的大学生》一书由早川书房出版，这些作品只是文学转向的铺垫之作，却获得文坛瞩目。

而作为青年小说家，远藤周作出手不凡，一出道即被视为“第三代新人”的代表。1954年11月，在《三田文学》发表《到亚丁去》，遵循的是日本明治文学的私小说笔法，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而翌年发表的小说《白种人》，一举斩获第三十三届“芥川奖”，成了步入第三代新人作家的祭旗之作。继《白种人》之后，远藤周作的文学生涯一帆风顺，渐入佳境，此后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推出一部重量级长篇，作为积蓄能量和休整，佐以随笔幽默小品和历史小说，超级高产，成了拿遍日本国内各种文学奖的专业户，且不止一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国畅销。可以说，在战后灿若星辰的日本作家群体中，远藤周作以一系列作品跻身于当代最优秀作家行列。

远藤周作文学的最大特色，即是以基督教为主题以及蕴含在作品中的人生哲理宗教情怀。基督宗教信仰是远藤文学的内核与灵魂，离开宗教信仰，远藤的文学价值就无从谈起。换言之，远藤的文学兼具神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关于神性与人性的文学表现与思考。

可以说，远藤周作的作品特别是最主要的代表作，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来展开的。这其中，《沉默》与《深河》无疑是表现这个伟大主题的杰作。这两本书远藤生前十分看重，临终一再嘱咐家人，死后将这两部书放入棺椁伴随长眠。

长篇历史小说《沉默》是远藤周作的基督信仰文学的代表作，远藤由此奠定了“二十世纪基督教文学最重要的作家”的地位。几年前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将原作搬上银幕，并在梵蒂冈首映。罗马教皇方济各亲临小教堂观看放映，一举成为世界影坛和基督教领域一大佳话。作品是在十七世纪初期日本江户幕府实行锁国禁教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葡萄牙耶稣会派到日本的教士克里斯多夫·费雷拉神父，在历尽千辛万苦传教二十年后，最终屈服于幕府的残酷刑罚而叛教。青年神父罗德里奥受耶稣教会委派远涉重洋来日本调查此事。他在澳门下船后偷渡日本，潜伏在长崎郊外秘密调查叛教事件，后来因叛徒出卖，被幕府缉拿。为拯救更多无辜的信徒，罗德里奥被迫用脚踩踏刻有耶稣圣象的铜版，当他的脚踩上踏绘时感到一阵剧痛。这时铜版上已经被踩踏得影像模糊的耶稣仿佛在对他说：“踏吧！我知道你脚痛。正因为知道这种痛，我才降生世间背负十字架的。”

这个故事并非虚构架空，而是取材于真实的史实，经过作家直抵肺腑的追索拷问，读来惊心动魄。在文京区茗荷谷，我曾参观幕府时代关押“弁天连”（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和信众）的牢狱“切支丹屋敷”。1643年，遭遇海难漂流到日本九州的意大利传教士朱塞佩·齐亚拉（Giuseppe Chiara），被长崎当局捕获后就被关押在这里。后来受不了残酷的身心摧残，齐亚拉被迫放弃信仰，改名冈本三右卫门，在日本娶妻生子，了度残生。此人就是远藤《沉默》中克里斯多夫·费雷拉的原型。远藤也去过位于长崎市当年荷兰传教士集体殉道的遗址，那里伫立着江户时代被杀害的二十六个传教士

浮雕,其中有一块《沉默》之碑,用以纪念这部巨作的问世。这部小说于1966年问世,但是准备和酝酿却经历了多年时间。远藤自幼多病,战争期间因体弱侥幸躲过兵役,但因肺结核动过几次大手术,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以此为契机,“开始认真考虑上帝的事了”。1959年周游欧罗巴列国,归来肺结核复发,差点送命,住院两年多,1961年肺部再次出问题而接受手术。生病期间,偶然从朋友带来的报纸上读到关于长崎“踏绘”的历史考据文字,触发了无尽浮想。1963年,远藤病愈出院,多次去长崎实地踏查取材,搜集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沉默》。

#### 四

比起《沉默》,和很多远藤文学粉一样,我更喜欢的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深河》。一生对自己的创作说长道短的远藤对这部书颇为自许,说它是“迄今为止的自己文学的总决算之作”,“是一生集大成之作……其间,我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全部写完了……就像自己的遗书一样”。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出版于我到日本的第二年,当时我已经读了不少远藤的文库本原著,我有幸目睹远藤生前最具影响力的巨作出版及发行的盛况。我还清晰记得经常光顾的新宿纪伊国屋书店里原本光顾者不多的纯文学专柜前排起长龙争购《深河》的情景。

与《沉默》的背景不同,《深河》讲述的是一个旅途故事,背景是南亚大陆的文明古国印度。但这部充满异国情调的小说讲述的却是日本人的故事,而表现的主题却一以贯之地在《沉默》展示的“人性的救赎”这一主题的延长线上。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腾飞以后的日本人满天飞,没有不去的地方。小说《深河》写的是几个到印度的日本旅行者,所谓深河就是印度教的圣河——恒河,以此作为小说的舞

台。但这些人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旅行者,他们“背负着生命中的各种辛酸和伤痕”,在深河畔祈祷。

小说以矶边的故事开篇。矶边是中年公司职员,长期刻板规矩的上班族生活使他形成拘谨冷漠的个性,此前妻子患癌症去世,他才痛感妻子走后留下的巨大虚空。妻子临终前神启般相信死后会转世,留下遗言:“我一定会转世,在世界某处,我们约好,一定要找到我!”尽管矶边不是宗教信仰徒,不过,抱着对妻子的愧疚和忏悔他决定试试,报名参加印度旅游团,满心期待能在世界某个角落找到转世的妻子。出乎意料的是,与他一同参团的还有一个曾经在妻子卧病期间负责看护的义工成濑美津子。

美津子是一个另类的女人——美丽、浪漫,但又任性,性格冷酷,缺乏爱心,行为乖张,身上有着某种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潜意识里又似乎潜藏着某种不可思议的愿景。她在医院当义工,照顾病人无私奉献,这一切并非源自爱心与慈善,而是出于对爱的某种模拟演习。年轻时,她玩弄过一个名叫大津的男人的真情,挑战过大津的宗教信仰。她参团来印度,是冥冥中受到某种启示,来寻找那个曾经被她无情抛弃而又一刻无法去怀的大津。不可思议的是,在瓦拉纳西城,果然真的与在这里从事神圣工作的大津不期而遇……

大津并非参团人员,但他却是书中的重要存在。大学时代他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成濑美津子企图想将他从神身边拉走,最终又将他抛弃。信仰崩塌的大津开始放浪修行,辗转法国里昂神学院,试图寻找适合日本人心灵的基督教。他秉持日本人的泛神论,认为“神有几种不同的脸,隐藏在各种宗教里”;神不是“在人以外让人瞻仰的东西,而是在人之中,而且包容人、包容树、也包容花草的大的生命”。这种多元的、泛神论宗教观使他在—神教的欧洲教会中难以容身,晋升神甫也终成泡影。为了践行自己的神学理论和信仰,他毅然来到印

度传教,在瓦拉纳西城(Varanasi City),奔走于陋巷与河畔之间,将临终的教徒背到河边沐浴或火葬。后来因为替一个犯禁的客人顶罪,受到暴怒的信者攻击,惨死于河边。

还有几个人物:经营运输业的退伍老兵木口,他要到印度祭奠亡灵,他的战友在二战的缅甸战场上,在极端困境中吃了蜥蜴肉(人肉)而幸存下来。战争结束后,因陷入暗无天日的罪恶意识无力自拔,最终自尽求解脱;喜爱动物并以此为题材的童话家沼田,他坚信是一只鹤哥代替了本该病死的自己,他要前往鹤哥的故乡印度放生鹤哥……总之,旅行团的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去接触感悟生与死,信仰与永恒。对他们来说,此行与其说是观光之旅,不如说是灵命之旅。书中的“深河”成了测度生命、命运的河流,平稳的河面下隐藏着一个个深不可测的生命之谜:生与死,神与人,信仰与人生等,沉重得令人透不过气,读罢,令人掩卷长叹。

令人击节的是,在《深河》中,远藤在旅途故事的叙述框架下,为人物的外在遭遇与心路历程别出心裁安排了一个底蕴极为丰富的舞台。首先,以印度这个充满宗教文化色彩的古老国度为背景,极富象征意义。印度是世界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是历史上多种宗教,如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的源头。世界各种主要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与印度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印度可以说是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国家。自古以来在这种宽松多元的宗教观影响下,这个古老的国度散发着浓烈的宗教气息,各种宗教在这里碰撞又彼此和睦共处。

其次,书名所谓“深河”,指的就是故事的背景印度恒河。众所周知,恒河是印度文明的起源圣地,也是印度人的母亲河与生命之河。在小说里,每个背负不同命运、悲酸与罪孽的人在恒河交会,恒河就是测度生命深度之河。

第三,故事的舞台选在恒河之滨的瓦拉纳西城,也是意味深长。瓦拉纳西城坐落于恒河

中游左岸,是每个印度教徒一生要朝拜一次的圣地,很多教徒不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这里,据说每天聚集于此的印度教徒上万人,或在寺庙诵经布施,或在恒河里沐浴祈祷;很多信徒都希望死在河里,让尸身漂浮河面,将骨灰撒入河流里,无论贫贱富贵,一经河流洗礼,一切过错罪孽都会得到净化,所有恩怨仇恨都会被消解,所有喜怒哀乐都会被包容在河里,所有信者都会被带向永恒……

远藤周作的宗教文学中,既写了基督的爱与慈悲,写了罪孽与背叛,也写了不同宗教的对立与对话,写了宗教多元主义。从写作时间跨度上看,《深河》与《沉默》相隔近二十年;从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看,《沉默》反映的现实是十七世开始延绵近三百年的幕府锁国时期;《深河》中人物活动的时间则发生在战后经济实现极度繁荣,国家社会发展高歌猛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写作时间和故事的背景尽管差异很大,但两部作品的主题惊人一致,那就是关于爱,关于信仰和救赎——这或许可以称得上作为基督教文学求道者的远藤周作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吧。

## 五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得将书页翻回书的开始,那是故事的出发点。扉页上摘录了一首歌:

深深的河流,神啊!  
我也想渡过河去,  
到集结之地。

远藤将这首《黑人灵歌》置于卷首,可以视为它就是全书的提纲挈领。据说,远藤在写作过程中,听了这首灵歌后受到触发,才决定为小说定名《深河》,在书名旁特地标注英语 Deep river 的片假名读音“デープリーバ”,就是为了提醒读者,书名较为日语的“深い河”有着更为

深广的内涵。

在西方文学语境中,Deep river 一词有着极为深刻的宗教内容,指的是摩西率领的以色列人在经过荒野广漠四十年筚路蓝缕的磨砺试炼之后,才横渡过的约旦河。从这一宗教历史出发,河的对岸就是约定之地、集合之地,也就是《旧约·创世记》中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与得到上帝“拥有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应许之地”,是富足和平幸福与安宁的天堂。这个意象被远藤移植到《深河》里,并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隐隐暗示着:深深的恒河,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圣河,是爱与救赎的生命之河、灵修之河,它以宽广的胸怀和悲天悯人的大爱,接

纳身在此岸、处于水深火热之现实与灵魂的煎熬中无法自拔的人们,无分别、无功利地度往彼岸圣地。在人心礼崩乐坏宗教纷争冲突此起彼伏的当今,只有爱与慈悲才能屏息一切仇恨和对立,超越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渡过带来灭顶之灾的洪水滔天……

灾难、阻隔、生老病死、爱别离等一切不幸,自远古以来与人类如影相随,也是古今中外文学歌咏不断的主题。《诗经》有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在远藤周作的《深河》里,表达的是一种对阻隔实现超越的宗教文学情怀,颇见异曲同工:“以爱之名,泅渡深河。”

## 美津子的彷徨

◎ 陈司琪 刘剑梅

远藤周作的《深河》成书于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与疾病痛苦纠缠,生命到达油尽灯枯之时,仍然执笔与死神搏斗,留下这一部“总决算之作”。尽管他自己对《深河》并不满意,认为其“不像《沉默》让人沉醉,也不如《武士》那么浑厚”,但是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包含了这一生对宗教信仰的思考,读者依旧能从中挖掘出许多精神宝藏。

从乡下来到东京上大学的美津子,因着这种源自出身的自卑感,通过挥霍金钱来融入当时的同学圈子。但美津子并不认为这样的圈子就是自己所向往和憧憬的,她被同伴们簇拥着,“内心深处却又瞧不起他们”,甚至在他们说她能喝酒能开车时,“心底升起一股分不清

是愤怒还是寂寞的强烈情绪”。美津子在这其中感受到的空虚,来自对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也来自对自己所追求的未来的未知。很难猜测如果美津子没有遇到大津,她的生活会往什么方向去发展,但无论如何,她在当时正好遇上了与她的圈子格格不入,甚至还显得滑稽可笑的大津。

起初,美津子对捉弄大津并不感兴趣,认为这只是学弟们无聊的校园生活中的无聊消遣。但当她从大津口中得知他的信仰,又从同伴那边得知他每日虔诚地祈祷,对这个表面上老实巴交的男生产生了兴趣——并不是什么善意的兴趣,而是“觉得这种男子常会有伪善的地方”。她想撕开大津的面具,想证明这个看

起来与众不同的男生,在骨子里不是同朋友们一样世俗,就是和自己一样空洞;从一个无神论者的角度来说,她也想证明大津的信仰只是一种家庭的习惯,随时都可以被轻易放弃。可是大津却对美津子说,“即使我想放弃神……神也不会放弃我”。这样的话,对美津子内心的震撼太大了。或许她从未相信过大津的祈祷可以得到他的神的回音,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形式,而此刻她却发觉大津的坚持并非一厢情愿,两相对比下更加重了她内心的空白虚无。她的引诱行动变本加厉了,这样的羁绊让她更有破坏的冲动,她对大津的信仰下战书:“神啊,我要从你那儿把他抢过来!”在大津遵守约定不再去库尔特尔屋时,她对着耶稣的塑像耀武扬威:“他不会来了,你被他抛弃了。”她似乎变成了莫伊拉的化身,享受着这种“从一个男子那里夺去他相信的东西的喜悦,让一个男子的人生歪斜地快乐”。但很快,美津子大获全胜之后就厌倦了这种乐趣,也抛弃了大津。

我们无法得知美津子在抛弃大津之后,以及在与矢野相亲结婚之前,是怎么过日子的,只有一点片段告诉我们,她在毕业之前曾有过一段努力读书的时间,并且意识到“学生时代在体内涌动的那种想弄脏自己的冲动是多么愚蠢”。她放弃了之前游戏人生的行为,也放弃了自我破坏的行为,转而尝试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平淡地过完一生,因此选择了矢野作为结婚对象。

当她得知大津跑去念神学院要当神甫后,她内心也不过认为,“神不过是贪婪地把我抛弃了的男人重新捡起来罢了”,“瘦削男子捡起她扔掉的东西,如小孩子抱起掉落在沟中满身泥泞、不停吠叫的小狗”,一种作为胜利者的心态依旧根植在她心中,也正因如此,当她在新婚旅行中厌倦了自己的丈夫,无数次将自己与苔蕾丝对应起来时,她更加质疑自己的选择,这似乎不是一个胜利者应该落入的境地。她没

有办法掩盖好自己爱已枯竭的秘密,同许多改邪归正的人一样,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于是她从这令人窒息的新婚旅行中逃离出来,作为自己最后的任性,前往了苔蕾丝的兰德,也前往了大津所在的里昂。很难说美津子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见大津的——作为胜利者去同情这位失败者,还是需要这位失败者的凄惨模样来抚平自己内心的不平稳,又或者只是单纯好奇为什么他又去了神学院。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从大津口中得到的答案都不是她所想要的,甚至这答案还粉碎了她一直以来自以为的胜利者地位。

之后,美津子离了婚,脱离了苔蕾丝的角色,开了一家服饰店,周末的时候还会去参加医院的义工工作。这并不是由于她富有同情心之类的原因,而是“爱已枯竭的她日渐形成尝试爱欲行为的自虐性情绪”,这是对爱的一种模仿、一种演技。她的内心依旧如沙地般干涸,潜藏着的黑暗因子时不时冒头:“当美津子注视着无任何抵抗能力的老太婆睡着的姿态时,会突然产生某种冲动,故意不替她换尿片,不给患者该吃的药。那时,她的心里有一种声音在说:反正她吃药也好不了,不只对别人无益,对家人还造成很重的负担。这个老女人不如早点解脱”。她不再做毁灭自己的尝试,但也无法从内心深处生起对别人的关怀与爱。她还对即将去世却极度眷恋自己丈夫的矶边太太否定了转世的可能性:“要认定,死了就什么都消失了,这样会比背负着过去种种到来世生活要来得快乐。”美津子见不得矶边太太这样的深刻的爱,这样的爱与大津的信仰都会刺痛她空虚的内心。

美津子在这一阶段努力让自己融入平凡的生活之中,却徒劳无功。她依旧不知道自己在追寻的是什么,但总归踏上了追寻之路。

在行前说明会中,美津子就看到了印度查姆达女神的图像,之后旅途中又在导游江波的带领下在洞窟中看到查姆达女神的雕像;这是

一尊矛盾的女神像,疾病与疼痛压榨着这女神的生命,她却依旧从萎缩的乳房中硬挤出乳汁喂养小孩。这尊扭曲的女神像可怕却又充满着大爱。这显然与美津子之前所认知的以及天津所信仰着的完美的神的模样有着巨大的不同,但也正因为这女神混合了善与恶、残酷与慈爱,呈现一种混沌的姿态,才给美津子的追寻之路提供了新的可能。一如美津子自己所说,她来到印度,感兴趣的是这个世界“清静与污秽、神圣与猥亵、慈悲与残酷混合共存”。美津子洗刷不掉自己身上的黑暗与罪恶,但如果能如女神查姆达一样,背负着一身罪恶也能坚持自己所求,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生存方式。

在印度与天津的碰面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让美津子失落,她失望的是天津的生活处境,被教会驱逐,在这脏兮兮的地方干着脏兮兮的活计。尽管内心对女神查姆达有很大的震动,但当她真正见识到天津的模样,她完全无法接受,一度埋怨天津,为何要这样愚昧地相信着他的神导致这样的境地。天津内心反而十分安定,他在印度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所,物质条件不好但精神上有人能容纳自己,拥有相同的信仰,跟美津子说话的时候头一次开起了玩笑。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似乎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美津子不懂得宗教信仰,不懂得天津的神,她一直以来只是有种隐隐约约的直觉,“她模糊感觉到自己也希望拥有 X,一个可以让自己觉得充实的 X,可是她无法理解 X 究竟是什么”,在天津身上或许能找到自己所寻找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天津的信仰就是她的信仰。

还有一个细节,是美津子与沼田在码头附近看到贫穷残疾的人们乞讨,沼田生发出了“大家同样是人,这些人也同样是人”的同情,但美津子却读懂了沼田的同情中所带有的“我们观光客可以做些什么呢”的意味,这些廉价的同情让她不安。美津子之前一直说自己是个“爱已枯竭”的人,故而她必然是渴望唤醒自己

心中的爱的,可她又对这种浮于表面的廉价的同情嗤之以鼻,“她不需要‘装出来的爱’,只希望真正的爱”。这里就暗示了美津子追求的不只是那种寻常的爱,这种爱令人无力又显得泛滥而廉价,她渴求的是能令她心里安定的那个神秘的 X。

美津子换上纱丽,迈入了恒河沐浴。她不知道对谁祈祷。或许是对天津追随的洋葱,不,不一定只限定洋葱,或许是对某种巨大永恒的东西。

比起之前美津子在做义工工作时对爱的模仿,她这一次模仿的祈祷对她而言,意义更为重大。之前满怀恶意,却也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任何错处;这一次却连这样的模仿都能让她感到不好意思,她明白自己仍未达到足够虔心祈祷的状态,却也愿意尝试真心去做,于她而言,是一次大的改变。这一条恒河包容了各色各样的人,同时也包容了美津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恒河之中,美津子察觉到自己的一切都有了安放之所,也稍微摸索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作为小说来说,美津子的自我救赎与觉醒之路似乎在这条恒河中就迎来了一个终点,后面的故事本应该对美津子的觉悟不再产生大的影响。可事实并非如此。以往的美津子尽管内心有无数想法,面上都是矜持自控的。在天津为平息逝者家属对三条拍照的愤怒而被打受重伤时,她在小说中终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泄自己的情绪:“你真是愚蠢啊!真的太蠢了。”美津子目送被抬走的担架叫喊着:“真的太蠢了!你为了‘洋葱’虚度一生,虽说你模仿‘洋葱’,然而只有憎恨和自私的世界,不是什么都没改变吗?你到处被驱逐,最后连脖子也断了,被人用抬死人的担架抬走。你终究是无力的,不是吗?”她蹲下来,用拳头敲打石阶。

美津子为天津感到不值。虽然上一刻她的明悟才表明她将来或许会走上和天津类似的道路,但此时此刻的她毕竟还没有真正踏上这



条路。她刚刚结束了自己内心中挣扎,决定好了未来的方向,都还没有来得及巩固这个想法,就迎来现实的当头棒喝:“只有憎恨和自私的世界,不是什么都没改变吗?”个人的力量在这庞大的世界里算得了什么呢?由此可见,美津子尽管解决了内心的矛盾,但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仍待她长时间地去经历、去思考才能解决。

在小说的结尾,美津子遇到了与天津做着相同事情的修女们,又有了新的体会:“洋葱老早就死了,但是,他转生到他人内部。将近两千

年之后,转世到眼前的修女之间,转生到天津体内。像他被担架抬到医院那样,这些修女也会消失在人间之河。”

我们不好下结论说美津子只通过修女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完全理解这种信仰力量的源源不断与生生不息,这股力量是否足够强大,是否能与整个世界的憎恨与自私对抗;但无疑,她对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有了一丝丝的开解。结尾并没有明确说明天津是生是死,但无论他活着还是死去,他的信仰大概会用另一种方式存在于美津子的身上……

## 阅读,为善留下空间

◎ 蒋书丽

《朗读者》女主角汉娜在自缢身亡时,电影导演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汉娜赤脚踩在一摞书上,完成了自己的自杀行为。在这一情节上,小说中的描写显得有些过于简单和苍白,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在天色微明时分她上吊死了。”就电影这一改编来说,导演和编剧显然比原作者更懂得女主角的选择。书籍赋予了汉娜新的生命,尽管这一赋予是通过死亡来完成的,但这并非悖论。有多少文学经典名著里的死亡,赋予了人物永恒的生命!比如说于连,比如说安娜,比如说苔丝。

如果没有学会阅读,汉娜绝不会自杀。从这一角度来说,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都无关乎爱情、无关乎战争,而是关乎成长。而汉娜的成长,直至将近古稀之年,她才得以完成。或者说,学会了阅读,才标志着她完成了自我意识

的确立,才获得了灵魂。而她的成长,是从遇到中学生米夏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夏实际上是汉娜的精神引路人。这种精神上的引导,从二者结识开始,直至汉娜自己学会阅读为止。

中年女性汉娜和中学生米夏的结识,纯属偶然。放学途中发病的米夏碰巧走到了汉娜的楼下,而汉娜帮助了米夏。情窦初开的青春期男孩和独守空房的中年女性汉娜就这样发生了一段不伦之恋。而贯穿于他们恋爱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则是米夏给汉娜朗读经典文学名著,汉娜甚至给米夏定下了规矩:“先朗读,再做爱。”

但毫无征兆的,汉娜不辞而别。因为她即将升职——从电车售票员到司机,而她不识字,只能一走了之,没有告别,没有留恋。而当

米夏再次遇见汉娜时,却是在法庭上,一个是法学专业大学生,一个是阶下囚。而通过法庭审判,米夏才对汉娜的过去有所了解。原来,汉娜曾是纳粹时期集中营的看守,而对于自己的职责,汉娜可谓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唯一不同之处是,她经常会挑选小姑娘给她阅读,直到最后不得已才将小姑娘送走(送到毒气室或焚尸炉)。而她站上被告席的原因,则是在转移所谓囚犯的过程中,夜宿的教堂突发大火,为了保持她所谓的秩序,看守们选择宁可让这些所谓囚徒活活烧死,而不是打开教堂大门放她们一条生路。

对于汉娜来说,听从命令、坚守职责和维护秩序比生命更重要,就这一点来说,汉娜身上恰恰也体现出一种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有意思的是,在米夏为汉娜整理遗物时,的确有那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描写集中营幸存者的书,还有赫斯的罪行录和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判处绞刑的报告,以及一些有关集中营的学术文献,全都摆在一起”。由此不难相信,法庭审判并不足以让汉娜对自己的罪行有深刻的认识,恰是阅读,让她对自己在纳粹横行期间的行为产生了愧疚和赎罪的意识,这才有了将自己的积蓄送给教堂大火幸存者的一幕。

很显然,汉娜的生命中存在着严重的缺失,那就是对生命的敬重。而这种缺失,与她生活中的缺失密不可分。无论在小说还是电影中,汉娜都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更可怕的是,她不识字。在她的生命中,唯一与她发生过紧密联系的就是中学生米夏。对于她的出生和成长背景,读者和观众不难揣测,那一定是一个缺少爱和关怀的所在。也因此,她在与米夏的交往中,才显得格外地生硬,她的情感世界里几乎是一片荒芜。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成年人,一字不识,这一缺陷将她与外在隔绝开来,使她既不能融入现代社

会,更不能融入他人的情感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不识字,不会阅读,让她的内心世界单一而幽暗,这也可以理解她何以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被大火吞噬。

其实,对于自己与米夏之间的距离,汉娜内心是非常清楚的。小说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是,借助家人外出度假的空隙,米夏带汉娜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也是一个大学哲学教授的家中,米夏敏锐地感觉到了“她感到在我家是个闯入者”。这种格格不入的闯入者身份在汉娜进入米夏父亲的书房时显得格外明显,“只见她的目光扫在每一排齐着天花板的书架上,就像是在翻阅书页一样。然后,她走到一排书架前面,把右手的食指举得齐胸那么高,轻轻地划过书脊,接着又走到第二排书架前,仍旧用食指划过书脊,就这样,书脊联翩着书脊,她划着划着,穿过了整间书房”。这一场景遗憾地在电影中消失了。小说作者把这一幕当作关于汉娜不多的几次写照留存在记忆深处,而这一场景把汉娜对于书籍、对于自由阅读的渴慕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次偶然的事件,也让米夏看到了汉娜的另一面。在两人出游的一天早晨,米夏给汉娜留了字条就出去了,而回来时,汉娜发疯似的拿皮带抽了米夏,并放声大哭起来。读者很清楚,汉娜因为看不懂米夏留的字条而懊恼、窘迫、愤怒、羞愧,这些情绪使得她丧失了理智。而米夏也是束手无策,因为“在家里没人会嚎啕大哭,在家里没人会用皮带抽人,连打人都不会,更别说是用一根皮带。在家里我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可是,现在让我说声什么好呢?”这是一次野蛮和文明的短暂相接。从汉娜这一行为中,读者也不难理解,后来在纳粹集中营工作的汉娜何以如此冷漠。

米夏和汉娜显然属于不同的世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不过是一种肉体关系。但即便是一种肉体关系,对于米夏也还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定了他今后的两性关系是以失败告

终。而在法庭上不能公开汉娜不识字的真相，更让他产生深深的无力感和愧疚感，而为汉娜朗读成为米夏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有过这样一句话：“只有深入、不间断的阅读才能充分地确立并增强自主的自我。除非你变成你自己，否则你又怎会有益于别人呢？”这句话仿佛就是说给汉娜听的。的确，汉娜只有在最后学会了阅读，才成为她自己，而在那之前，她只是一具躯壳。而名为《朗读者》的电影和小说，其实际所指却是从聆听者向阅读者的一次华丽蜕变。抑或，原著和电影本该被翻译成“读者”，故事表层的朗读者无疑是米夏，而真正的阅读者实际上是汉娜。对于受过系统人文主义教育的米夏来说，阅读是他生活和学业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对于汉娜却不是，那是她付出了半生的时光才掌握的技能。也因此，学会阅读是她生命中的一次质的飞跃，为她荒芜的生命底色里增添了一丝生机。

一个细节再次证明了电影改编对于小说原著的超越。无论是荷马的《奥德赛》，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者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都不过体现的是米夏的课业安排，或者是作为文学经典的代表出现。但电影中出现的——一篇契诃夫的小说《带小狗的女人》，却是别有深意。一方面，汉娜从听了这篇小说后，开始根据录音和书籍对照着学习单词，迈开了她学习和识字的第一步，也是她确认自己的第一步，也是她走向死亡（同时也是新生）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契诃夫的这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让汉娜学会了什么是爱情。电影里对契诃夫这篇小说的反复强调，其隐喻之意十分明显。小说《带小狗的女人》，原本讲的是两个萍水相逢的中年男女诸多艳遇中的一次而已，不想当他们在莫斯科某剧院里再次相遇，却发现彼此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作爱情的情愫。回头看汉娜和米夏当年的相恋，他们彼此肉体

的迷恋明显多于思想情感的交流，而这样一种交流，实际上是由朗读和聆听来完成的。

可以说，作为汉娜的精神导师，米夏是通过朗读带领汉娜完成了精神上的成长；而汉娜作为米夏身体欲望的对象，从肉体上引领着米夏从少年转变为男人。也从此，汉娜的气味、汉娜健壮的肉体横亘在米夏与其他女性之间，注定了他的婚姻生活的不幸。而汉娜，当她看到米夏从她手中抽回自己的手，并问她对自己的过去（纳粹时期）怎么看时，汉娜明白了，她和米夏之间永远结束了，而米夏是她在这个世间唯一的留恋。死亡，于她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小说或者电影来说，也是最恰当的结局。

无论是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还是大学法学教授、法官的身份，作者本哈德·施林克都赋予了该小说极强的真实性，加上他返璞归真的写作风格和独特的两性关系，更使得小说耐人寻味，使得它超越了一般的两性书写——如《洛丽塔》之流，也超越了大多数关于二战的文学叙事，这里集中营、纳粹等被简化为法庭上的一种陈述。这样的作品，成为畅销全球之作，实在是不足为奇。而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斩获奥斯卡金像奖，女演员凯特·温丝莱特也因此获封影后，一切都是皆大欢喜。

一位评论家曾这样评价过该小说：“人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为了找出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古今中外，数不清的大文学家为人类社会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文学经典名著，但却依然阻挡不了有那么多愚昧、愚蠢的家伙将战争、灾难带给人类。可是，倘若没有书籍，没有阅读，这个世界岂不是会更糟糕？也许还是哈罗德·布鲁姆说的对：“我们如何读和为什么读：在你的生命中保持警惕，了解和认识善的可能性，帮助它忍耐，给它空间。”

是这样的，阅读是为了在人世间给善留下空间。

## 置身于喧嚣与孤独之中

——读刘克敌新著《民国学风》

◎ 苏 翔

刘克敌近年来一直关注民国的文人,特别是他所熟悉的浙籍文人群体。他对文人日常生活的解读不仅细致入微,而且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一个个生活细节和生活场景中,让我们看到那些大师深邃的内心世界。我拿到刘克敌的新著《民国学风》(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时,自然感到惊喜。

最引起我关注的,是书中有关文人日常生活对于其人格完整性影响的内容。早些年,刘克敌就有《困窘的潇洒》、《民国杭州文人日常生活》等研究文人日常生活的著作,因为后者是与我合著,我对日常生活对于文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也比较清楚,而此书的内容更进一步深化完整,尤其是像《文人领袖蔡元培的“朋友圈”》这样的文章不仅让蔡元培的形象更加立体、更加富有人文气息,也让读者对浙籍文人群体何以能在那个时代大放光彩有了更加具体的把握,对同乡、同门和同窗等关系如何影响文人的治学和创作,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该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或者郑孝胥和黄侃,这些政治见解迥然不同、文学观念大有分歧的文人,在刘克敌笔下却都呈现出极为生动、可爱的一面。当我们读到梅光迪多少为了逞个人意气,和胡适笔战不休,以致最终走上反对白话诗的道路时,我们

不禁发出会意的微笑。尽管很难想象梅光迪是否会和胡适携手并进,但他当年毕竟同意来一场“文学革命”,只是阴差阳错,才最后走到胡适的对立面。通过该书对胡适与梅光迪两人争论的辨析,我们会发现以往文学史的有关书写过于简单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克敌的有关研究极大丰富了现有的文学史,或者说是另一种文学史的书写。

所谓的文人气质,常常是可以想象却很难描述,而阅读民国时代这些大师,似乎让读者有了触摸他们的可能。在刘克敌笔下,那些大师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似乎都清晰可见。他们不再是被人顶礼膜拜的大师,而是无数普普通通人中的一员,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诸如通过周氏兄弟对《语丝》这个刊物名字来历的有意为之的不同叙述,我们分明看到了他们脸上有些狡黠的微笑,看来这“绍兴师爷”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而顾颉刚在日记中极力为自己的“命名权”正名,也恰恰说明了他性格的固执、倔强和可爱。所以,一个人的气质不仅藏于他所读过的书籍中,也可以藏在他所研究着的人文历史学术中,也就是可以做到和他研究的对象心灵相通。阅读此书,当我们执着于一次次跨越时空的选择时,那些文字仿佛都成为彰显心灵的旗帜,都可以清晰辨认。记得当年梁漱溟发出一个著名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对

此当然会有不同的回答,而刘克敌以自身一直坚守学术的态度做出他的回答,也让我相信,“这个时代一切都有可能改变,而学人之间的友谊和坚持‘为学术而学术’的信念,不会改变”。用暴力可以摧毁世界本来的样子,但是不能改变内在精神的本质。所谓延续,需要依靠一辈又一辈人的研究来将它守护,而这书的内容本就已是一种延续。精英知识分子与俗世大众的争辩,就像许知远与李诞只能格格不入,但我们必须去相信,这个世界该有一小群人愿意冷坐在一隅之地读鲁迅,读梁漱溟,读陈寅恪,读马一浮,读他们那一时代的冷暖人情,读中西文化交融时代的宏大过渡与细枝末节。读着他们,其实就是读着自己,否则,谁能想到黑白刚硬色调的鲁迅为了让名气不如自己的丰子恺的译本《苦闷的象征》销路顺畅,让出版社将自己的同名译本推迟上市,原来鲁迅还有心思如此柔软细腻的一面。而我们反观当下反思自己,某些知识分子看似阔达的胸襟是否能在镜子里照出坦荡的自己。

这个时代太过喧嚣,精致浮华,年轻人是否还愿意写诗?是否还愿意为一句诗的纯粹而雀跃一个夏天?起风了,裹紧了大衣将耳朵蜷缩在摇篮的歌声里,年轻的心都忘却了冷冻的记忆,忘却了历史需要旁听。作家阿来说:“文学最悲惨的是我们在写这些现实的时候,我们也完全堕入了现实。”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我们个人生活以外的世界,那么至少,我们必定散失掉了辨认自己生活真相的能力。而民国文人的禀赋和他们的气度是在更高的高处对真的渴求,所以他们才一往无前,甚至交出一生。很多时候,要说出一句真话是需要勇气的,至少名利场里不允许。当有的时候甚至只能保持沉默时,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我们还在坚持什么,再看看过去的学术大师他们在坚持什么,也许会明白,对于真善美的取舍,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人们常说如今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只有怀念和追忆的时代,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悲观。其实,只要给予合适的土壤,假以时日,真正的大师自然会出现。

## 说王维《观猎》

◎ 黄天骥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被称为“诗佛”的王维,酷爱写山水田园

诗,诗歌的总体风格是空灵静逸的。但是,有些诗则写得气势飞动,豪气逼人,颇能体现天宝初期社会局面具有的生气勃勃的一面。

王维和盛唐时期许多诗人一样,既在当时的首都长安当官,又常被派往边疆,参与一些文职工作,熟识军旅生活。特别在青年时期,即使深受佛教思想影响,也有建功立业的劲头。

他常和一些游侠少年交往，写过《少年行》四首，说自己和他们意气相投，“系马高楼垂柳边”，痛饮新丰的美酒，赞美他们精于骑射左右开弓，“偏坐金鞍调白羽”，“一身能擘两雕弧”。他还认识一些老将军，说他们：“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教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这些诗，写得意气干云，也充分表现出王维豪情勃勃的心态。对在战场勇敢杀敌的战士，王维是衷心地赞美的。例如在《燕支行》中他写道：“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踏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特别是对那些曾被弃而不用老将，在外敌侵扰时，王维便赞美他们挺身而出，说他们：“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观猎》这首诗，应是王维早期的作品，据有些版本，诗题作《猎骑》。我没有机会看到这种版本，不知道它是否最早出现。但从整首诗意看，题目作“观猎”，显得更为确切。因为这首诗不是描写一般的打猎队伍，也不是写诗人也参加了打猎活动，它明明说“将军猎渭城”。王维当然不是将军，他只是作为旁观者，观看将军的打猎活动，从中抒发情感，八句诗全是写观察所得。因此，无论如何，这诗以“观猎”为题，应该是合适的。

诗的第一句“风劲角弓鸣”。角弓，是以动物的角作为弓梢装饰的硬弓。“角弓鸣”，是指弓弦颤动，发出嗡嗡的声响。为什么从弓弦会鸣响？是由于“风劲”。这风不是指冬末吹过来的寒风，因为风吹过来无论如何猛烈，弓弦也不可能鸣响。显然，这“风”只能是箭射出去时，其疾如风而带出的劲风。射猎者臂力愈大，箭速愈快，势挟风雷，弓弦猛烈震动，便发出嘭然响亮的声音。这一句，正是诗人写他在猎场上看到将军弯弓射箭狩猎的雄姿。后来，宋代词人辛弃疾不是也有“弓如霹雳弦惊”的描写吗？其意味也与此相似。

紧接着，诗的第二句才说“将军猎渭城”。原来，这让人震惊的一箭，是将军在猎场上猛力射出。按一般的写法，应是先让将军出场，然后再描述他狩猎的姿态。王维恰恰相反，先以强弓劲弩的声音表现狩猎者的威武，然后才说明这是将军在渭城一带打猎。这奇兀的艺术手法让读者猛然一惊，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方东树认为，这起句“直疑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艳”（《昭昧詹言》）。沈德潜也指出：“起二句若倒转，便是凡笔，胜人处全在突兀也！”（《唐诗别裁》）其实，为了强调某种特定的情景，把叙述方式前后倒转，也是王维惯用的手段。像在他另一篇著名的五律《使至塞上》里，起首两句是：“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当时，王维被任命为“典属国”的小官，朝廷让他到属国居延慰问边疆将士。为了强调他轻车简从，也把叙述的前后句子倒转过来，先强调他是以“单车”出发，再说要到边远的地方，便为后面表现荒漠的景色和落拓的心情做出铺垫，这就有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名句。可见，在诗句中叙述过程的倒置，如果运用得好，确能收到首先让观者抖然一惊、精神一振的艺术效果。

《观猎》的第三句“草枯鹰眼疾”，实际上是紧接着第一句，写将军弯弓放箭，命中了猎物的情景。当时，狩猎者多带着猎鹰出猎。那鹞鹰，站在猎者的臂弯上，威风凛凛。到猎场上，猎手放出猎鹰，让它在天上盘旋。当发现猎物，鹞鹰便飞速从天而降，把猎物一口叼住。在冬末，草已枯黄，低伏于地，狐、兔、麋、鹿之类动物没有野草的掩护，鹞鹰居高临下，更容易发现目标。于是兔起鹞落，将军放箭，命中猎物；鹞鹰眼快，疾扑而下。在这里，王维用“鹰眼疾”来形容鹞鹰的迅猛，是颇费斟酌的。按理，形容鹰眼，说它的锐利，不更准确一些吗？但这一来，便失去快速扑下的意味。王维选用“疾”字，这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同时，用“疾”字，也让读者感受到诗歌节奏

的快速。

第四句“雪尽马蹄轻”。冬之末，残雪尽消，马蹄没有障碍，便能轻快地奔跑。王维选用“轻”字来形容马的奔驰，同样是有考究的。这说明，猎手驾马，不是狂奔追逐，因为猎物唾手已得，他便心安理得。何况地面清爽，没有莽藤野草绊蹄的问题，马儿便可轻快地前进。而马蹄的轻快，实际上是出猎者愉悦心情的写照，也是作为观猎者的诗人感受狩猎之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诗词中“炼字”的重要性。所谓炼字，亦即选择最合适的字来表达情与景，这需要作者具有驾驭文字的非凡能力。

这首诗的第三句和第四句作为颌联相对成文的十个字，已经写尽诗人在猎场上观看的景象。但作者并没有把狩猎的全景铺开，他只写鹞鹰发现猎物，以及跃马捡取猎物的两个细节，便概括了狩猎的全过程。而其中，又只突出鹰眼之疾以及马蹄之轻两个细部，却能表达出狩猎者和观猎者那种紧张而又愉悦的心态。叶羲昂在《唐诗直解》中认为：“‘草枯’二句同是奇语。”说它奇，是谁也想不到用细节描写中的两个细部，竟能概括了整个狩猎的全貌。叶羲昂还说，这两句“上句险，下句秀”。确实，上句写草色枯黄，凶猛的鹰疾扑过来，态势奇险；下句写残雪尽消，矫健的骏马轻快奔驰，遣词俊美。这两句相互连接，一险一秀，相得益彰。叶羲昂的评价也很能道出这首诗的韵味。而在诗句中，将军作为狩猎的主角，作者并没有给予正面的描写，只从侧面突出他所放出的鹞鹰，以及他所驾驭的骏马，也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了将军英武的姿态。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这颈联和颌联紧紧连接，诗人立即写狩猎的队伍踏上了归途。在这描述将军率队回营的两句中，王维选用了“新丰市”和“细柳营”两个名词是颇有深意的。新丰市盛产美酒，王维不就说过“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吗？古人多以能饮表示豪气，选择新丰作为将军回营的路线，其

中包含着对猎者气概豪迈的展现。细柳营是汉代名将周亚夫驻军的地方，周亚夫以治军有方和纪律严明著称。王维说这出猎的将军还归细柳，等于把他比喻为周亚夫，采用这一典故是隐喻地表示对出猎将领的歌颂。

请注意这首诗的节奏，王维安排非常奇特。他不是写观猎吗？这就应该稍为全面地描述将士狩猎的全景或全过程。其实，在狩猎的场景中，有许多情景是可以细致描写的，像猎者如何披挂？如何埋伏？如何侦察？猎场景色如何壮观？猎者如何神勇等，都可以铺排展示。在唐代，狩猎之风颇盛，这是检阅军容和武力锻炼的大好机会。因此，不少诗人也以此作为创作的题材。像张祜也写过观看狩猎的场面，我们不妨先看看他是怎样写的：“晓出郡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箭，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观徐州李司空猎》）

张祜的诗写到观猎的方方面面，也不能说它写得不好，但有面面俱到之嫌，没有特色可言。王维就不同了，他只选择了几个狩猎的细节：将军放箭，猎鹰追捕，骏马奔驰。这几个动态性的细节都有快速递进的特点，就如电影中接连出现几个“蒙太奇”镜头，给人以节奏飞快的感觉。紧接着，第五、六两句就写打猎的返程，王维用的是“忽过”、“还归”两词相互连接，灵动飘忽，更给人以马快如飞迅速归营的感觉。其实，且不算猎场和新丰市的距离，就从新丰市到细柳而论，也有七十多里。显然，王维选择闪电般的动作细节和飞快的节奏，这支狩猎队伍神速以及将军英武的形象，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颌联和颈联的意象又紧密连接，才说发现猎物，便说跃马凯旋；才说忽过新丰，便说回归细柳。这叠进式的运动和快速的节奏，如同飞流奔泻，山岩坠石，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

所谓“气势”，《淮南子·兵略训》中说：“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

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其实,行兵如此,行文运笔何尝不是如此。方东树说:“诗文以豪宕奇伟,有气势为上。”(《昭昧詹言》)王维在这诗的首句,写箭风如霹雳;跟着两联,则气如飘风,把他观看到将军狩猎全过程的气势展现得畅快淋漓。

然而意想不到的,在诗的最后两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诗人竟让诗的意象和节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射雕处”泛指打猎的地方,雕是比鹰体型更大的猛禽。王维的出塞诗也提到了射雕,如“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不过在《观猎》中,他使用“射雕”这词还有更深的意味。据《北史》称,斛律光“尝从文襄于洹桥校猎,云表见一大鸟,射之,正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雕也。丞相属邢子高叹曰:‘此射雕手也!’当时号称落雕都督”。在这里,王维分明是使用了与斛律光有关的典故。若就全诗看,前面已经提及“草枯鹰眼疾”,那将军捕获的显然是地面上的动物;他射的,更不是比猎鹰体积还大的空中之雕。这些王维无暇顾及,因为他在诗中之所以运用斛律光的典故,实际上是暗喻出猎的将军有如斛律光般的神勇。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王维是怎样处理他所看到将军猎后回营的情景了。他写那将军没有表现得兴高采烈,他率领的队伍也不是欢呼喧嚣,而是将军勒转马头,回首眺望,他纵目云山,只见在白天狩猎的远处,千里暮云躺在天边,平平静静,这无言的气定神闲的举动,显得很沉着、很自信,那将军悠然自得、豪情满怀的神情也跃然纸上。

从诗的节奏看,这最后的两句和前边的几句明显不同。前边节奏急促,后两句倒是写将军停了下来,眺望远方,注视着千里暮云的状态。这动作的节奏明显是缓慢舒徐的,诗句呈示意味也显得细腻悠长。如果说,《观猎》的首句和两联的节奏快速进行的时候,那么结尾的两句节奏忽然缓慢了下来,这快与慢节奏变

化,起伏跌宕,意味深长。也可以说,前边的六句既极写猎手英武矫健的英武之姿,更重要的是它那节奏的快速,正好衬托出结句节奏的缓慢,从而突出表现将军在返回营地时一刹那的神情。他勒马回缰,遥看“千里暮云平”的景色,那“回看射雕处”的姿态,恰切地表现出他的威武和豪气。

按说,将军在白天的“射雕处”,离军营顶多不过是百里之遥吧!但诗人写将军的目光竟放到千里的远方,那已经是西域甚至更遥远的边疆了。将军看到的是暮云平展,态势安定,一片祥和;他的心境也从狩猎的过程中,知道将士用命,势如飞虎,所以意气昂扬,信心十足。特别是诗人在“暮云”后着一“平”字,这在夜色中风定云平的图景,既是表达出边境安宁的景象,是将军回首眺望时心理状态的呈示。当然,这也是王维对唐朝军事力量充满信心的感受。试想,如果把“暮云平”写为“暮云生”或“暮云横”,虽然同样是押庚韵,但景象和意味完全不同了。周珏的《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提到:“结(句)见非疆域宁靖曷得此举?闲淡超逸,机圆气足。”他又引唐仲言的话说:“结谓边疆宴然,无复有射雕者”,“岂开元全盛之时乎?”可见,懂得王维心意的人,是明白《观猎》结句所要抒发的意韵的。

王维的《观猎》写的是作为旁观者看到将军狩猎的场景。如果以电影的手法表现,那么前面几句,则是几个连续快速出现的蒙太奇镜头;最后一句“千里暮云平”,则是在天空出现一条横线的“空镜头”。以简单的构图,抒发复杂的意绪,是王维惯用的艺术手段。像上面提到的《使至塞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据杜佑的《通典》称:古代守边规矩,若平安无事,便点起狼烟一堆;若有事态发生,则点起两堆。大漠孤烟是平安无事的意思。在广阔无垠的平面中,一缕黑烟冲天直上。而在天边,长河横躺,圆形的落日悠悠西下。于是,平面上的直线,横纹上的圆形,简练明快的线条组合



在一起,确能表现塞外无比壮阔而又无比单调的景象。但是,也许人们没有注意,这两句所呈现的景色和王维的心情是密切联系着的。这首诗的首句是:“单车欲问边。”作为低级的钦差,只能是单车出塞;面对着归雁南返,自己却孤孤单单;面对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不禁勾起落寞的感触。所以,王维对景色的勾勒渗透着作为审美主体的情感。在《观猎》一诗中,王维也以同样的艺术手法,写那远方天际,出现一条平稳的云彩。这景色,不也是他对边疆的局势颇为欣悦的心情写照吗?

无独有偶,和王维处于同一时代的著名诗人王昌龄,也写了一首有关狩猎的七绝,连题目也是《观猎》。且录如下:“角鹰初下秋草稀,铁骢抛鞚去如飞。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王昌龄这首诗,题材和王维的《观猎》一样,但是水平就不一样了。王昌龄也写到观猎的情景,写到角鹰秋草,写到快马如飞,写到少年猎手的得意,但只是平铺直叙,格局不大。和王维的《观猎》相比,不是同一个档次。这一点,相信读者自能分辨。

## 魏延的悲剧

◎ 赵映林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以部曲追随刘备。“部曲”是指东汉后期,一些豪强或带兵之人可以自己招收失地农民(古时称“流民”)或无业的壮丁编入自己所组建的军队中的这类人。部曲与主人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带有半奴隶性质。魏延即是部曲出身,他出身低微却因作战勇猛“数有战功”升任牙门将军。刘备进位汉中王时,正是击败曹军,斩首夏侯渊,取得汉中不久之际。汉中地区北进可取曹魏的富庶之地——八百里秦川,南则守住蜀地大门,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对蜀汉来说,荆州与汉中是益州(四川)的两翼,而汉中乃是益州北大门,地位极为重要,派谁去守?当时关羽在荆州,不能离开。大家议论纷纷,皆以为镇守汉中的必定是张飞无疑。然而,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刘备却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由此可见魏延在刘备

心目中的地位。当时刘备做此决定时,特意当着千将领之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可谓豪气干云。蜀国建立时,魏延官拜镇北将军,继续担负镇守蜀汉北大门的重任,地位仅次于关羽、张飞、马超、赵云等蜀国大将。后来,刘备又加封他为都亭侯,以奖其御守汉中之功。诸葛亮北伐时,魏延负责督前领部军马,一直担任军事重职。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就是后主。后主建兴六年(228)初,诸葛亮首次北伐,以完成刘备未竟的兴汉大业。不过此时的蜀国远非刘备在时的景象: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刘备军中最骁勇善战的五名将领中,黄忠、马超、关羽、张飞先后亡去,硕果仅存的是

上了年纪的赵云,而且次年也去世了。此时能够驰骋沙场的大将,首推骁勇善战的魏延。诸葛亮首次北伐即命魏延为丞相司马兼凉州刺史,督前部军马。北伐中,魏延可圈可点的事迹不少,如建兴八年(230)诸葛亮第四次北伐,魏延奉命入羌中(今甘肃临夏自治州一带),与曹魏军大战。由于魏延平日善待士兵,军士听命,自己又作战勇猛无比,身先士卒,遂大败曹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后主刘禅下诏拜魏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以表其功。

魏延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其中最值一提的是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魏延的奇谋。当时镇守长安关中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夏侯楙实乃一庸才,既无武略又喜蓄妾,终日沉浸在酒色之中,只是因其身份特殊而为镇守一方的大员。针对这种情况,魏延献计于诸葛亮,说夏侯楙因是曹操之婿才为镇守,此人胆怯无谋。请丞相准许他率兵五千,带足五千人的粮草,从褒中(今陕西褒城)出兵,循秦而东,经子午谷向北,不过十天就可到长安,夏侯楙听到他带大军杀到,一定弃城而逃。长安守备不足为拒,这一带又有足够的粮食可供蜀军,而公率主力出斜谷(属今陕西眉县),会师长安。待到魏国从东边调兵来救时,已控制了咸阳以西的地方,如此一举可定矣。由于诸葛亮用兵一贯谨慎,认为魏延之策乃是孤军深入的“危计”,太冒险了,不如走坦道,稳扎稳打出祁山、收取陇西来得安全,拒绝了魏延之计。

要弄清魏延与诸葛亮各自计划的优劣,必须了解当时的地理情况。那时蜀汉与曹魏的边界,主要是在秦岭的中间这一段。秦岭以北是曹魏的关中地区,秦岭以南是蜀汉的汉中地区。秦岭呈东西走向,中间绵延数百里的这一段,从南向北穿越秦岭一共有四条路可走,由东向西分别是子午道、骆谷道、褒斜道和陈仓古道。前三条道路都非常狭窄、崎岖艰险,只有西边的陈仓古道相对平坦。秦亡后刘邦出汉中

与项羽争夺天下走的就是这条道,即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诸葛亮比刘邦更谨慎,这四条道他都没选,而是选了更西的祁山。所以,小说《三国演义》专门大篇幅描写了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上是五次北伐,另一次是魏国伐蜀,北伐也只有两次出祁山)。从地图上看,除子午谷外,任何一条道离长安直线距离短者近八百里,远者近千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这条道,重要原因就是避开曹魏的重兵抵抗,还可控制陇西,解除北伐的旁顾之忧。

诸葛亮出兵祁山先占陇西,出陇西向东即到关中。按魏延的计划先攻取关中,形成与汉中一东一南夹击陇西之势,陇西成孤地,必定归附蜀汉,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样解除了北伐的西顾之忧。如先取陇西,因陇西与关中地区联系便利,蜀汉要守住这一地区是很难的。诸葛亮五次北伐中,两出祁山,占据陇西,都因交通不便、粮草接济不上,又不得不忍痛放弃。从战略上看,蜀汉北伐,应是先夺取关中地区而非陇西。由此可见,魏延领奇兵出子午谷攻占长安的计划,是奇谋良计。诸葛亮出于谨慎未用魏延之计,丧失了唯一的一次大好时机。说是唯一的,是此后魏明帝迅速撤换了无能的夏侯楙,改由大将曹真镇守关陇,加强了对关陇地区的防御,曹真之后是司马懿。司马懿抗蜀,其策略之一就是紧守关陇地区,加强对关陇地区的防御。从此,蜀汉再也没有了夺取关中地区的良机,更不用说逼近,形成对长安的威胁了。诸葛亮五次北伐中两出祁山终未能实现《隆中对》中所定之这一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他的对手司马懿在敬佩他是“天下奇才”时,也说诸葛亮“虑多决少”。诸葛亮的过度小心谨慎,不敢大胆用奇,终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魏延有勇有谋,是蜀汉中期不可多得的将才、帅才。遗憾的是他最后却是屈死的,更令人叹息。《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那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魏延被杀可说是三国时期

的一大冤案。诸葛亮北伐首出祁山,他献计于前,不为诸葛亮所接受,当时就很不以为然,愤懑不平,“以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仍以魏延督前部军马。后来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前线,随即魏延就被杀。诸葛亮在世时已看出埋藏的一文一武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文”是丞相长史杨仪,武就是魏延。魏延在蜀汉五位名将歿后,其性格中高傲自负一面愈加为甚。绝大多数同僚容让他,唯有长史杨仪不买他账,两人不时发生冲突,有一次魏延竟然持刀威胁杨仪。这的确过火,杨仪又气又怕,以至于“泣涕横集”。杨仪有萧何之才,长于行政管理,善于筹集粮饷。刘备与他谈论治国之道,非常欣赏。诸葛亮北伐,杨仪在后方调度军队井井有条,筹集粮饷从不耽误,很让诸葛亮省心。杨仪有才干,做事敏捷,却是一个气量狭小、不善于与人相处、亦不能容人的人。他受刘备信任,被提拔做了尚书,没多久就与尚书令刘巴发生冲突,无法共事,且错在他,受到降职处分,贬为弘农代理太守。诸葛亮北伐,起用他为相府长史,予以信任,用其所长,负责北伐后勤事宜。对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那时连远据长江下游的孙权都在冷眼旁观,所以诸葛亮很是头痛,常恨二人之间不协调。幸亏费祋时时从中调停,即使如此,最终还是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极端的的地步。诸葛亮临死之前,担心这两个人会起冲突而影响撤军安全,所以在病危时,特地做了安排。他将长史杨仪、司马费祋、护军姜维等人召至帐内商定自己死后退军计划,“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诸葛亮死后,杨仪等秘不发表,并让费祋去探听魏延的意思。魏延说,丞相虽然死了,他还在。魏延是既不满诸葛亮一死北伐就中断,更不满让其断后,听令于杨仪。费祋此时此刻无论如何也不能批评魏延不听丞相遗令,以免激怒他,便虚与委蛇得以脱身,回到大营将情况通告。杨仪于是按照既定计划引军次第向成

都退去。

魏延得到消息后,恼怒失去理智,立即率军向南急驰,并烧毁沿途阁道。杨仪知道魏延南撤,就立即派人飞檄成都说魏延谋反,而魏延也上表指控杨仪叛逆,并先率军到了南谷口,拦住杨仪大军。杨仪命王平前御魏延,王平谴责魏延在丞相尸骨未寒之际就敢如此!魏延所率是北伐先遣部队,人数不多,经王平一呵斥,众士兵都认为是魏延理屈,不肯为之战,四处溃散,魏延仅和儿子等少数几个人逃离。杨仪下令追击,魏延在大军围困中被马岱斩于马下。杨仪恶狠狠地踩着魏延首级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随后,杨仪又夷魏延三族,而反叛的罪名也随之加诸魏延头上。杀了魏延,从此以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罗贯中创作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没有采用《三国志》的史料,而是采用了民间传说,从此以后,魏延叛汉降魏的帽子就戴在了头上而广泛流传,为后人所知。陈寿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对此说得很清楚,魏延此举是要除掉杨仪而非叛汉降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

杨仪虽然除掉了魏延,解了心头号之恨,但并没有受到重用。诸葛亮用杨仪,是用其所长,对杨仪的心胸狭隘不能容人的性格,诸葛亮是很清楚的,明白杨仪绝不是能担当辅政大臣的料。对杨仪,诸葛亮倒是有后世唐太宗所说的“用人如用器”,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其长。所以,诸葛亮安排的继承人是蒋琬,蒋琬之后是费祋。

蒋琬继诸葛亮之后辅政,杨仪十分不满,他觉得自己出仕比蒋琬早,现居蒋琬之下,心中不平,于是对费祋说:“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这叫不打自招,诬魏延叛汉降魏,却是自己反有此意。牢骚太盛的杨仪先是被废为平民,流放汉嘉郡(今四川名山县北),但不自省,上书诽谤朝廷而下狱,自杀身亡。

# 独立苍茫意难平

——读《亦云回忆》有感

◎ 王澄霞

沈亦云女士六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亦云回忆》，为之作序者皆声名赫赫，如蒋介石、胡适、张群和张公权等，无一不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局中人和见证者，有的甚至主演和导演，这也足见这部《亦云回忆》的分量和影响。

亦云何许人？作者简介一栏这样介绍：沈亦云（1894—1971），黄郛之妻，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嘉兴。原名性真，后改署景英，字亦云。1906年，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后到苏州景海女学读英文。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战期间，在沪创办南屏女子中学。1950年后定居美国，1971年逝世于美国纽约。

值得一提的是，“亦云”一名，系中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师首任监督兼主持傅增湘先生所取，“他用景慕沈云英之意，给我取‘亦云’二字。抗战时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这里的沈云英（1624—1660）系随父征战的明朝女将，浙江萧山人，其文武全才的巾帼英雄，同乡晚辈秋瑾女杰曾以“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相歌颂。由沈性真而沈亦云，这也可见作者本人的志向和抱负。

沈亦云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共同孕育下的卓绝女性，二十世纪罕有其匹。她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温良贤淑，又有男性的侠肝义胆；既是深受欧风美雨洗礼的时代女性，又以“天理良心”、“心安理得”为修身尺度；既能搦管

救国，功成弗居，偕隐山林而自足，又能任劳任怨历艰险，与丈夫荣辱与共，生死相随；既淡泊名利，仗义疏财，义无反顾地捐献其“唯一的住宅，并其中所有值钱之物”，以示抗战决心；又珍视名节，倾尽毕生所能，誓将亡夫生前“心迹之苦、行事之难，而不为世人所共谅”赍志而歿的屈辱悲辛，向后人向时代和盘托出。她有决断有识见更兼史才，历十年践行诺言完成《黄膺白先生家传》，逾廿年又写就上、下两卷的《亦云回忆》。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为之惊叹“少年喜得忘年友，续史才惊读史人”。亦云女士几乎汇集男、女两性全部的优秀品质于一身，历史上任何一个淑女、才女、烈女，抑或任何一个君子、才子、侠士，几乎难可比拼。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甲午战争年间出生的亦云女士，即使用当代女性的标准来评价，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难以望其项背。中国妇联所倡导的女性“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早在沈亦云身上就已得到充分体现，而今日之当代女性，不少人对于这样的目标却还有很大的差距。

—

沈姓为嘉兴故家。亦云之父沈秉钧1902年中举，以教读为业，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曾独立校印《资治通鉴》，乃《辞源》初版的编辑

之一。父亲教育子女首重“勿说谎”，故为她取名“性真”，释其意为“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常提醒她待人处世要责己重、责人轻，否则为人太刻薄，于怨道有亏。母亲葛氏亦系当地望族出身，平时极力助人，“尽量为人”，屡次受挫而能热情如故，“对儿女小气与小看人，她责之最严”。父母鼓励子女读新书做新人，对女儿之事为辛亥奔走募捐毫不阻拦，只是建议审慎行事，郑重嘱咐勿经手款项。亦云自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良师益友，首推自己的父母。

亦云曾“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之歌词而奋发”，为辛亥伟业竭尽绵薄。当时上海出现了各种女子军事团体，如林宗雪组建的女子国民军，陈婉衍统领的女子北伐光复军，唐群英筹建的女子北伐队和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等。亦云发起组织的“女子军事团”乃其中之一：“我们组织了一个‘女子军事团’，借西门方板桥一家停课的女校校舍为集合处，分四项工作：战斗，看护，募饷，缝纫，各以能力志愿参加。……团成立后，呈报护军都督府，请指导。后来南、北军事至南京而止，军事团工作仅以做制服和募捐略有成就。……在南京时，克强先生部下有人教装炸弹，亦曾练习使用，住在铁汤池丁宅，只极短时间。”

她后来之所以主动解散“女子军事团”，成员各自回归教、学本位，既有时局已趋明朗这一外因，更觉自身尚待提高充实，方能尽公民建设之责；另外，她深受传统文化之影响，认定政治圈乃名利场，属结党营私、藏污纳垢之地，绝非读书人尤其是知识女性栖身之所：“我们一班人热血有余，贡献极少，自这次经验，同人都不再参加群众运动。有一点相同处，觉冲动时期已经过去，国家需要建设，个人需要学问。有人提倡女子参政，我们几个人因受旧书影响，看得从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参政，须先具备足以参政的条件，故均无意于此。民国元年（1912）暑假以前，我们已各归本位，教者归教，读者归读。”

无独有偶。同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出身的许广平，在1925年4月6日给鲁迅先生的信中谈及唐群英、沈佩贞等女界先驱时，口气颇为不屑：“那些不纯粹不彻底的团体，我们绝不能有所希望于他们。即看女性所组织的什么‘参政’、‘国民促进’、‘女权运动’等等的人才的行径，我也实在不敢加入以为她们的团体之一。团体上根本的事业没有一点建设，而结果多半成了‘英雄与美人’的养成所；说起来真叫人倒咽一口冷气。其差强人意的，只有一位秋瑾，其余的什么唐□□，沈□□，石□□，万□……哟，都是应当用蚊烟熏出去的。”许氏持论失之偏颇，倒也充分表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熏育下的知识女性，大多对政治有着本能的抵触和拒斥。

## 二

《黄膺白先生家传》中说“先生初娶于吴，继娶亦云”。她与黄郛（1880—1936，字膺白）相识于沪军都督府，因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看法颇为同调，遂相互激赏，并于1912年10月结为连理。此后亦云夫妇始终“志同道合，其坚如金”。这种坚牢的感情基础，与亦云的人品学问和过人能力密切相关。

沈亦云极有才干，家庭贤内助自不必说，“那时全家衬衣都我自做，有时亦做鞋袜。……我开始做手工，以做手工为定心养性之初步，渐成习惯。……在得不偿失和不虞之誉中，我得到的益处是耐得住闲，不怕寂寞”。她与丈夫志同道合、互相砥砺，堪称黄郛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在黄郛建议下，亦云曾以黄率真的笔名翻译了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南洋与日本》一书，191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黄郛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政府通缉，亦云新婚不久就随夫流亡日本两年半，为生计只得将所有饰物包括结婚纪念品在内都一并变卖，其间危苦艰辛自不待言，她却自嘲这是一种心理解放。为安全计，亦云还得屡屡代夫独自“跑街”打前站，“跑马路、

跑码头、跑银行、跑电报局等”。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1916年前后,单身女性抛头露面接洽一些为当局彻禁的人和事,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为分丈夫案牍之劳,又事涉机密,因此看速记、拟函稿等都由她负责:“他参与很重要之点,则我屡为其最机密的下手,有时为唯一的下手。我以读历史的兴趣,对国家的同心,而共同参与,事后我即退出。”

例如,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黄郛参与其间,但“成密电本归我保管,来往电均我亲译,膺白复电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报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机锋暗示,措辞十分小心”。这一细节对方始终不知,因为“我极力避免参与他们的事,即以前膺白与之通电是我起草之事,亦未说出”。在黄郛的日常政务中,亦云于他更是良师益友,谓予不信,请看下文:“我劝膺白写中国的《人民读本》……为写《人民读本》,引起了许多心事,他说何从下笔。我建议一面写‘常’,一面写‘变’,即照理中国应该如何,而此时则实际如何,把一篇烂污账请国民过目判断。”“膺白写第二本书《战后之世界》要吃力得多。……他写一章,我誊一章,我们在同一书房,我的书桌只是一张半桌。他要我誊,为让我做他第一个顾问,我见到须添须改之处,立刻告诉他,得他同意,立刻修改。我愿充誊录,以先睹为快,并且二人在同做一件事情,其他俗事不会因影响到我而亦分他的心。抄稿以外,我亦替他看参考材料,世界有许多未决的问题,疆界亦时常更改。……报上预告汪精卫作《巴黎和会与中国》,我函托在上海的吾弟君怡,该书出版,用最快的方法寄我一本。收到时膺白正在北京,我一口气看完,次日上午膺白已接我快信,报告他汪书已看过,不足以夺彩,无事参考。”

更为难得的是,亦云恪守公私内外之别,夫妻知己而又诤友,和而不同,“我在膺白面前,对国事和其他看法,要保持独立的见解,虽然我们的看法大都是相同的”。至于后来亦云夫妇隐居莫干山,筹办小学和战时临时中学,致力于义务

教育和庾村经济合作社建设,尤其是丈夫病逝又狼烟四起的抗战时期,还在沪创办南屏女中十年,勉力撑持奋斗不辍,以贯彻亡夫遗志,“以真正学问道德报国”,亦云之笃行坚忍、“中通外直”、“亭亭净植”之独立个性可见一斑。

### 三

逢人必劝写自传的胡适先生在其序言中说:“亦云夫人这部《回忆》的第一贡献在于显示保存史料的重要,第二贡献在于建立一种有勇气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适之先生此说大体不错,但尚未切中肯綮。作者沈亦云弟弟沈君怡的“沈跋”才可谓一语道破:“姊写此书的真正用意,我以为尚另有所在;而最能道出姊这点心事的,莫过于蒋公在卅四年(1945年)11月28日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序文中间的几句话:‘亦云夫人撰此《家传》,其于逝者心事,实能推见至隐。’这几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回忆》,‘于逝者心事能推见至隐’一语,实道出作者与逝者无限辛酸惊险的经历。今姊于悠长的岁月中,以坚忍的精神卒成此书,可告慰姊丈在天之灵者,无过于此。某日我曾对姊说:‘姊丈对得起国家,阿姊对得起姊丈’,意思即在此。”

至此,必须介绍《亦云回忆》的真正主人公、亦云丈夫黄膺白。在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黄郛可谓举足轻重。他在短短五十七年的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到“七七事变”前中日交涉的诸多重大事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黄郛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也令他至死陷入“亲日”、“媚日”的舆论漩涡:“膺白在世时,直接当济南惨案及塘沽停战之冲:为这两个问题,前后受大谤,为国家故,他愿过则独受。在当时折冲之苦,与事后隐忍不言,真是‘打落门牙带血吞’、‘万箭穿心’、‘腹背受敌’各种成语的滋味都尝到。为国家,我不敢怨,然‘国家’今如此,我

岂能忘！”

1933年8月，黄郛在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时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1934年，黄郛的高级顾问何亚农就曾对黄郛此后的内外困境有所阐释：“盖有三误焉。从前日本以为黄有办法，所以捧之，近以其诸凡听南京，因之颇不满，此一误也。黄之来也，以为蒋必事事听之，孰料不然，此又一误也。蒋之约黄出来，本利用其做二重外交，……孰料黄亦系求国民叫好者，岂非亦一误耶。”

一如沈母曾经慨叹“取得经来是唐僧，惹出事来归孙行者”。亦云在回忆录中以巨量篇幅和大量史实，包括当年执政各方的书信、电报以及众多当事人口述回忆，从多个角度凸显亡夫“宅心仁厚，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生平言行一贯，不依流俗浮沉”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尤其一一呈现黄郛当年的艰难处境，“国家大难当头，犹意气用事，视当冲之人存心卖国，又责以万能。中国政治场中，为公谊而指臂之助者，甚为罕有”。亦云自称撰写回忆录之动机，一则“承他（黄郛）拿我放在他自己与朋友之间，使我义不容辞而写这些”。二则源自老师傅增湘先生的策励：“膺公为历史上之人物，记载要以翔实为主。凡官撰之书多有失实，不若私家著述之尚存真相，自古已然。共和以后，史职不修，若不自行整理，恐他时必至混淆是非，任情毁誉，非细故也。……斯意谓此事宜夫人自任之。”因此以《亦云回忆录》告慰黄郛在天之灵，同时“向现代史家交卷，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

如今，随着当代史学界“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无以为继：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等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现，人们对黄郛功过成败的评价日益客观公允，亦云夫人的弘毅笃行和她这部巨著，自然功不可没。

亦云夫妇同心一德、情比金坚，但全书毫无夫妻间风花雪月、情意缠绵的描写，甚至连恋爱细节都付之阙如。从一般意义上讲，男女的相处一开始有激情有爱意，维系与吸引彼此的就是这些。而像亦云夫妇，彼此又兼知己、同道和战友，在甘苦与共的岁月中激情潜沉，凝成声气相求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亲情，可谓升华了的爱情，爱意早已弥漫于拟稿译电、谈心商讨、读写誊校、吃饭散步、端汤奉药等日常事务中了。正因情同一人，《亦云回忆》大旨为亡夫鸣不平以浇心中之块垒，故春秋笔法随处可见；而写到黄郛积劳成疾忧愤而逝的章节，字字句句泣血锥心。全书毫无女性为文的婉约柔美，风格沉郁苍凉。撰写长篇回忆录，不能仅靠毅力，还得具备相当专业修养：“我属稿时，排比而解说，常恐记忆有误。每择一题，先回想其时环境和有关人物，结成局面，然后置身其间，以所知多少略定轮廓，故虽信口述来，不敢以意为之。历史是中国最早而极郑重的一门学问，述而不作，古贤以之代舆论。我未曾学，而慕此理，执笔战兢，仍不免阿私溢美之处，读者斟酌，并请宽恕之。”亦云夫人当年是北洋女师简易科出身，她安排材料结构全篇包括回到具体历史场景中去构思回想，其艺术功力实令后辈来者追仰之至。

黄郛当年为求婚而长函恳告沈父：“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一诺。”回顾他们的非凡一生，与其说表明了膺白先生眼力之精准，毋宁说更证明了亦云夫人的才干能力卓绝超拔。

《亦云回忆》只有一处提及对两性平等的看法，有人“请我到妇女会演讲，我不知应该说什么，而且我有偏见，男女同隶于四民，没有男子会何以要有妇女会，故亦逊谢了”。在潮流面前不偏不倚，在权力者面前不卑不亢，在弱势者面前不矜不伐，在强权面前不屈不挠，二十世纪初的女性解放先行者，沈亦云先生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岳麓书社2016年版）

## 对湖湘文化精神的解析

——读龚军辉的《芙蓉山走笔》

◎ 廖小刚

龚军辉的《芙蓉山走笔》，是本很好的文化散文。他所书写的芙蓉山，既是长、潭、益、娄交界的实体的芙蓉山，更是蕴蓄着湖湘精神底蕴的虚拟的芙蓉山。他不仅梳理了实体芙蓉山的文化脉络，描绘了其现实图画，展现了未来可企前景，而且通过对其气质品性的探究，以此来解析了湖湘精神底蕴。

作者对芙蓉山地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搜集周边县市志书、宗教传说、民间故事及主要家族史书的基础上，对性情暴烈而喜走偏锋、重视实际而看淡生死、讲究大义而轻视私欲的芙蓉山人的精神底蕴来源做出了判断：首先，来自其地理位置的独特，即长期作为峒、汉边界，深受“梅峒文化”的浸润，尤其是坚韧的抗争和勇敢无畏的品性，血脉未断，而小小布袋演绎了乾坤扭转，自娱自乐又在生活中展现智慧与自嘲。其次，来自地理风貌的裹挟，奇丽山水让当地人性格的粗犷豪迈、狭隘固执得到充分发挥，而农耕文明、游侠气息又加剧了其地域人格的厚重。再次，深受佛、道、儒家三种宗教信仰的熏染，尤其独特的五福寺院既把希企安康富足、长寿心安的种子播撒心底，又让超脱生死、好德乐施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开花结果，从而形成最具地域标志的文化风向。因而，我们读《见羊而止》，可领略到开悟的情趣；读《隐世与高人》，可感喟慧眼识人的难得；读《大德若斯》，可激励胸怀的

博大宏阔；读《普济天下》，可品味怜悯的高大深义；读《苍野耕夫》，可触摸吸纳兼容的真脉；读《儒生养佛》，可咀嚼历史扑朔的苦涩……更主要的是，作者有意无意地将这小芙蓉山与安化大芙蓉山、常德德山、江西庐山等进行比照分析，并有意引导读者去对照湖湘具有同等精神底蕴的山脉，如岳麓山、衡山、浮邱山、九嶷山等，这时，你才恍然大悟：作者所写的不只是真正的芙蓉山，而是所有湖湘山脉，这种立意不仅新颖而且大胆。

如果说以小见大、解析这种精神底蕴是寻根，是对这种文化气场的全面挖掘，那么，看看作者描绘现景、展示时代气息的那些游记类佳作，就更可明白其用心良苦。《春雨游芙蓉》、《秋水田坪》、《青山夏荷》、《冬雪田心》这组以四季镜头为穿梭的全局观照散文，不仅扫描了芙蓉山风景之丰富多彩、独特个性，而且奠定了整体篇章采撷的一个基调：以景吸睛，以情博彩，以文化内核作支撑析理论道，以现实需求为反馈选材剪意。除去《游了五福寺院》找不到皈依的失落、《洞门寺》对于功利主义开发的担忧，其游赏部分三十余文，整体张扬着佛道传统的敦厚大度、红色基因的激昂上进、民俗建筑的沧桑巨变，呈现着向前的勇猛、向真的力量、向善的阳光、向美的招引。因而，在《流沙河里不流沙》里，我读到了丰裕的满足；在《沙田红霞》里，我读出



了精神的添充；在《龙田有龙痕》里，我品尝了不甘的尝试；在《牛角湾》里，我品鉴了补偿的美好；在《三步桥湿地》里，我感触了平凡享受；在《唐市章子》里，我感悟了手艺的寂寞；在《楚江的辩白》里，我看到了不屈的抗争；在《扞担坳的雨》里，我看透了历史的假写……

龚军辉的这本《芙蓉山走笔》虽然有九个部

分，但实际上是两个大的切面，一面是史实，另一面是赏玩。他把二者结合揉造，就充分表现了他的创作野心，即以芙蓉山作为观照点，把他对湖湘文化的理解作了一次全面的坦露。这既是其学者气质的张扬，又是他作家情怀的书写。

（龚军辉：《芙蓉山走笔》，湖南地图出版社2019年版）

## 醅醅多古情

◎ 朱航满

谷林原名劳祖德，大半生从事会计工作，晚年写作自娱，著述不多，但颇为识者所赏。有论者由谷林想到了曾做过会计的英国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对此，谷林倒是有一番特别的自嘲：“兰姆当了三十六年的小职员，他牢骚满腹地说，他生平的伟大著作，都已被锁藏进东印度公司的账桌抽屉里。世上以会计工作终其身，直至退休的男男女女，只恐怕不止成千上万，但像查尔斯那般发牢骚动人听闻的有几个呢？”谷林自认为“不敢去盲目与之攀比”，但诸如兰姆这样的会计人员，又能写一手好文章者，世上又有几人呢。谷林与一般的会计不同的是，他爱读书，是个真正的书迷，而他曾供职多年的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和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也都还算是个与文化打交道的地方。后来，他又调至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十多年的时间，校订一部二百余万字的《郑孝胥日记》，算是成为一个文化界的边缘人物。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使得他因缘际会地与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结缘，有幸成为这份杂志的编外校对和作者，也是读书圈的一个小小佳话。

起初，谷林在《读书》杂志所写均为短章，借女儿之名作笔名，乃是有意于隐的。他给当时尚在《读书》杂志任职的编辑扬之水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只是想看看闲书消日，并非求学做学问，偶有会意，记以小文，自鸣其幸遇和欢悦，故读写皆属‘计划外’项目，而读更先于写也。”这种无意为之的行为，却使他很快收获了一册小书《情趣·知识·襟怀》，收录于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之中，与已颇有影响的王佐良、董鼎山、董乐山、流沙河等作家学人的作品同为一辑。数年后，他的另一册读书随笔集《书边杂写》，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第一辑，且得以与施蛰存、金克木、唐振常、辛丰年等名流的作品同列。这两册小书，令谷林在爱书人中声名鹊起。《淡墨痕》是谷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册文集，收录在岳麓书社的“开卷文丛”第二辑之中。至此，谷林生前共出版文集三册，总计字数不到四十万字，可谓少矣。谷林去世后，由止庵编选其散落的文字，成为《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但就水准来说，远不及谷林生前出版的三册集子。

谷林虽晚来作文,但他起手极高;对于评价文章高下,则常常强调一个“回环咀嚼”,或者是否能够“咀嚼慢咽”,故而在文章的立意、布局、修辞和素材使用上,谷林都是颇为讲究的。在1995年给扬之水的一封信中,他谈及了对于写作读书随笔的理解:“写书话,是不是宜把视线收紧些,引例最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为不是写导读,或曰学术性的评论,随笔小品拿一本书来做引子,这是借他人酒杯,触发自己的郁结,引例一多,放心难收,不免‘缺少景深’。”在1998年给沈胜衣的一封信中亦有相似的论调:“前面说到的书话极好,是因为浓浓的感情皆淡淡着墨,不用长吁短叹,没有宏论悦议,切切实实写出一些细节,此等风格不仅仅能求之知堂翁集中也。”也正因此,收录在谷林生前出版的三册集子中的文章,几乎篇篇为佳,虽多是读书小品,但并不泛泛写来,也不长吁短叹,更无艰涩的学术话语,均是能够“切切实实写出一些细节”,用他的笔头尽可能把议论的“景深”拉得很远,故而很有一些可以“回环咀嚼”之处。

现代以来的作家,谷林自始至终都最服膺知堂笔下的文章,而他研读知堂文章也最为细心,有些甚至到了痴迷地步。《曾在我家》堪称谷林的代表之作,乃是谈他读周著、藏周著,以及因此而结缘的书人往事。这是一篇写读者与自己仰慕的作家交往的文章佳构,写他搜求周作人文集的往事,以及因此而两次登门拜访的经历。文章沉静而优雅,也留下了一份特别的文坛资料。《等闲变却故人心》亦可作为谷林谈知堂文章的代表之作,此文系其读周氏《知堂回想录》而作,但只谈其中的一节《元旦的刺客》,并就周氏回忆1939年元旦在八道湾遇刺一事进行议论。对于周氏的回忆,谷林写道:“叙事不过两百字,全景已描绘得清清楚楚,推想当时运作,无非三五分钟罢了。两客先后开腔,合并字数,寥寥九字,此之谓要言不烦。”这“寥寥九字”,乃是刺客问:“你是周先生么?”作为学生的访客沈启无则回答另三个字:“我是客。”对于这

三个字,谷林认为“大堪咀嚼”。由此,谷林继而谈这一对师生后来的关系破裂,并认为此或已为两人交恶埋下了“伏笔”。

与《等闲变却故人心》一样令人“回环咀嚼”的,可推《绘画,写历史》一篇,亦是在字里行阅读出了微意。此文谈冰心的散文集《记事珠》,但谷林专门挑出其中的一篇散文《我的故乡》来谈,乃亦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此文先从他在博物馆整理严复日记的往事谈起,颇有些白头闲话的寂寞,并不经意地提及日记中的一句“谢子修故,八十七岁”。他在读了冰心的散文《我的故乡》后,恰恰证明了谢子修不但是冰心的祖父,且与严复是朋友的这个佐证,这种读书,真有种他乡遇故知的“幸遇和欢欣”了。到此,谷林又写到了一个闲话,乃是他因此为“谢子修”所做的脚注上,特别加了“作家冰心的祖父”七个字,并希望由此“引逗某一些读者的闲览兴趣”。文章至此,本亦该结尾了,谷林却笔锋又是一转,写到冰心关于童年读书的记忆以及家庭出身的论述。但经过谷林的又一番考证,这两条记叙均值得推敲。待到此时,谷林才写到他作此文的意图:“人们所有的回忆,不由自主,总是要经过情感的筛选。冰心也是在她记忆的画本上绘画吧?”

谷林的这种在字里行阅读出微妙之处,很能体现他作为爱书人的性情之处,想来也与他多年从事会计这一职业所养成的敏感细心很有些关联的。他还有一些文章,诸如《〈争座位帖〉与〈苦住帖〉》、《湘西一种凄馨意》、《牙签与暮齿》、《汗漫游》、《版本的选择》等,均是这样值得“回环咀嚼”的篇章。在文章《湘西一种凄馨意》中,谷林特别对照了《湘行散记》和《湘行集》两个不同版本中的内容,发现沈从文晚年对他这些早年的文字,曾做过大量“极为细微”的改动,“但也因之益见出作者的用心致密,着意推敲”,而这种“暮年经营”,在谷林看来,乃是“他始终没有忘情文学工作”。至于沈从文改行转业于文物研究,谷林在文章篇末亦有简短论述:“原也

是寻常行径,然而由于外力的压迫,实逼处此,自不能不令人思之于邑。”文章《版本的选择》,对比两本不同版本的梁实秋散文集,其中均收录一篇《谈闻一多》,但其中一个版本在闻一多的出生日期上,直接采用了公元纪年,但生辰却没有换成阳历,故而闹出了笑话。

以上略举数例,不难看出谷林的书话文章,乃是“拿一本书来做引子,这是借他人酒杯,触发自己的郁结”。《一个长期的旅程》和《谔谔一士》两篇文章,均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短章。前者谈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后者谈梁漱溟的《忆往谈旧录》,谷林均拈出两位读书人在政治年代的一段特殊遭遇,细究其间的微妙心思,其中颇有些动人心弦之处,这或许正是触发了他这样一个亦曾遭遇政治坎坷的小人物的“郁结”之处。可贵的地方还在于,谷林能够在作文时做到“浓浓的感情皆淡淡着墨”,可谓“发潜德之幽光”矣。与此相类的,还有谷林在2002年8月致小友沈胜衣的一封信中,写他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江河万里》一文,由此想起与此文所谈的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交往的一点逸事。1995年,谷林因胃癌在北京医院住院,邻床的病友枕侧放了一册《宋词三百首笺释》,而他也恰恰带了此书。结识后,他才得知此人正系黄炎培的公

子黄万里。他继而写道,黄因反对某大型工程,“被戴上反苏反社受苦二十年之帽”,“一意孤军作战如马寅老”。

还有两篇文章,亦是令人会心的。《共命与长生》一文,乃是从六个读书人关于书的故事,来写他对于书的态度:“‘诚知此恨人人有’,把深爱的分散给也能爱的人们,使所爱的及时得所,岂非便是长生?”谷林生性淡泊,藏书不多,但颇有些令人爱慕的旧物,这些他生前多分散给他欣赏的后辈,使他的爱物终得以“长生”。另外一篇,则是《煮豆撒微盐》,谈及他极为喜爱的周作人文章《结缘豆》。周氏论及京师僧人在佛诞之日,“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并说他不必去“念佛拈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谷林在文章中还引用周氏:“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侘傺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无论怎样评价周氏做此文用意,但这又何尝不应是所有做文章者的夫子自道。谷林于此感慨:“宿业前缘,真令人无可排解。”

## “一棵开花的树”

◎ 战玉冰

中国古典诗歌中借“树”的意象来表达爱情主题的情况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可以上溯至古老的《诗经》中,《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

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周南·汉广》中也有“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杨柳”与“乔木”从此在中国文化的语

境下和爱情发生了密切关系。后来,诗人更是频繁借用“柳”与“留”的谐音,最终使得“折柳”成为依依惜别的代名词。所以,唐代诗人王之涣在《送别》诗中才会说:“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

另一类则是借树枝来比喻情感上的牵连不断,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当属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诗人以此来比喻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此外,白居易在《长相思》中也有“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其实中国人借用“连理枝”来表达情感早在白居易之前,只是具体用词不一定是“连理枝”三字,中国古人用“连枝树”、“连理树”或“连理木”等词汇,而其所表达的情感也不一定是男女爱情,同时也常常指代兄弟手足之情。比如《昭明文选》(卷二十九)中便有“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乐府诗集》中《子夜歌》也有“不见连理树,异根同条起”,而这两处所指的都是兄弟之情。

为何中国古人会以“连理枝”比喻爱情或兄弟之情?这可能是因为“树枝相连”在视觉上很容易让人想到手牵手,进而联想到亲密的情谊,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然,这背后也有这词源学上的支持,汉语中的“肢”和“枝”本来就都出自“支”,可谓同源,因此也就有了相互指代的可能。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中国古代诗歌中将“树”与爱情相互关联的线索:一条是“杨柳—折柳—‘留’的谐音—依依惜别”,另一条则可以概括为“连理枝—手牵手—心连心”,前者是声音的相近,后者是视觉的联想。

在中国现代诗歌中,“树”与诗的关系更为复杂、多变。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诗人表面上以“杨柳”的婀娜姿态来类比“新娘”,其实又巧妙化用了古代诗歌中“柳”与“留”的谐音,只要联系诗歌题目中的“别”字,诗人这里对传统文化有意或无意的继承就变得清晰了起来。而台湾地区诗人席慕蓉

的《一棵开花的树》中则是“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这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变成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边”。徐志摩是将康河畔的柳树比作夕阳下的新娘,借这种恋人间的爱情关系来表达自己对于康桥的眷恋之情;而席慕蓉则是通篇把自己比作一棵树,借树不能移动的特点,来表达自己对于爱情等候、守护、执着的心情。两首诗虽然表达的情感各异,却都将树、人和爱情三者相关联,前者是“拟树为人”,后者是“化人为树”。

中国现代诗歌中也不乏以“连理枝”比喻爱情的诗篇,比如何其芳题为《爱情》的诗歌中就有一句“因为常春藤遍地牵延着,而菟丝子从草根缠上树尖”。而在所有“以树喻情”的中国现代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当属舒婷的《致橡树》:“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这首诗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诗歌中“连理枝”意象在现代诗歌中的延续,另一方面,诗歌热情而坦诚地歌唱了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人格理想:与爱人比肩而立、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这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夫唱妇随,而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男女在爱情中对精神上的平等地位的诉求,可以说是给传统“连理枝”意象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因此,舒婷的《致橡树》自从1979年4月的发表于《诗刊》以来广为传诵,甚至被人们推崇为“一篇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书”。

类似的化用“连理枝”意象的新诗还有台湾地区诗人陈金南的《杨柳》:“我们是一对/对望的杨柳/在我们中间/隔着一条宽广的河流/水涨水落/也不能使我们更接近/只是在月明河清的时候/默默弯腰画着彼此的姿容/若是起风/我们絮絮叨叨的托风转信/若是风不来/我们只好说给水听/执意的相信,那些话/会在下游某处聚首交流/而我的愿望,岁岁年年地/幻想能够/潜过这宽广的河流/用我的手/触摸到她不

经心伸过来的/一条须根。”这首诗一方面借用了传统的以“杨柳依依”来表达爱情的典故,另一方面根须触碰的象征也和舒婷的诗歌异曲同工。而联系到诗人的政治与地理处境,“在我们中间/隔着一条宽广的河流”一句显然是暗指台湾海峡,而“而我的愿望,岁岁年年地/幻想能够/潜过这宽广的河流/用我的手/触摸到她不经心伸过来的/一条须根”则暗含了有情人被阻于两岸,希望跨过阻隔,彼此相见的内心愿望,甚至是诗人对大陆故土的一往情深。

此外,薛卫民在《两棵树》中写道:“我们应时变成了两棵树/不管路/怎样殷勤地延来伸去/——从你的脚底,到我的脚底/我们没有动/我们没有再走到一起/你有你的惊蛰/我有我的雨季/……我们不会把风/望得吹乱了季节/我们不会把云/望成淅淅沥沥的秋雨/百年之后/几个孩子会发现——/有两棵树的年轮/竟能重合在一起。”这首诗匠心独运的地方在于诗人表面上写爱情双方因故没有相聚——“我们没有动/我们没有再走到一起”,但实际上他们却能够冲破空间的阻隔,在精神上彼此沟通、相知、契合,进而达到一种心心相印的境地:“百年之后/几个孩子会发现——/有两棵树的年轮/竟能重合在一起。”

当然,在以“连理枝”比喻爱情的新诗中也

不乏一些质疑甚至解构爱情之作,比如郑敏在《寂寞》中写道:“但是对于我,它们/只不过是种在庭院里/不能行走的两棵大树/纵使手臂搭着手臂/头发缠着头发/只不过是一扇玻璃窗上的两个格子/永远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呵,人们是何等地/渴望着一个混合的生命/假设这个肉体里有那个肉体/这个灵魂内有那个灵魂。”诗人在这里同样借用了传统文学中的“连理枝”作为爱情的比喻(“手臂搭着手臂/头发缠着头发”),同时也和薛卫民一样发现了树木不能移动的特点,并借此质疑世俗爱情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连理枝”看似同气连枝、非常美好,但实际上不过是两棵不能移动、不能进步的“死物”。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与现代诗歌中都不乏借“树”的意象来表达爱情之作。而其中“杨柳”与“连理枝”是古往今来诗人们最常使用的两种意象。在具体运用意象时,古典诗歌更具有传承和稳定性,新诗则更富于变化,甚至出现了以“连理枝”来质疑、解构爱情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诗歌与爱情理解上的不同。看罢这众多杨柳、连理枝与爱情表达之后,穆旦的诗句或许更适合作为本文的结尾:“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它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穆旦《诗八首·其八》)

## 儿童文学就应当是人的文学

◎ 王宏任

我最近天天与三岁孙女玩耍,为了对她教育,买了十多本精彩绘本。这些绘本都是大十六开高级铜版纸印刷,彩色鲜艳,印刷精良,大部

分都是外国人绘写的。昨天给孙女阅读一本《小鹿斑本》却让我在孙女的追问下无言以答。

小鹿斑本在森林里与父母朋友快乐生活成

长,认识了兔朋友、鸟朋友、鼯朋友,甚至也有了异性朋友。当父母领它到森林外活动时,几次危险发生时都闻到了人味。其中一次与妈妈外出游戏,妈妈让它快跑,说人来了。它只好跑,后面一声巨响,它跑进森林,等妈不来,父亲告诉它,你妈妈被人打死了!小鹿悲伤,我孙女也悲伤,一劲问我:“人为什么打它妈妈,为什么?”同时眼中闪烁着泪花!我只好说它妈太漂亮,人要与它一起玩!孙女说她妈妈也漂亮,也有人打她吗?我只好说不会的,我们是人呀!孙女说,人为什么打鹿妈妈?他不知小鹿爱妈妈?故事到这儿无法往下进行,我翻翻后面情节更残忍:人烧了森林,动物无处栖身,我不敢再念,草草收场,孩子还为小鹿丧母而悲伤,愤愤地说:人真坏!

此书是迪士尼英语教学经典故事,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编写者是美国的利娅·豪斯,董宇虹翻译。我不知它想宣传什么,可能是说人类在毁灭地球,残害动物?可是,从编写者、翻译者到出版者难道就没想想:这是在向幼小稚嫩的心灵灌输反人类的教育吗?动物界和谐美丽阳光灿烂,人是敌人,杀害美丽温柔的小鹿妈妈,这对儿童心灵不是伤害吗?我买的十几本绘本大部分是外国人编绘的,几乎全是动物世界,只有这一本有人类出现,却是作为坏人出现的。作为大人,可以说他们是偷猎者,是法律不允许的,但在此书中,出现的是“人类”,人类是坏形象!

长期以来,儿童就陷入动物界无法自拔。我孙子十三岁,伴着他的童年生长脚步的首先是形形色色的精灵,是巧虎大灰狼,是海绵宝宝,是动物大战僵尸,是恐龙世界,是唐老鸭,是熊大、熊二,此前的动物世界根本没有人,光头强出现后,才有了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却是砍树破坏森林毁坏环境的光头强,就那么一个人,还是作为正面形象的熊的对立面出现的!这个人无能愚蠢可笑倒霉,受嘲笑!为什么把人设定为负面的、可笑的?把动物设定为正面

的?起码近十二三年来,我们的孩子是在各种动物伴随下成长的,那些动物都美丽动人温柔可爱,只有一个人“光头强”,还天天打坏主意、破坏森林!

现在的孩子锦衣玉食,物质极大丰富,一个小孩衣服比大人都多,改革开放使这代孩子生活在福窝中。可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与动物为伍,各式各样的动物是好朋友,甚至老鼠也是正面形象。有《咕噜牛》的绘本,是英国唐纳森写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翻译。里面小老鼠是聪明智慧的正面形象,这简直是抄袭中国《狐假虎威》的故事,只是把狐狸换作老鼠!我很奇怪:任溶溶为什么不自己写,偏要翻译别国人拙劣抄袭中国故事的书呢?狐狸借老虎威风还能说过去,老鼠代替狐狸、牛代替老虎就十分可笑!当孩子小时候对老鼠怀着好的印象,长大后发现老鼠是这么可恶的东西会怎么想?

在低幼儿童观看的动画片中也是动物占了很大比重。《小猪佩奇》、《汪汪队立大功》等动画产品风靡儿童读物市场,均以动物为主角。不同程度上对人的形象虚化淡化,孩子最早看小猪佩奇时,会对里面的行为进行模仿,如同幼鸭跟随母鸭的印随现象,这在生物界有些广泛的共性。佩奇的弟弟乔治,台词只有几句,而经典动作是利用坐在地上大哭的方式来阐述诉求,它对现在的孩子造成了一定程度影响,成为孩子要挟家长的手段。无独有偶,一次郊游中,朋友对在泥坑边乱跳的孩子狂吼道:你是猪吗?《小猪佩奇》中小动物们最喜欢的运动是跳泥坑,这种原始的生活技能,在未谙世事的孩子心中,是他们行为的模范准则。

《汪汪队立大功》极大地渲染了狗的作用,当人类遇到困难时,只有狗才能解救他们,最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即使是小孩也应当指挥狗、挽救狗,怎么能丧失人类自尊被狗挽救?儿童文学要树立人类自尊,与动物为伍应当受到动物的崇敬生存,应当以人为主,不应让人歌

颂和学习动物！当我们成为地球的主人之后，却要我们的孩子去“印随”那些原始的、靠本能生存的动物，这是人的文学吗？电影 3D 时代的代表作《阿凡达》上映时，影院中看到人类被外星人驱赶回地球时掌声雷动，我不知道这是对贪婪的惩罚，还是人类的荣耀的摧残。成人世界，人们对善恶有足够的判别能力，而幼儿正是建立自己价值观、世界观的时期，对动物的偏好，必然导致孩子们对人类世界的淡化和理想的重构，儿童文学不光是故事的精彩，更该担负起引导孩子对于人的尊重与爱戴的重责。如很多网上搞笑的小学生习作看似搞笑，实则是社会的悲哀，老师让孩子写自己未来的理想，有的孩子竟然要开动物园，开狗园猫园，最高理想孩子的理想是和妈妈一样做微商，不用上班还挣钱。这个新兴的产业我并不反对，只是因此抹杀了孩子作为人是社会改造者的伟大雄心壮志和对科技文化学习进取的心，这不能不说与从小浸淫于动物世界有关！一代青少年没有远大志向，是民族的悲哀，社会的悲剧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人文学成就巨大，出现不少走向世界的佳作，甚至获“诺奖”，但是，儿童文学尤其是低幼儿童文学质量堪忧，极大问题是完全陷入动物世界，只见动物不见人，只给动物说好话，却讥笑人、嘲弄人甚至反对人，动物世界简单单调，写作者炫耀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动物住别墅庄园，吃面包、奶酪，尽量展示动物世界的和谐美好，使小孩子向往动物世界的生活，这对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无利有害的，其负面效果是使许多小孩子过分喜欢小动物，甚至达到不正常的程度：有的小孩抱着猫、狗睡觉，有的小孩发誓要与小宠物生活，反而对于人态度淡漠；很多十二三岁的孩子过分天真幼稚，看书找趣味，找搞笑，喜欢逗笑的东西，对人世社会知识懂得太少。一些孩子人文知识缺乏，人情世故极度缺失，历史知识更差，没有人文理想，缺少社会抱负，思想简单可笑；十五六岁人高马大，

说话办事像个孩子。“巨婴”这个词创造得很好，一代青少年中“巨婴”数量惊人，这不能不说与从小接受动物世界教育有关，多知动物，少知人。这些书过分美化动物品格，尤其是用现代生活水平美化动物生活，使很多孩子甚至愿意生活在动物世界而厌恶人的世界，当他们小时满怀对于动物世界的美丽理想，以为动物非常美丽高尚时，一朝长大，看到某些动物的凶残、丑恶，会引起理想的破产和精神的崩溃。这种以动物为主的儿童文学的倾向应当引起注意并应认真转变。

引动物入儿童文学可能起源于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爱丽丝仙游有动物做伴，但是以人为主导，动物为人服务，这是以人为本。他们的作品及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到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作品永远是儿童文学的杰出经典，影响了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叶圣陶、丰子恺、张天翼以及后来的任大星、任溶溶等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也创作了无数儿童文学佳作，这些佳作哺育了一两代人的成长，培养了他们许多美好的品质和高洁的情操，绘制了许多美丽温馨的儿童生活画面，虽然他们的作品中也有动物，但是始终是人的陪衬。我小时读过的《陶奇的暑期日记》、《杨永丽和江林的故事》至今让我们那代人向往，《让我们荡起双桨》永远是我们那代人的童年乐章。还有，我们那时接触的苏联的《诺言》、《一块烫石头》等外国儿童文学，其中不少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都使我终生难忘。它们的共同特点培养人对于人的爱与信任，是挖掘美丽优秀的人性人情，歌颂人的美丽温柔善良诚实勇敢坚贞，懂事后的儿童读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对影响深远，有些所谓关涉“灵魂”的句子让人记忆终生。记得读《基洛夫的少年时代》时记住了一个情节：少年基洛夫遇到青年革命者，让他参加革命，他没有表态，答应过几天再说；过几天，他跛着脚去找革命者，决定参加革命，原来他回家后用

铁钎把自己的脚扎了一个洞,他试一试自己能否经受考验,才能决定是否参加革命。另外,《柯楚别依》记录了这个苏联红军旅长的艰辛少年时代,他攻打一个白军军部,缴获了不少糖,战士们问他怎么处理,他说送给幼儿园吧,老子从来不知道糖的滋味,永远不想吃,那是培养白痴、笨蛋的毒药!当然这些情节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这里只是指出儿童文学对于人影响极深。青少年应当读些培养人坚强正义品质的励志作品,儿童文学应当以人为主,使孩子从小爱人、懂人、理解人、尊敬人、帮助人,懂人情,通世故,了解社会,知道历史。现在,一边让孩子背干巴巴的《弟子规》、《三字经》,一边灌输动物的可亲可敬可爱,把人放到次要甚至反面位置,这是反人本主义的错误教育,是应当引起注意并改正的。

还有,儿童文学进入绘本时代也有不少弊病:一是如上所说不分内容良莠的盲目引进不少错误的不合国情的东西。二是文字少而简、以画为主没有语言文采,作为文学,失之简陋,作为画图失之简单,两不像,一本用不了二十分钟即读完,很少有保存收藏价值,收之无用,

弃之可惜。儿童文学首先要有好的语言,让儿童通过语言学习文学知识、社会知识。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现在的绘本几乎没有什么文学语言,只是浅显的画面说明。三是助长浅读、读图的浮泛之风,更加使孩子养成不耐读、不精读、不思考的习惯,败坏优秀的儿童文学优良传统,养成儿童不愿读高深文字的懒惰作风。四是价格太高,二十几页、一两千字的绘本,高者三十多元,低者二十元,一般家庭难以购买。五是流风所及毁灭儿童文学扼杀经典。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基础,儿童是人之幼苗,基础不固易塌方,基础不良易隐祸。幼苗应心存真善美之人情人性人心人格,岂是动物所能施教而成栋成梁!

儿童文学应当是纯洁的,应当是美丽的,应当是鲜艳的,应当是浪漫的,应当是活泼的,应当是人性的。她首先应当是以人为本,是歌颂人、理解人、爱人敬人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对于培养一代中华英才大有裨益。愿我中华子孙从动物世界走出,向人的世界迈进。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强健有待优秀的儿童文学去启迪教育涵养转化矣!

## 什么样的“知识”改变命运?

——读《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 魏冠宇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没有任何报纸、图书和期刊曾有过“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提法。直到1992年2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知识改变命运》

大型公益广告片春节播出。”随后的几天,一组主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公益广告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荧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的故事娓娓动听:草根如农村小姐妹抽签上大学、大



腕儿如导演张艺谋谈自己的成就归因，都讲到了知识对人生的重要性。广告的结尾，对未来做了一个明确的判断：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的世纪。从此，“知识改变命运”的这一命题深入人心。

之后，它也一直饱受批评。2002年，“人民网”刊登了一篇网友对这组公益广告的评论，语词直指不同社会群体对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公，认为广告中注入了“主流人群”具有优越感的潜意识，而对“底层”的人们，则是“把本可改变的命运当成一种难于更改的无奈”。彼时对广告中“精英”和“工人阶级”对立呈现的讨论已经不绝于耳；此后，社会上关于这句名言的讨论从来没有休止。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到2014年，参考人数上涨了零点八一倍，录取人数上涨了二十九倍，录取率从百分之四点七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九点五。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那么大多数人的命运应该都被改写了，这在改革开放后物质空前积累的语境中无疑正确；然而人口内部的结构差异仍在，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二扩大到2016年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六（世界银行估计）。人口分化更趋明显，阶层焦虑愈发显现。

对于“知识改变命运”，或许可以这样提问：知识是怎样改变人的命运的？什么样的“知识”改变命运？美国社会学家劳伦·A·里韦拉的《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给出了美国版本的答案：精英雇主凭借其精英阶层的稀缺文化资本，形成了一种定义和评估优点的方法，极大地偏向于具有社会经济特权的孩子们。

宏大的叙事抱负终归需要一个落脚点。里韦拉找到了一个巧妙的点：招聘。招聘是就业的必由之路，是知识变现成财富、社会地位的命脉。从就业角度分析阶层分化，必然是不同回报的就业机会的分化。而产生云泥之判的就业机会，往往就是那些稀缺、高端的“顶级”工

作。因此，里韦拉把注意力放在了精英行业的招聘过程中。

美国的“顶级”工作钟于精英专业服务（下称“EPS”）公司，包括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进入这些公司，意味着高收入和潜力无穷的向上发展前景。可以说，EPS公司是进入当代美国精英阶层的第一站。它们的招聘过程，或许就是解开美国精英阶层再生产之谜的钥匙。

此前，社会学学者对招聘的解释力度显然不够，他们往往只关注应聘人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人口学特征（性别、种族），把其他因素统统归入测量误差和歧视。这样似乎只能得出泛泛的结论（如“知识改变命运”）。在里韦拉看来，招聘主体（即雇主）被学者们忽视了，毕竟他们才是就业机会的守门人，他们守护的稳定的、不成文的决策机制值得研究，也应当被研究，哪怕里面存在违背主流叙事的“歧视”。

简历的初筛即是正确知识持有者的游戏。EPS公司的招聘虽然“公开”进行，但在收简历之前，招聘者就设立了很高的门槛，将绝大部分大学生排除在外：我们想要目标院校的优秀学生，官网上的“纯公开”招聘和非目标院校招聘会成了标榜公平的摆设和“刷存在”的企业营销。虽然招聘者认为这种排他性做法“并非”出于对非名校毕业生的主观歧视，更多是出于效率考量。但无论如何，EPS公司打开一扇“虚假的大门”，一进去就会被“透明的天花板”碰头。名校文凭象征着知识，它也是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制度性文化资本”，持有这种资本的学生简历才能被招聘者看到。一些研究已经探明，名校生更多出自近水楼台的精英家庭，而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得到正确的信息资源和教育资源。

简历主要呈现教育声望、课外活动、学业绩点和工作经验四个方面内容，但招聘者对它们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同，门槛已然保证了教育声望，教育声望的光环效应又为学生的学业打

了包票,招聘人真正在意的只剩下课外活动和工作经验。在课外活动一项,招聘人渴望学生拥有一项需要长期金钱-精力-时间投入的爱好(最好是和招聘者玩一样的高端运动),这意味着应聘者不是书呆子,而是能够愉快相处的人;工作经验方面,他们期待学生曾经在知名企业实习过办公室工作,这会为学生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进取心和行业兴趣给出证明。

然而,这些要求并不简单。费时、费事、费钱的高端课外活动是一种家庭出身体现,标示着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高端实习工作也很难找,这种职场出生在反映求职者的个人成就的同时,也考验着他的资源链接能力。归根究底,它们都与应聘者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而当学生获得“正确”的课外活动和工作经验之后,他又获得了新的知识——一种内化于身心的综合素质,这被布迪厄称之为“具身性文化资本”。

没有的正确“制度性文化资本”,应聘者的简历很难进入初筛;没有正确的“具身性文化资本”,应聘者的简历很难通过初筛。至于何种知识是“正确”的,往往由招聘者决定。总体上,审议者是按自己情况界定、评估应聘者素质的(而非刻意歧视)。符合招聘者期待的参数是一种文化匹配的文化资本符号,它们一旦出现,招聘者就会眼前一亮:“他多像我呀!我就成功了,他一定会成功。”这是他们的潜在逻辑。

如果说简历初筛还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两轮面试的评价逻辑就更加主观优先。社会学的招聘研究常常推定面试是人力资源部门完成;而EPS公司的招聘却表明不是这样。没有经过系统性培训的业务部门是真正的面试官,人力资源部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后者仅仅给前者的面试时间打了个环节框架,规定了破冰闲谈、自我叙事、技术性测试和自由问答的顺序,但具体如何评判仍是业务部门自己的事。

在破冰闲谈环节,招聘者寻找相处舒适的应聘者,他们认为新员工与自己契合,也

就是与工作和客户契合,期待应聘人的人际互动和光鲜程度让自己“来电”。自我叙事环节的核心是了解应聘者的成长背景和人生观解释,社会经济地位优渥出身的候选人侃侃而谈,而底层出身者往往羞于启齿(他们可能会忽视:言谈光鲜,使双方放松,保持有克制的自信和兴奋,这些也属于“具身性文化资本”,即一种知识)。

技术问题的时机置于破冰和自我叙事之后,面试官的首因效应已经发生作用,出于已经形成的好感或恶感,技术性测试会相应变成过场或刁难。在这种机制下,很少有之前表现不好的应聘者成功翻盘;而对技术问题本身,招聘者认为只要新员工相处得来,参加工作后是可以培训的。自由问答是在结束语中的最终确认,主动进取的积极叙事更易引发面试官的积极情绪,他们期望应聘者的工作驱动力不在于报酬而在于个人价值和社会贡献,而这正是社会上层出身的符号。

两轮面试中,同样的四个流程环环相扣,不断强化面试官的主观认定。他们把认知能力和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压低,或把它交由高校声望和另一场面试来界定(这是一种没有实际考察的幻觉),这样留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轻松和愉悦的:找到在谈话中具备与自己类似的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又从行止上谈得来的人。而这些“轻松”条件的背后,是对知识的严苛要求。说话看似简单,但想做到行云流水,却像学习乐器一样需要长期的操演,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群体、阶层的社会符号。以精英阶层、白人、男性为主体的评审人规定了哪些知识是正确的,这为类似背景者创造了优势,而底层出身、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劣势,机会不平等加剧。

招聘的最终决策常被解释为面试分数,但事实上是个不足为外人道的“黑箱”。EPS公司的招聘委员会通过“校准-表态”机制对那些模棱两可的候选人做出决策。所谓“校准”,是利

用刻板印象弥合面试官的不同意见,取得一致性观点;所谓“表态”,是看评审人中有没有人愿意拉下脸面来为一个候选人强烈发声。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属于优势群体,并至少与一个面试官相契合的面试者,才会成功“复活”。最终的判定不是用客观性纠正主观性,而恰恰是主观评定登峰造极的时刻。

社会学家把就业选拔简化为两种解释框架。“竞争性流动”把工作机会作为完全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回报,而“荐举性流动”是通过当前业内精英的挑选确定候选人。人们往往假设一种以竞争性为主、荐举性少量补充的局面。里韦拉的研究揶揄着这样一个事实:竞争性的本质是经过包装的荐举。

精英的包装过程是这样的:上层出身的学生可以获得好的教育资源,帮助他获得知名高校的文凭和学习成绩;家庭给他的社交风格、课外活动资源和高质量实习机会,帮助他获得更好的社交能力、价值观和进取心。

在招聘中,同为精英的面试者按照自己的样子寻找和他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候选人,表现出了与他自己类似的(也是让他满意的)品质。简历筛选和面试考核,是一种竞争的形式公平,但招聘的人事工作性质注定逃不开

人性,所以招聘者以自己的主观为客观在所难免。

获得青睐的学生具有正确的知识,这其中既包括“制度性文化资本”,也包括“具身性文化资本”,它们都是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的产物。具有正确知识的学生获得了 EPS 工作,这是否属于“知识改变命运”?应当说,是他的出身通过文化资本的投资,给了他易于获得正确知识的命运,而后正确知识又反过来帮助他延续了命运。招聘过程与其说是精英的重建,不如说是精英的再生产。能够“改变”命运的是由精英阶层定义的正确知识,而这种知识,不是同阶层出身的孩子就很难获得。

虽然美国主流社会强调个人奋斗,但书中的案例指出, EPS 公司招聘本质还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游戏,这是作者发出的最重要的警告。当不公平的招聘通过结构化形成了一种制度,以“自由流动”、“个人奋斗”之名行社会分化、阶层固化之实(尽管不是出于主观故意),这种看不见的壁垒更加难以打破。

[(美)劳伦·A·里韦拉著,江涛,李敏译:  
《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 诗讖与文讖

◎ 甘建华

说起这事儿真有点玄乎。之前,我从不知道李成录何许人也,更没有读过他的什么文章。偶然在网上见有纪念他的一篇小文,称其生前曾任青海省海西州茫崖行委主任、冷湖工

委书记,在多家报刊发表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茫崖、冷湖两地乃我旧时工作、生活的地方,暗中思忖,是否为其在《柴达木文事》一书中留个名字。因其文名并不大,其间诸事缠身,

但他好像知晓我的心思，非要挤进这本书，冥冥之中竟以各种方式闯入视线。

2015年5月20日凌晨，李成录忽然托梦于我，将海西州群艺馆馆长乌席勒微信指点一下，倏忽不见踪影。猛然惊醒，想那蒙古族人乌席勒我也不曾见过，只是早几天应邀给即将创刊的《德都蒙古》杂志发去一篇文章，州文联负责人告诉我乌席勒主编的手机号码，双方微信随之开通，但怎么就会这么巧呢？打开乌席勒微信一路查找，见其清明那天有一首短诗悼念李成录，并有李的诗集书影。

李成录生于1963年，海北藏族华热部落人，藏名华瑞·漠然尖措，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汉语系，民族学在职研究生，青海省作协会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入柴达木盆地工作。2007年出版诗集《瀚海深处孤屋的灯盏》，收入八十六首诗歌及十一篇散文，网上有其《黑夜里我给你写诗》，指明写给其爱人。书名及诗题均为不祥之语，“瀚海深处孤屋”那是什么地方？“黑夜里写诗”那是什么情景？不是坟墓、阴间又是什么？

蓦地想起历代“诗讖”之说，这一中国古代诗歌中特殊的文学现象。诗讖最早出现于魏晋，到宋代已有专门的整理、记录诗讖的诗话、笔记和小说，其内容主要为诗人的生死年寿和仕途穷达，可分为吉讖、凶讖、自讖和他讖四种。《世说新语·仇隙》之一记载的便是最早的诗讖：“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讖。”

最著名的一则诗讖则与隋炀帝有关。传说他成功开凿大运河，乘彩舫龙舟下扬州，某日忽得一诗：“三月三日到江头，正见鲤鱼波上

游。意欲持钩往撩取，恐是蛟龙还复休。”又作《索酒歌》曰：“宫木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焰奕红辉。”虽然诗写得一般，炀帝却自鸣得意，即刻交付乐工谱曲，令随行的宫女们合唱。然而识者却暗讶为不祥讖语，因为李渊其时已渐成势，“鲤”、“李”二字同音，而前首诗中有李渊化龙之隐喻。后来李渊大军攻入京师，炀帝躲入迷楼自杀，唐兵将迷楼付诸一炬，正应了后诗之句。

唐朝诗人崔曙早岁孤贱，曾在终南山随道士邢和璞学法术，后沦落定居宋州（今河南商丘），曾在少室山读书。殷璠评其诗“多叹词要妙，情意悲凉，送别、登楼，俱堪泪下”。开元二十六年戊寅科（738），殿试时作《奉试明堂火珠》诗，玄宗看后大为赞赏，取为状元，官授河内县尉。可惜翌年病歿，唯遗一女名星星者，世人皆以为“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是其自讖。

《唐名媛诗小传》载：“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父郾，因官寓蜀。涛八九岁知声律。一日，父指井梧曰：‘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令涛续之，即应声曰：‘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父愀然久之。”薛涛后来流落蜀中，为一代名妓，两句诗无意中成了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又有《春渚纪闻》载：“建安暨氏女子，十岁能诗。人令赋《野花》诗，云：‘多情樵牧频簪髻，无主蜂莺任宿房。’观者虽加惊赏，而知其后不保贞素。竟更数夫，流落而终。”

五代楚王马殷、马希范时，江西廖融避乱不仕，与兄廖凝卜隐南岳衡山，号衡山居士，与逸人任鹄、潘若冲、王正己、凌蟾、王元、杨徽之等为诗友，互有唱和。晚年作诗云：“云穿捣药屋，雪压钓鱼船。”自解曰：“屋破而云穿其中，无人也；船为雪压，无用也。”遂以为不吉之兆，“病之，六十日后果卒”。

北宋绍圣年间，秦观坐元祐党籍，先是发配湖南郴州编管，后贬谪广西横州（今横县）。途经衡州（今衡阳），太守孔毅甫见过他，便对

人说：“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秦观曾写一阕《好事近·梦中作》，内有“醉卧古藤阴下”，仅此一句中讖，后来果真卒于藤州（今广西藤县）。

再说近现代以来各种故实。1926年4月19日，徐志摩发表散文《想飞》，内中有句“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并描述了飞机爆炸的幻想。1931年11月19日，他乘飞机从南京前往北京，途中在济南南郊遇难身亡。郭小川于1975年写了一首《秋歌》，内有不祥的讖语：“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次年10月18日，在河南安阳招待所一楼房间，郭小川服安眠药后入睡，因未灭的烟头点燃衣被窒息而亡。1996年夏天，汪曾祺给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画紫藤并题诗：“瓔珞随风一院香，紫云到地日偏长。倘能许我闲闲坐，不作天南烟草王。”本是一时戏言，孰料两年后，年已古稀的褚时健因经济问题系狱。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金克木有本专著叫《书读完了》，意思是说无书可读了，不久遽尔离世。他的临终遗言倒是有趣：“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我将藏族人李成录托梦这则笔记发到微信，引起海内外诸多师友惊悚骇异。青海知名作家王文泸叹息道：“你说的事情确实罕见。为了青史留名，竟然托梦于生人，实在可叹！文人之重名，一至于此乎？而‘诗讖’一说，自古屡见不鲜，难以用‘巧合’二字做简单解释。清代雍正时期文坛泰斗、吏部尚书尹继善去世前一月，让他的几个儿子做送春诗，幕友解吉庵写的是：‘也知住已经三月，其奈逢须隔一年。遗爱只留庭树好，余晖空托架花鲜。’尹尚书大加叹赏，动笔加圈加点。尚书歿后，众人再读，方知无意中写的全是讖语。不管怎么说，既然李成录如此执着，你就满足他的愿望，让他进入《柴达木文事》一书吧！”又接现居海南岛的大学同学凌须斌来电，说是在柴达木盆地工作期间，与李成录是酒友兼文友，熟谙其人其事。李

身高一米八〇，长相看似粗犷，内心却很柔婉，喜爱诗歌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当与朋友相聚，浮一大白后必定朗诵自己的新作，以“官员诗人”自矜。2008年夏天赴省城西宁开会，在橡皮山往青海湖之间遭遇车祸身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海西文学现象”一时领青海风气之先，“带头大哥”即是高澍。高澍出自山东曲阜大宅门，祖辈迁居天津卫，叔父即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他于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发动机专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发配到柴达木汽车修理厂，介绍信上写着“按工人使用”，于是再次发配到车间当车工。他利用业余时间搞文学创作，短篇小说《琴心》发表于《瀚海潮》1978年创刊号，是青海省“伤痕文学”出现最早的几篇作品之一。改革开放以后，担任海西州文联副主席、《瀚海潮》杂志主编，1987年5月调任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在那个偏远落后的地方，他发下了宏大的誓愿：“办中国地州一级第一流的台站。”孰料新官上任刚满百日，酒后骑自行车回家，刚好撞在一个也是酒后驾车人的汽车上，当场死亡，据说那个司机也畏罪自杀。

青海作家井石告诉我，高澍生前出版短篇小说集《活佛》，内收《活佛》、《新荷》、《急转弯》、《琴心》、《风起了》等九篇，此外发表过中篇小说《漠上》、《隐忧》、《带血的玫瑰》、《淡水湖，咸水湖》等，1986年加入中国作协。还有两篇中篇小说的名字，现在看来极不吉利，中了文讖：一个是《最后的红蔷薇》，在他临去世前发表；另一个赶发出来时人已离世，名为《死亡之吻》。

文讖、诗讖是什么？是所有作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宿命。试想一下，如果你写了什么，你的命运也注定发生什么，那是不是很恐怖？战国时代，荀子发出“言有招祸也”的警告，其高弟韩非竟以《说难》名篇，首创“逆鳞”之说，指出“因言致身危者七”。秦王嬴政为了得到韩非而出兵攻打韩国，李斯因妒其才而将其谋害，

《说难》遂成文讖。《三国演义》第三回写道：“先是洛阳小儿谣曰：‘帝非帝，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邙。’至此果应其讖。”南宋状元文天祥曾有一篇文如其人、在某种意义上犹如文讖的经义——《事君能致其身》其中说：“委质而为人臣，当损躯以报人主。”似乎看到了若干年后自己的结局。即便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宰相之职，文天祥依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民国时期，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三个大学问家，却因行为怪僻而被称为“三疯子”，其中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劝黄侃及早著书传世，黄侃却非要坚持“五十之前不著书”。1935年4月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书赠寿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黄侃见联中有“绝命书”三字，大为惊诧。是年10月6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两天后下世。章太炎因联语成讖，余生痛悔不已。丁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瞿秋白曾预言她“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后来的人生果然几度坎坷荣辱相伴。

1988年7月下旬，诗人海子途经柴达木盆地，写了一首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诗中两次重复“唯一的，最后的”这种极端的表达，意味着海子在这一天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诗歌和情感，也失去了创作的天才，剩下来应该干什么，还用得着我们费神猜想吗？果然，翌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戕，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再说吾乡衡阳先贤、世界华文诗坛泰斗洛

夫先生，也曾有过文讖和诗讖，而许多研究者迄今都未感觉到。还在十五六岁读初中的时候，洛夫在衡阳《力报》发表散文处女作《秋日的庭院》，却取了“野叟”这样一个老气横秋的笔名。大约是2011年秋天，借其回乡省亲的机会，我曾当面询问他笔名的来由，他笑呵呵地说：“可能是受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启发，也有韦应物‘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影响。‘野叟’就是四野流浪的老汉——可不就是吗？先是从衡阳到台湾，再从台湾地区到加拿大，我现在成了一个失国的老头了。”在洛夫所有的诗歌中，《边界望乡》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曾无数次被两岸的诗评家点评过。1979年3月16日上午，访问香港的洛夫在诗人余光中的陪同下，去关界落马洲遥望内地。“当时轻雾朦胧，我从望远镜中望过去，见到……河山猛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就好像狠狠地被打了一拳。这就是数十年不见、日思夜想而又回不去的……家园吗？耳边响起鸬鹚鸟的啼叫，声声扣人心弦，我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时才体会到什么叫‘近乡情更怯’，什么叫‘有家归不得’”。同年6月3日写下诗歌《边界望乡》，表达游子怀乡咫尺天涯的伤痛、落寞和无奈。名句“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后来不幸成了诗讖。2009年10月底，省、市、县三级在衡南县城云集镇，轰轰烈烈地举办了首届洛夫国际诗歌节，并为洛夫文学艺术馆、洛夫文化广场奠基，天下咸知，欢欣鼓舞。孰料“萧何们”各贪天功，互相拆台，暗中使坏，致使建好的洛夫文学艺术馆被挪作他用，门前的洛夫文化广场也被强行更名，“成了一场盛大的骗局，令我无颜回乡再见父老乡亲”（洛夫语）。

孙蓉蓉《诗歌写作与诗人的命运——论古代诗讖》一文认为：“诗讖其实不是讖，是读者在对诗歌的别解字句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

些看似偶然的巧合又带有某种必然因素,反映了古代文人对于生命与仕途问题的关切与焦虑。而对诗讖的评论和观点,又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古代诗讖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体现了传统天命论的思想、语言禁忌的影响和‘微言大义’的说诗传统的深层积淀。”说白了,诗讖、文讖的主观意识十分强烈,不无偶合、附会和推论,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学界视为“旁门小道”和“怪力乱神”。

在高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人们接受信息更加全面,也愈来愈清醒理智,对于任何事情都能辩证地看待,已不再一味地相信和盲从。《孟子·尽心下》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宋代文学家洪迈《容斋随笔·诗讖不然》亦云:“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讖。白公(白居易)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衡南洛夫

文学艺术馆和洛夫文化广场,经过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洛夫先生去世一年多以后,终于被新任县委书记提上议事日程,已经进入装修设计阶段,诗城云集与洛夫先生的名字再度联系在一起。这也印证了清初傅山题画梅诗句——“人力能补天地缺”。

因此,我特别推崇湖湘书法名家何满宗倡导的“写吉祥,颂吉祥”,以“德”“福”“寿”弘扬我们的美好愿景。为了诠释这“吉祥三字”,何满宗又作《吉祥三颂》,分别为《大德颂》、《万福颂》、《长寿颂》。《大德颂》:“君有德,志高洁,仁爱惠恩泽。敬老尊贤礼天下,心境如秋月。”《万福颂》:“家和谐,人亲切,祥瑞喜相接。欢畅心海长波涌,福源永不竭。”《长寿颂》:“慈悲怀,清风节,善行圣于雪。德润众生无量寿,时空恒飞越。”并有副歌:“寿比南山久,天风颂大德,洪福万民悦。”但愿吾友的《吉祥三颂》,能给天下文朋师友一点启示,并给千家万户带来幸福美满——扎西德勒!

## 廷杖小议

◎ 曹瑞涛

皇太后邓绥手里,可随着安帝刘祜年岁日增,就有不怕死的官员站出来请太后退休,杜根即是其中之一。史载:官阶为郎中的杜根和另一位同级官员一起上书道:“帝年长,宜亲政事。”尝到权力滋味的邓绥干得正带劲,闻听此论,火冒三丈!下令将二人“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然后抛尸城外。杜根命大,没被打死,在袋子里慢慢苏醒过来。不过邓绥做事很细致,专

—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临刑前题诗狱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诗第二句用了东汉时杜根的典故,东汉王朝自公元105年和帝刘肇驾崩至公元121年间,实际控制在

门“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这出死里逃生的宫廷戏真是惊心动魄，而朝堂上当场杖杀大臣的做法也着实恐怖。

秦国嫪毐之乱后，齐国客卿茅焦曾指控嬴政“囊扑二弟”，说明早在战国就有了这种将人装进白绢大袋子里痛打的“扑刑”。东汉初年，温和敦厚的光武帝刘秀对作为宫廷秘书的“尚书”们也频频使用扑刑。顺帝刘保时，尚书令左雄曾因大司农刘据遭捶扑而上书曰：“九卿位亚三公，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则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可见，到了东汉明帝刘庄时，朝廷九卿高官也难逃扑刑的伺候。邓绥敢用此刑，袭旧制罢了。

皇家在金殿上捶扑大臣之法东汉便有，偏偏明廷的廷杖格外出名，而这野蛮之刑也非洪武皇帝首创，“实则学的是元朝的办法”。但后人提及皇帝当朝打人，首先想到的总是大明朝，这确是委屈了大明，不过明之廷杖的名气既然如此大，自然有标新立异足令之前其他殿堂上全武行表演都黯然失色之处！

乱世不论，明朝之前凡太平时代捶扑大臣基本都是极端事件，明朝却不同，些许小事让皇帝不痛快，大臣就可能挨上一通板子。洪武九年（1376），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奏折，朱元璋“叫人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大发脾气，把太素叫来，打了一顿”。第二天，接着读到后续的部分才听到具体意见，觉得很不错，又将茹太素找来表扬了一番。空话连篇惹人烦，可因此责打大臣，打完后又接着奖励，廷杖之刑在明廷确有点家常便饭的味道。

再者，古时捶扑大臣，就算群臣愤愤不平，真正挨打的也就一二领头者，杀鸡儆猴罢了。明朝廷则不然，往往一打一大片，规模最大一次在嘉靖三年（1524），朱厚熜为了将自己生母尊号“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中的“本生圣母”四字去掉，与朝臣发生冲突，七月戊寅（8月14日），“廷臣伏阙固争，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

十四人锦衣卫狱。癸未，杖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朝堂变成大开杀戒的刑场！

明朝中后期太监当权，廷杖大臣又夹杂进不少宦官的创意。成化之前，受刑之臣虽无古代扑刑用的大袋子遮体，至少还让穿着衣裤，甚至还能“用厚绵底衣，重毡迭靶，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得势的刘瑾将当朝大臣扒了裤子往死里打，刘瑾倒台被凌迟后，这种打法依然沿用不废。至于平常廷杖，打轻打重，很多时候就全得看掌刑太监们的脸色了。

有明一朝在朝堂上将大臣这样随时打、一齐打，太监们掺和着打的廷杖之刑，实为前朝未有之景致！明成祖朱棣期间廷杖虽被废止，但并非永乐菩萨心肠，只因靖难之后杀人太多，朝堂上才故意摆出个礼贤姿态，洪熙、宣德两朝短短十一年间守成未变，到了英宗时便急不可待地恢复了廷杖之刑，从此直到明亡。

## 二

大明重臣张居正写过一篇鼓励自家孩儿力学以求科考登第之文，其中特别强调说：

中唐以后，进士一科最为荣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荫为备身千牛；或劝之应举，德裕言好驴马不入行，后亦为宰相。……若本朝则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宣德以后，独重进士一科，虽乡举岁贡，莫敢与之抗衡，而大臣恩荫，高者不过授五府幕僚，出典远方郡守而止，即有卓犖奇伟之才，若不从科目出身，终不得登膺仕，为国家展采宣猷矣。

张居正时为内阁首辅，其子入仕途竟只有科考一条为正途大路，其他途径着实逼仄。此文与朝堂上的廷杖之刑似无关联，但又透露



出：有明一朝，士大夫阶层与皇权间虽然硬冲突不断，绝对实力上却是大不如前！莫说六朝时连皇帝都不一定巴结得上的豪门士族，就是到了早已开科取士、豪门大族屡遭排抑的中唐，李德裕凭父荫仍可拜相，根本不稀罕什么科举功名。然而，随着唐朝的覆亡，乱世中的旧贵族莫不如风中残叶，难逃凋零的厄运，而新树立的皇权则趁机逐渐增强。

元、明之际，蒙古贵族一溜烟跑回大漠，中原巨室则因兵燹大半被毁，登基后的洪武皇帝再添把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的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经过这般彻底的大清洗，朱家王朝巩固的同时，莫说显贵，就连显贵的后备军亦元气重伤，神州大地一派均贫富的景象。

可治国总不能靠皇帝一人直接指挥千百万庄稼汉，自中央到地方，部、院、省、寺、府、监以及州、县的各级官僚，没十几万人休想让庞大帝国正常运转。元朝以吏治国，吏治大败，朱元璋是从最底层干上来的皇帝，对此深有体会，前朝旧官吏总令他不放心。起用民间的读书人吧，虽然早在洪武元年（1368）就开科取士了，可四年后便被叫停，“开国皇帝认为这些新科进士太书生气，当官还不够成熟。他抱怨说：朕诚心求贤，但天下只以舞文弄墨之辈应之，不合朕意”。这一停就是十数年，而明初政坛的血雨腥风也吓得文人观望不前。

为了度过这段非常时期，明太祖只得通过“国子监”来培养自己的新官僚队伍，其生源由皇帝指派分发的“官生”和地方保送府、州、县学的“民生”组成，开始时名额各半，但“后来官生入学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在学人数为例，总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里面官生只有四名”，国子监成为广泛训练民生当官的机构。

国子监的监规为钦定，极为严厉，一旦犯规便要挨打，其“办公处叫绳愆厅，特备有行扑红凳二条，拨有直厅皂隶二名，‘扑作教刑’，刑具是竹箠，皂隶是行刑人，红凳是让学生伏着挨打的”。在监规中“最严重的一款是‘敢毁辱师长，及主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洪武二十七年（1394），监生赵麟不堪虐待，出壁报抗议，“照学规是杖一百充军。为了杀一儆百，明太祖法外用刑，把赵麟杀了，并且在国子监前立一长竿，枭首示众”。于是，国子监门前又立了根长竿，直到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微服出访，来到早已破败的国子监门前，看到这根怪竿子，“弄糊涂了，问明白说是挂学生子脑袋的。他说：‘学校岂是刑场！’而且，‘哪个学生又敢犯我的法令！’才叫人撤去。这竿子一共竖了一百二十六年”。

这些前头没有遮阳树、后面没有靠背山的“民生”，在板子声里教练成官，不仅皇家视其为可随意敲打的小门生，连他们自己也将挨打当作正常。洪武十五年（1382）以后科考又被恢复，刘基、詹同之流的旧文人还觉得对大臣施以廷杖之刑有辱斯文，国子监出身的新官员却已是安之若素。

### 三

明太祖时推广棉花种植，河南、河北成为原棉供给中心。明中叶起，素为鱼米之乡的江南也开始将大片水田用来种植棉花类经济作物，一种棉花，水田尽毁。万历年间棉价下跌，许多江南农民转入手工业生产活动中，“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伴随工商业的发展，江南一带乡绅阶层的实力不断壮大，皇权独大所依赖的明朝初期那种小民社会无形中发生了变化。

另外，帝王欲以文治天下，怎能总一个“打”字招待文人，除大棒外自然还得有很多甜头才行。大明官僚后备队在太祖时称“廩生”，宣德年间又设“增生”，之后又增设“附生”（三者即民间所谓“秀才”）。太祖督责官员虽严苛，对“廩生”却不错，每人每月规定可领米一石，鱼肉盐醢都由官供给。后来的“增生”、“附生”虽无东西可领，但与“廩生”一样，“一家之内，除本身外，优免二丁差役。换一句话说，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学，可以三人免役”。秀才尚如此，功名进阶者及退休官员享受的特权就更多了。

明中后期，皇室膨胀、太监当道，民间赋税压力持续增加。鉴于读书人拥有的经济特权，“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庠生”即秀才，这种现象被称为“投靠”，顾炎武对此专门描述道：“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与那些财大气粗却无功名护体的地方乡绅相比，有功名的文人日子过得滋润，政治上还被赐予一定的话语权，这点特权虽不足以抗衡皇家，但当遭受权力压迫时还是能够通过一定言论渠道进行抗议，遭到同样迫害的平头百姓因此将他们看作为民请命的舆论代表，其社会声誉不断提高。

有明一朝许多利益上的斗争，“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黄仁宇语）。大明政坛上无论站在皇权一边的宦宦、豪强、勋戚，还是代表中小乡绅的诸多朝臣、士生，大都娴熟掌握此种问题转化的手法，具体套路总是先抢占道德制高点，然后架起道德的重炮猛轰对方。如此一来，就连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每每被上升成大善与大恶之间绝无调和可能的血战。形

势严峻，皇权一方顺手拎出廷杖的大棒，再自然不过。

孟森先生曾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大臣在朝堂上被扒了裤子打个半死，这般野蛮做法怕是不配称作美俗。所谓君王与臣下争意气，明初之际任性的君王和唯剩骨气的大臣间相争，倒有那么几分意气用事的意思，可随着社会日渐复杂，各方千头万绪的利益纠葛被置于善恶不两立的简单解决模式中，使得大家都没了在利益问题上讨价还价的余地，从而失去了各方都让一步以便在制度上进行改良的可能。最终，君臣谁都输不起，皇家手提大棒以死相逼，大臣则高扬“名节”以死相抗！在这种缺少缓冲——更妄谈建设性——机制的形势下，各派政治势力间只能是硬碰硬地恶斗。

#### 四

清人修《明史》，论及前朝刑法之弊时说：“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看来前朝再糟糕，前朝皇帝也不能随便骂，“良可叹”的只是“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而已。当然，明太祖以此非常手段处置王公大臣，似乎也不是全无道理，如吕思勉先生所云：“官僚阶级的利益是和人民相反的，要保护人民，其要义就在于约束官僚，使不能为民害，若并官僚阶级而亦放纵之，那就是纵百万虎狼于民间了。”孟森先生亦指出：“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铃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

## 《数字身份》序言

◎ 姚 前

什么是身份？

哲学三大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其中第一个问题“我是谁”指的就是身份。身份是用来区别“我”和其他主体的标识。世界上没有同一片树叶，每一个“我”均不一样，因此，不同身份也有差异。如何从身份识别出真实的那个“我”，验明真身，则成为用身份建立对“我”信任的首要一步。熟人社会，以现实的“我”为基础，靠“刷脸”，某种意义上，脸就是身份。陌生人社会，则须依靠一定的技术手段或制度安排，来保证人与人之间对相互身份的认可。

先是纸质身份系统，可以通过反映个人独一无二特征的照片、指纹、手印等鉴证个人信息，也可以是带有公信力印章的书面文件，通常由有权机关特别印制（印章）、发布和管理，较难伪造，从而解决了陌生人相互往来的身份识别问题，构成现代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近年来出现的“我是我”的证明要求，虽然荒谬，但反映了时至今日有权部门对身份的增信依然在发挥关键作用。除此之外，通过交叉验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征信机构、学校等可信部门提供的个人信息，亦可证明身份。

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扩展了人们的社交范围，出现了在网络世界的虚拟身份。在社交领域，真实身份或许不那么重要，匿名或假名反而增加了上网冲浪的趣味，就像那句话说道的“你不知道

在网上和你聊得津津有味的‘人’，到底是一只狗还是一只猫”。但当具体到线上支付、线上交易、线上金融等活动时，事情则变得严肃起来，必须将网络世界的虚拟身份与真实的真实身份映射起来：一是为了明确线上支付账户资金余额的所有权以及交易相关债权债务关系，保护主体财产权利；二是为了落实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要求，防范和遏制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就像银行账户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证券账户实名制、手机卡实名制一样，网络支付实名制成为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管的重点内容。根据我国现行规定，第三方支付用户的余额支付限额与账户的实名程度呈正相关。比如，对于最高限额的Ⅲ类账户，要求支付机构或委托合作机构以面对面方式核实，或以非面对面方式通过至少五个合法安全的外部渠道，进行身份基本信息多重交叉验证。

“区块链”被认为是继大型机、个人电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之后计算范式的第五次颠覆式创新以及下一代云计算的雏形，有望像互联网一样彻底重塑人类社会活动形态，实现从目前的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的转变。“区块链”是新一代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技术雏形。应该说，“区块链”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原教旨主义”的“无政府”模式，必须考虑到合法合规上的要求，否则不仅容易沦为暗网、非法交易网络、洗钱“天堂”，而且难以深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真正发挥出其应有价值。为此，必须先解决

KYC(Know Your Customer)问题。

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环境下,用户的公、私钥体系取代传统互联网的账户体系。用户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私钥本地生成,非常隐秘,从中导出公钥,再变换出钱包地址,自己给自己开账户,不需要中介。公、私钥成为用户可以自证的身份,我们称之为数字身份。与传统互联网的虚拟身份一样,数字身份并不是用户真实身份,它是依靠加密技术的匿名化身份。“区块链”解决了线上的可信问题,但解决不了线下的真实性问题。因此,数字身份的识别与真实身份认证成为关键命题。或许,有几种实现路径:一是将数字钱包与运营机构的账户绑定,比如银行账户+数字钱包,通过银行账户的实名制实现数字身份的实名制;二是在区块链中设置有权机节点,由有权机关直接在区块链上提供数字身份认证服务;三是区块链+监管链模式,以区块链管理区块链,在监管链中开展数字身份认证,进而服务业务链;四是基于区块链信息共享和安全隐私计算,通过对多源的身份信息的交叉验证,实现对真实身份的验证等等。

身份管理如此重要,以至于世界各国都将其作为最根本的社会治理制度之一。在我国,自殷商以来就有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征兵、赋役、管制的基础。户籍管理不光中国有,国外也

同样有。外国的户籍管理多叫“民事登记”或“生命登记”、“人事登记”,叫法不一,但基本上与我国的户籍管理大同小异。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管理依托于人口登记,那么数字世界中的数字身份又该如何展开、如何维护、如何管控呢?目前的公、私钥体系在大规模的商业应用环境下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总体看,关于数字身份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才刚刚开始,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包括数字身份使用的真实性问题(就像证券账户出借,非本人使用,如何认定,如何防止,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问题在区块链中也一样存在)、数字身份的隐私问题、数字身份的安全问题以及相应的密码学应对方案等等。

汪德嘉博士的《数字身份》一书以数字身份认证和隐私保护技术为主要内容,全面介绍了新一代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认证和隐私保护系统的设计理念与实现思路,深入研究了运用区块链技术解决身份认证与隐私保护问题;同时,对如何进行行业应用也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落地思路,并介绍了多个行业的成功案例。鉴于该书的理论性和实用性,希望它的出版,可以对信息安全、金融科技、监管科技的从业者和研究者有所助益。

是为序。

## 蜀江水碧蜀山青

◎ 蒋 蓝

2012年开始,因为写作《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晚清西南》一书,我走访过近百个村落,但去探访广州市花都区大布乡官禄布村的情景,却分外清

晰。“天王”洪秀全的饮食起居与悟道方式,在多年以后依然历历在目。

大大小小一共十八座山丘呈丰月形环抱村子,左边有天马河和大沙河交汇,右边有山峰拱

卫,前面田畴广阔。青龙、白虎守护下,洪秀全故居和洪氏宗祠前有一口半月形的池塘,堪輿学称为“水聚明堂”。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禄布“施”形成一道窄门,洪秀全并无另外出路,只好在青灯苦读之中消磨生命。他不得不从众,在读书人必须搏击功名的焦虑症影响下,心力日益憔悴。那时,他还叫老老实实的乡野名字洪火秀。火秀第二次去赴广州考秀才的时候遇见一个叫梁发的读书人,时间是1836年春天。梁发是传教士,他拿九本一套的《劝世良言》送给了洪火秀,但考试失败的火秀回家就扔在一边,迅疾被重重叠叠的孔、孟之书压倒,多年不得翻身。

直到须发早早半白的他,1837年第三次应试而继续名落孙山,洪火秀才把这套宝书翻出来,一读,再读,醍醐灌顶,恰在豁然大悟的限度来临之际,他突发高烧,玉山倾倒,轰然扑地,一睡就是四十多天……昏睡,成为他最后完成悟道的闭关时刻。

昏迷是表象,神速学习才是实质。后来据考,洪秀全做了一个悠长的、具有章回起伏的怪梦,文献里称之为“丁酉异梦”:他看见一龙一虎一雄鸡走进屋子,接着一群人吹吹打打,一队黄衣童子翩然入室,并用一乘华丽的轿子将他抬起,不断升高飞入云端,最后来到一个光明璀璨之地。洪秀全见到了一个身材伟岸、衣着龙袍的长者,他将洪秀全的肚腹轻轻剖开,取出污秽的内脏并易之以新,伤口却倏然而愈,不留痕迹。洪秀全目眩神迷大感受用,留着金色胡须的威严长者自称是他的父亲,告诉他:人间正受到妖魔的祸害,他的任务就是下界前去斩杀妖魔,拯救人间于水火。为帮助他战斗打怪,威严长者给了他一把名叫“云中雪”的宝剑,并派他的兄长耶稣前去助阵。在炫目的光芒中,洪秀全挥舞宝剑,耶稣捧着发光的金印,神兄神弟飞过三十三层天界,投入到斩妖除魔的战斗……

清醒过来时,这个人已经是洪秀全了。

在研读明末史料过程中,我发现,大西王张

献忠的种种言论与行为,格外地奇异。

1644年年末,在两位来自西方的“天学国师”淳淳教诲下,大西王张献忠对他们奋力鼓噪的天主教义不以为然,你的主是你的主!他不喜欢政教合一,那“黜得很”!他喜欢武装到底,把长枪大炮扛到底。但他的思想如泥鳅拐弯迅速“入巷”,对于距离中土智慧极其遥远的天文学、算学、地理学等等绝学,很快就登堂入室了。听课过程是一个思辨的过程,张献忠有时凝神端坐,虎目洞悉虚实,有时背手踱步,步步生莲……置身窄逼的西蜀,却可以放眼世界。每每听完洋人的学术讲演,他转身就与左右跟班辩论,反复学习深刻体会坚决贯彻落实。他融会贯通舌灿莲花,忠实于将飘拂的学问如何落地开花结果。驴日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啊!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经过半年学习,他对“天学”已经颇有心得。孺子可教——不不不,是雄才大可深造也!两位“天学国师”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老皇上“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分明已是一代明主轰然崛起西蜀之兆,足以支撑破碎山河。

张献忠在洋人铸造的浑天仪、地球仪、日晷、提供的书籍之间来回穿梭,逐一对位,将堪輿学的天象分析以及《孙子兵法》的诡道,与西方科学进行了创造性的完美结合。这一空中对接的结果,使得他必须在连续的形而上领域完成转换。

他的主业是统摄堂堂大西国,日理十万机,“八小时之外”才是努力学习的唯一机会。他不得不废寝忘食,以至于用脑过度,又猛喝烧酒希望激发灵感,导致产生严重幻觉。

要干啥子?!大西皇帝拍案而起。

他下令百官抬头齐齐仰视天空。大家按照圣旨的吩咐,仰望天空,小心翼翼地说什么也没有看见。黄虎公然说:“今日天不晴朗,故尔等未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

子独见,以便出来代天行事。”将百官看不透天机的原因归结为二,一是天气不好看不清,二是只有天子才能看见。尔等不是天子,怎么能看见?

这分明是他深度谵妄的临床症状。

为了获得身心的彻底解放,他抛弃了皇冠与龙袍,长袖飘飘,展开昔日铁匠游身熔炉间的身法,逡巡其间,体察幽微。他正敞开着箭衣,胸前露出一团浓黑的胸毛。

“皇冠落地类转蓬,空教胡马嘶北风”。眼下,明朝、南明、大顺、大西正在化为历史的烟尘,随风而起,随风而散。抓住时代机遇与天机合一,成为黄虎洞悉本质的捷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断接收着天神发来的高度绝密、只有他才能破译的最高指示,奋笔疾书,记录为一册从不示人的《天书》。他考虑让洋人着手翻译出版,向西方世界宣传大西国宏旨,自己一心向西,要向西方传播东方帝国的超迈文化……1647年元旦翌日,黄虎的神志还没有从浑天仪的神启中彻底返回现实,那是一个恍惚而晦暗的早晨。早餐尚未结束,张献忠即在西充县凤凰山顶的荆棘林中殉难,这部记载大西国最高语录的《天书》就此失落,也许是被上天收回了。重庆师院一位教授撰文指出:“可惜这本书的详细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但可断言是一部别开生面、富于哲理性的著作。”教授已经“断言”了,让我怀疑教授已经得到了梦中神授。

这就意味着,张献忠敢于“拿来”,敢于在四川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天府之国成为他的试验田。呵呵,“天兄”在上!可是对于“天学”一窍不通的洪天王,显然只能当张献忠的学生。历史学家陈旭麓指出:“洪秀全搬来号称独一无二的真神洋上帝以扫荡一切土菩萨,义和团则动员仙佛神怪等一切土菩萨以对抗(驱逐)上帝。”(《浮想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张献忠心目中的“天”,其实还是中土的。

苍天之下,天府之国的膏腴土地不必一味生长懵懂无知的农作物,也可以长出森林般壮阔的刀枪剑戟。那是一派多么激动人心的钢铁风景。

著名人生存论心理学家E·贝克尔认为,死亡恐惧是人类心理中最为普遍也最深刻而隐蔽的存在性不安,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之伤。自幼形成的生存恐惧与粗粝的自然空间,占据着张献忠的全部生活,他对命运的安排从来就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总是下意识地规避一切可能产生顺从现实的矛盾性因素,肯定一方的同时又否定另一方,做出结论之后又将它推翻,使他的言行以分裂、变形的形态呈现在历史面前。张献忠、洪秀全之类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一般初期都反对个人崇拜,反倒天上和地下,无非想自己宰制世界和历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显然是小儿科级别的。顺我者亡,方显英雄本色。张献忠身上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克里斯玛型领袖发展到极致之后,刀头倒转,自然而然出现的严重自我分裂,这是一种如影随形的权力伴生物。他的晚期性格中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悖谬,甚至他从西方的天文、算学、地理学识中穿越到《孙子兵法》的诡谲,也常常体现为分裂的人格和分裂意识。

作为蜀人,我一直有研究、记录大西皇帝言行的愿望。置身蜀天与蜀地,我更有责任记录这一段促使天地翻覆、山河变赤的历史。

我发现,张口“论从史出”、闭口“以论带史”的学术中人,在针对一些历史人物研究中,可以发现他们严重的人格分裂。比如,在针对张献忠入川、建立大西国的前后事态,史料就是这么多,涉及的书出自欧阳直、彭遵泗、傅迪吉、费密、沈荀蔚、李馥荣、毛奇龄、吴梅村、顾山贞、张焯、李昭治、利类思、安文思等等人之手之口。这批学者苦心孤诣从中发现有利于巩固自己的论据,并一再强调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无可替代的亲历性价值。当然,他们还没有放过田野考察——对民间里那些讴歌黄虎以及大西军的民谣、儿歌的苦心收集与向壁虚构……

而面对一模一样的同一批材料,凡是遇到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描述,遭遇到那种可能“漫化、矮化、丑化、污化”大西朝的论据,则千方百

计“论证”为道听途说以及后来柄权者授意篡改。实在没法了,就红着脸说,这是“手民误植”的结果。

凡此种种,就构成了一种“为我所用”的奇葩多重证据法:这些学者千方百计贬低的史料,恰恰又让他们火中取栗般挑选出可以“担此大任”者——他们不再红脸地说,这就是史才。时至今日,数风流人物还看昨天。他们幡然白发,嘴角白泡子直翻,骈四俪六地谈论着“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的历史观。长此以往,构筑出他们三寸薄土之上的巍然学术丰碑。

这就让我认定,他们中蛊了。他们唾面自干的修为还不够。

所以,一个人不能迎风吐口水,我明显感觉到,采用以往人物传记、人物分析、历史小说等写作手法,处理张献忠现象必将面临巨大的制约。

可见,我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悖论写作,就是为了进一步贴近黄虎十分特殊的个人气质与那一个永难忘怀的破碎时代。

我姑且称之为“大词写作”,就是服从于制式思维的强力指引,采用习惯性行话、意识形态术语,叠加众多形容词、副词来增加克里斯玛类型人物的魅力,就像军事上的佯攻,是一种消灭多元、凸显个人,消灭细节、凸显乌托邦的写作;但悄然运行其中的反讽原则与理性精神,不断消解着初衷与初心,将矛盾的对立推到极致就成为佯谬,在意涵的相反向度上,让语象与语义互相冲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最后过渡成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悖论写作,由此我用一句俗话来指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黄虎张献忠》不是一部以时间为链环的系统传记,我选择了涉及黄虎张献忠最为重要的十几个场景,力图展示他的奇异禀赋以及大西国麾下的政治、军事、交往、管理、民生、科举、文化、沉银等方面的举措,在主流学术中的叫号与民间的叫骂之外,忠实记录下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马拉美则在散文《伊吉图》中有言:“文学,

或者说最初的文学,就是从如此等待之中诞生的。读书所开启的,不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等待,而是一片空无对另一片空无的等待,是一本书在等待另一本书,是一个孤独在等待另一个孤独。”在我看来,“想象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因为这极可能是一个与虎谋皮的写作策略,到了最后,也可能是老虎交出了一张狗皮,但在虎伥们的挟持下,谋皮者最后付出了生命的本钱。

我在锦江九眼桥畔居住了十几年。成都因水而成,缘水而兴。“二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府河与南河宛如人体任、督二脉,吐故纳新,使“江环城中”格局一直得到承袭和发展。

数千年以降,成都码头镌刻着深纵的城市记忆。三国之时,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因有“万里之行始于此桥”的感叹,万里桥就此成为锦江文化的地标。明末,黄虎张献忠在九眼桥从事着自诩为“替天行道”的清扫工作,留下了无数天地为之色变的事件。进入民国,成都尚有十二座码头,其中六座分布于锦江沿岸。无论是人头攒动的水东门货运码头,还是运送盐糖、布匹为主的合江亭码头,抑或因木柴而兴的九眼桥码头,浪涌人聚,千帆竞流,逐渐形成上起新南门、下达望江楼的庞大码头聚落。成都人名之:锦江码头。

马可·波罗、威廉·盖洛、大卫·妮尔、亨利·威尔逊、山川早水等域外学者进出成都均在锦江码头。1879年,一代大儒王闿运入主成都尊经书院,多次进出锦江。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巴金、李劫人正是从这里出发,远渡重洋,负笈法国;郭沫若的“东渡”、艾芜的“南行”也是以此为起点……

成都“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因水而困,因水而为”,春水明媚凝脂,烟光梦田含翠。置身锦江码头,思接千载,知锦江之高义;逝者如斯,念崇丽之无尽。

最后,我会在红壤遍布的巴山蜀水间,焚烧十本《黄虎张献忠》。青烟一缕,蜀江水碧蜀山青,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 从“一战”到“五四”

——梁启超欧战及外交思想之变迁

◎ 朱中原

—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成书于1914年12月，时正值“一战”爆发不久。这部书梁启超只花了十五天时间便告完结，如此急就章，只为急切地要为中国的国民带来关于欧战的启蒙。

除《欧洲战役史论》之外，梁启超还在接下来的其他言论中继续关注欧战，如《欧战蠡测》一文，即是对《欧洲战役史论》的补充与延续，也是对欧战战局的进一步研究、观察与蠡测。有意思的是，在《欧洲战役史论》中，梁启超经过对欧战战局的精细分析及严密论证，得出结论：德国必将战胜，协约国必将战败。故此，他极力向当局建议，中国务必保持中立，不可参战，一旦参战，则可能导致危局。而在《欧战蠡测》一文中，梁启超则详述了“一战”中参战诸国（包含日本共十国）不得不卷入战争的内在根由，意在论证各国参战的正义性，并以此鼓动中国积极备战，鼓动中国人积极观察这场战争。此时已是1915年，距“一战”爆发已有近一年，此时的梁启超立场逐渐发生转变，他开始考虑中国应当加入战争，而不应严守中立。1914—1915年，中国与德国、日本有关山东青岛问题等的摩擦冲突不断，他认为中国参战，时机已渐趋成熟。

二

梁启超在舆论上为中国参战进行了很好的铺垫，但事实上中国参战一波三折。

1917年，是中国对德宣战的关键一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北洋政府政争剧烈。该年2月9日，北洋政府对德国的潜艇政策提出抗议；3月14日，宣布对德国断绝外交关系；5月7日，北洋政府咨送对德宣战案至众议院；5月19日，众议院议决缓议，各省督军为宣战宪法问题开军事会议于北京，呈请大总统解散国会；5月20日，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

关于对德、奥绝交和宣战问题，在野者以梁启超主张最力，当政者则为段祺瑞，而反对者则包括黎元洪及多数国会议员，在野者除康有为、孙中山、唐绍仪等通电反对外，国内舆论多不赞成参战，故此梁启超的参战主张遭到了国内舆论的激烈抨击。

对梁启超宣战言论抨击最激烈的，要数以马君武为代表的国会议员和立宪派骨干伍宪子。1917年2月28日，马君武等三百余人发表反对对德绝交、参战通电，历数参战之种种不利：“中国实力全无，事事被动，既加入协约，强邻必借题干涉内政，侵害国权，其祸一；中国财政困难，濒于破产，既入战团，种种需费，已债已多，更为他人负债，清偿无



期,其祸二;三次革命以后,元气未复,土匪遍地,更遇对外战争,内地土匪乘机而兴,全国糜烂,其祸三;西北回部与土耳其同种,中国既入协约,与土为敌,回族离贰,边防空虚,何以御之?其祸四;潜水艇封锁以后,中立国船只皆不至英国,举国惊惶,平和极近,中国此时加入,为协约国,战后之赔偿品,其祸五;即协约国战胜,中国衰弱,无利可图,徒自破均势,任人处分,其祸六;中国今日急务,在整理内政,自图生存,外战既起,法律无效,全国人心更无注意内政之暇,宪政破坏,无以立国,其祸七。总之,对德断绝邦交,加入协约,无利可图,而此后种种祸害,不可胜言,应请全国速电政府,合力阻止,以救危亡。”

应当说,马君武等此论非属党派之见,而是出于公心之论。此论本非偏宕之论,而是国内民众的一般舆论。当时的大多数国民对于“一战”的认识与梁启超最初的言论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德国陆军拥有强大的实力,在战争中必胜,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曾留学德国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却独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德国必败。此时的段祺瑞非常痛苦,因为他无法以既有的事实批驳国内民众的一般舆论。所幸的是,梁启超经过对“一战”的深入研究,改变了自己此前认为德国必胜的观点,转而认为德国必败。梁启超立场的转变,为段祺瑞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不过,梁启超的言论一出,遂引发国内有关对德宣战问题的轩然大波。

康门弟子均对梁氏言论表示激烈反对,其中尤以伍宪子为代表。伍宪子为梁启超知交,也是康门中立宪党后期的骨干成员,但他对梁氏宣战言论颇为不满并竭力劝解:“自抗议起至今将两月,弟始终不以兄所主张为然,但人各有见,不能强同,故弟亦不便反对之,惟今则国人反对之,兄二十年来之名誉今遂顿减。”“自战则愈战而愈乱,则引外兵以平乱而已矣,而中国遂从此已矣。兄数十年拳拳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伍宪子此番劝解当然是出于

好意,其以国民舆论作为劝解梁氏之依据,劝其幡然改辙,可谓苦口婆心,实是出于爱护梁氏之心,但梁氏仍不为所动,足见其立场之坚定。

是时,段祺瑞命陆征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协约国驻京使节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梁启超也以在野身份与各国使节时有接触。3月2日,梁启超致书段祺瑞,陈述其与美国驻京使节晤谈情形:“谈颇久,其意总以不加入为善。谓加入后,美国所欲赞助我者,反不便容喘。惟又称总须速行绝交,否则不能取得国际上地位云。我与言,现在尚未提商何等条件,若至万不得已需加入时,其权利条件有与各国连带关系者,拟先请美国赞同,然后与协约国谈判,望美力为赞助。”可见,美国与梁启超立场基本一致,支持中国对德绝交,但是否参战尚需据具体情况予以考量。

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在这一段时间几经波折,先是因参战问题决裂,后又修复。修复后,段由天津重返内阁。梁启超则趁此机会连续致书献计:“公既归,京外人皆知外交方针从此决定实行。德国希望既绝,恐其遂铤而走险。鄙意谓宜即日将德、奥商船捕获,免其爆锁黄浦,此目前最要之着。此着既办,即同时宣布绝交,绝交后,徐议条件最为稳便。”

3月8日,梁启超又致书段祺瑞,对段政府当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意见。梁启超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外交总长问题。二是内阁改组问题,此时宜暂时搁置。三是确定4月8日为下次会期。四是“内阁既不能急速改组,则此次因外交牵连之事,关系极重,若因应失当,则满盘皆输”。五是借机向段政府推荐弟子张君勱,张君勱为法学人才,留学德、日、英前后十余年,研究国际公法及财政经济,为战时不可多得的人才。六是新国会选举此时必须筹备。有关对德绝交方面,梁启超表示,绝交(德国)与加入(协约国),分两步办……“一面即宣告绝交,俟条件商妥,再行加入,此中稍留伸缩余地,则对内对美皆易就范,我公日前主张如此,似是不易办法,请更与润田熟商之”。

关于对德绝交之后收回德租界之事,梁启超也有擘画:“德租界采莫理循建议暂设委员会,由友邦推员公共管理,我亦加入似最合宜;海关所用德人自当停职,宜与各邦商,将我国人久在海关著有劳绩者擢补一部分;可否由外交部与两院外交委员长分别有所接洽;今当最紧要关头,公与东海(徐世昌)似宜多会晤,老成人阅历深,见地必常有高出吾辈也;等等”。

然而,段祺瑞在这件事上并未及时采纳梁启超及张君勱意见,一意孤行,他私授陆军部,采取非常措施,组织公民及军队包围总统府及国会,胁迫总统及国会赞同参战案。

1917年4、5月间,宪法和宣战问题正处紧张之际,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矛盾升级,内阁与国会间更势若冰炭,故当时一方面有解散国会之风潮,另一方面亦有倒阁之运动。梁启超为国家大局计,颇多折冲斡旋于其间。梁启超之斡旋主张在其《政局药言》一文中,他尤其对国会反对参战之主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国会自身为保持意思之一贯起见,在今日已完全不能不立于同意之地位,盖既已同意绝交于前,既已绝交,则时时为交战状态,今若反对宣战,则前此之同意绝交,可谓毫无所取义。”“国会自身表示其意思之前后矛盾,非所以自保威信之道也。”有关宣战后内阁是否应该改造及如何改造,梁启超认为“此别一问题,万不容并为一谈。若借此事为倒阁手段,无论其以国家对外事件为儿戏,于良心上有所不安也,而于国会自身乃更不利”。不过,梁启超虽然主张偏于内阁一边,但他亦尽量不生偏袒之心:“吾之所希望于两造者如此,而此希望不能不先求诸国会,盖国会对政府不生问题,政府对国会当然不生问题。万一不幸,而此第一希望不得达,国会对政府已生问题,然政府对国会仍宜勿生问题,此吾之第二希望也。”

1917年8月15日,北洋政府发布由梁启超起草的宣战布告,中国对德、奥宣战,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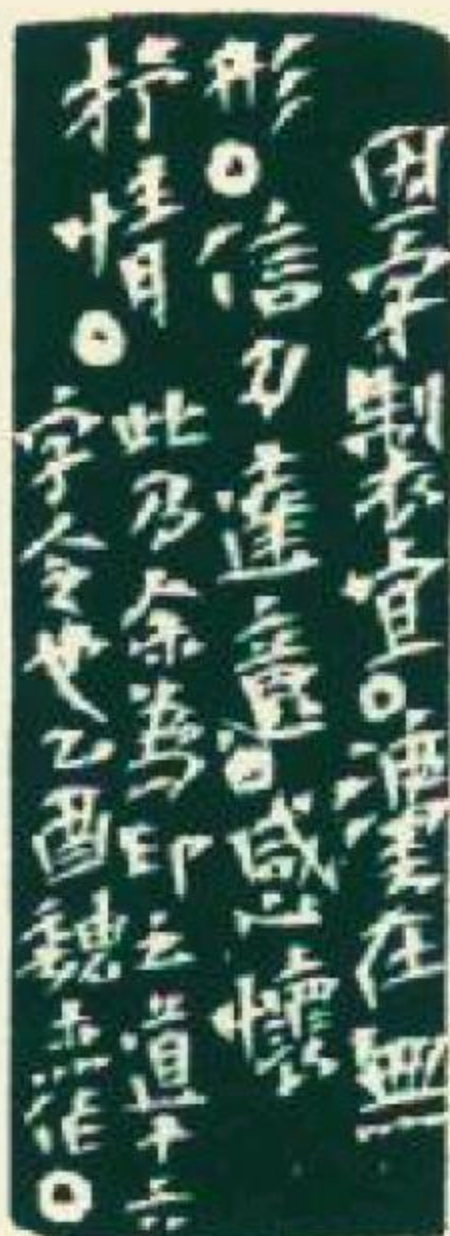
### 三

为了让中国顺利参加“一战”,梁启超在协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阴谋之后,再度入阁,与段携手,担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目的是借此机会重整财政,为中国参加“一战”铺路。

遗憾的是,梁启超在财政总长的位置上只坐了四个多月。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协助段祺瑞政府进行与日本的借款合作。他一面主导段政府与日本签订“西原大借款”协定,一面着手整顿币制,改革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财政之弊,推行银本位制度,建立中国银行等,一时之间,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得以好转。但是,由于梁启超协助段祺瑞与日本进行借款合作,使得其饱受朝野诟病。很多人认为梁启超多年积累下来的名声从此跌到了谷底,甚至比与袁世凯合作时的名声还要低,再加上他一意孤行,执意推动中国参战,在很多人看来,梁氏此举是要将中国拖下败亡的深渊,而目的只是讨好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当然,他的计划也很快遭到了失败。四个月之后,连同段祺瑞内阁一同倒台。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论是推动中国参加“一战”,还是发起五四运动,均为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诱发之结果。“五四”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山东青岛问题的失败,导致国内爆发学生运动,目的就是阻止和会代表团在协约上签字。

梁启超与闻“巴黎和会”青岛问题失败,第一时间即向国内的国民外交协会领袖林长民、汪大燮发回电报,报告青岛问题外交失败,请告知政府,并设法发起拒绝签字的民意运动。而且,梁的电报一封接一封,林、汪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外交协会第一时间报告总统徐世昌,徐世昌与汪、林等人商议,授意代表团拒绝签字,汪、林二人并将梁启超电报在《晨报》公之于众,国人惊醒,奋力抗争……



### 法无形

边款释文 “因字制宜，法在无形。信刀达意，感怀抒情。”此乃余为印之道十六字令也。乙酉，魏杰作。

材 质 芙蓉石  
尺 寸 2.9cm×2.9cm×8.0cm

创作时间 二〇〇五年

创作感言 作于朋友处，环境刀具皆生，但刻起来并无不适之感。

屋不在大



有书则灵

ISSN 1007-0222



08>

9 771007 022203

- ISSN 1007-0222 CN43-1243/G2 定价：10.00 元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 邮发代号 42-150 全国邮局均可订阅
- 封面用纸由长沙天元纸业有限公司优惠提供